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周小川 陈 元 张 平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炳华	王洛林	宁吉喆	毕井泉	江小涓	刘元春
刘世锦	刘 伟	刘遵义	许宪春	朱之鑫	朱 民	朱光耀
杜 鹰	谷源洋	李 扬	李毅中	杨伟民	张大卫	张卓元
张 勇	张晓强	林兆木	林毅夫	郑新立	姜增伟	高培勇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常振明	黄奇帆	隆国强	程永华
韩永文	谢伏瞻	解振华	楼继伟	蔡 昉	樊 纲	薛 澜
戴相龙	魏礼群	魏建国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王一鸣
副主任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晓河	王昌林	王 战	叶辅靖	陈文玲	迟福林	陈宗胜
李 平	李向阳	张宇燕	张 琦	张燕生	张蕴岭	范恒山
冼国明	郑京平	施子海	姚 洋	顾学明	贾 康	徐 林
黄志凌	黄群慧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王一鸣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李 蕊

· 本刊专论 ·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走向未来的目标任务	王一鸣 (005)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陈文玲 (017)
改革开放创新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奇帆 (031)

· 理论前沿 ·

依基本原理扩展的“剩余价值”认知框架及“管理劳动”的相关辨析	贾 康 张新强 (036)
--------------------------------	---------------

· 国际经济 ·

国际支付手段的更替机制及启示	陈炳才 (048)
世界经济复苏道路崎岖不平 下行压力持续存在 ——2022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及 2023 年展望	李婧婧 郝 悦 朱 祎 王庭锡 (066)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开放银行建设：趋势、风险与监管	边 鹏 顾 研 钱 军 黄 毅 (076)
综合运用宏观政策工具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	汪红驹 杨雅婷 姚 博 (084)

我国服务业开放对接 CPTPP 规则研究

——以教育、文化和医疗服务业为例

谢兰兰 张玉静 杨 娜 (093)

· 宏观经济 ·

多措并举 系统施策 不断强化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魏琪嘉 (102)

· 区域经济 ·

浙江特大镇发展和治理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黄 勇 蓝蔚青 (111)

· 产业发展 ·

新型专业的表现形式、供需特征与发展对策

——基于北京中关村的考察 邱 灵 (118)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6)

CONTEN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goals and tasks towards the future *Wang Yiming* (005)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en Wenling* (017)

Reform, opening up and innovation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uang Qifan* (031)

Relevant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surplus value” and “management labor” that is extended according to basic principles *Jia Kang, Zhang Xinqiang* (036)

The replacement mechanism and enlightenment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means *Chen Bingcai* (048)

The road to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is bumpy and downward pressure persists
——Analysis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22 and outlook for 2023 *Li Jingjing, Hao Yue, Zhu Yi, Wang Tingxi* (066)

China’s open bank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trends, risks and supervision *Bian Peng, Gu Yan, Qian Jun, Huang Yi* (076)

Comprehensive use of macro policy tools to deal with climate – related financial risks *Wang Hongju, Yang Yating, Yao Bo* (084)

Research on the CPTPP rules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and docking
——Taking education, culture and medical service industries as examples *Xie Lanlan, Zhang Yujing, Yang Na* (093)

Take multiple measures and take systematic measures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Wei Qijia* (102)

Analysis and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Zhejiang mega – towns *Huang Yong, Lan Yuqing* (111)

The form of expression, supply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Zhongguancun in Beijing *Qiu Ling*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走向未来的目标任务

王一鸣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第三部分从经济视角分析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认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任务仍十分艰巨；第四部分讨论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未来的首要任务，强调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目标任务 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研究员。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发展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取得的成果。其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百废待兴。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把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任务。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的工业化是从学习苏联模式起步的。在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后，中国从 1953 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随着计划的实施，苏联模式的缺陷也暴露出来。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

^①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9 页。

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进行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文献，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周恩来同志在1964年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奋斗，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化国家。这个阶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虽然经历了曲折和磨难，但仍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伟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

（二）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实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进程。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②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我们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新的部署。1987年8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30到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小康之家”这一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概念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迈出重要一步。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五大对第三步目标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的目标，并确立了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更高要求。

1978年至2012年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2000年后，中国GDP先后超过意大利、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②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③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④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

法国、英国、德国，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并于 2010 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快速增长，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01 年至 2007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上升期。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障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 and 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并赋予全面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建成的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是发展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的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

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置于战略布局的引领地位，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确保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党的十九大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党中央提出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采取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① 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13 年至 202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6.6%，高于同期世界 2.6% 和发展中经济体 3.7% 的平均增长水平。2021 年中国 GDP 达到 114.4 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为 2012 年的 1.8 倍。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18.5%，比 2012 年提高 7.2 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达 12551 美元，连续 3 年超过 1 万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3 页。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发展繁荣进步创造了根本前提，而且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和影响也前所未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看，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都需要特定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基础只有通过特定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化同样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为之奠基。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尝试，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一经登上历史舞台，就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特定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放到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去观察。地理大发现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力量通过殖民扩张，事实上把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卷入到了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由于西方率先推进工业革命基础上的现代化，以至于有人往往把西方化、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但正如马克思在分析“俄国道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与进程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处身其中的“历史环境”，并不存在“一般发展道路”。^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不同，现代化也应有不同的模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归根结底要看是否符合自身实际，能否解决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巨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发展途径与推进方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中国 14 亿多人口迈入现代化，将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也将重塑世界现代化格局，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和影响前所未有。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精神文明的发展。我们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发展经济、促进物质全面丰富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绿色发展

^①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30 页。

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摒弃了西方国家“国强必霸论”和“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改变了西方现代化模式蕴含的殖民扩张的基因。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都需要现代化的人来建设，现代化的成果也将最终转化为人的素质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推进国家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自身国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得对、走得通。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功，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吸收借鉴世界现代化文明成果基础上，既遵循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又注重“走自己的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功，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现代化模式多元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再者，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传承 5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和平、和睦、和谐的传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世界各国超越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隔阂，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三、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明“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的战略安排，明确了到 2035 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从经济视角看，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包括：人均 GDP 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中国发展条件看，实现这些目标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何为中等发达国家，现在仍缺乏明确的定义。从世界银行标准看，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门槛值为 2 万美元，平均水平高达 4.8 万美元，剔除新加坡、卢森堡等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发达国家人均 GDP 平均水平大致在 3.5 万~4 万美元。如果将 3.5 万~4 万美元作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那么中

国到 2035 年还要迈两个台阶。

首先，人均 GDP 要迈过 2 万美元的门槛，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2020 年中国 GDP 为 101.4 万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 GDP 为 1.04 万美元。按照 2035 年人均 GDP 较 2020 年翻一番进行推算，到 2035 年人均 GDP 将超过 2 万美元。考虑到中国人口在 2023 年达峰，且达峰后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 14 亿人口的平台，这意味着人口因素大体可以忽略，只要 2021—2035 年 GDP 年均实际增速达到 4.73%，就能实现人均 GDP 翻一番的目标。如果按照 2020 年的价格和汇率水平，这样的增长速度将使中国 GDP 由 2020 年 101.4 万亿元上升到 2035 年的 202.8 万亿元，折算后约为 30 万亿美元，人均 GDP 将达到 2.1 万美元，刚好是 2020 年人均 GDP 的两倍。按照经济增速前高后低的趋势，“十四五”时期 GDP 年均增速应达到 5.5% 左右，后十年达到 4% 左右。受疫情冲击影响，2020—2022 年 GDP 年均增长 4.5%，这意味着“十四五”后三年必须达到更高的增速。

其次，即使到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2 万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距离人均 GDP 达到 3.5 万~4 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仍有距离。从国际经验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 GDP，除了受经济实际增速影响，还取决于价格和汇率水平。假设价格水平稳定在年均上涨 2% 左右，汇率水平就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国际经验，日本和德国在相同发展阶段，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都经历了汇率升值过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 GDP 大幅上升。因此，中国到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仅要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实现人均 GDP 比 2020 年翻一番，达到 2 万美元以上，还要通过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带动汇率合理升值，使人民币汇率年均升值 2%~3%，这样再考虑价格水平年均上升 2% 左右，就能实现人均 GDP 达到 3.5 万~4 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动态的，我们要达到的是 2035 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 GDP 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带动汇率水平的提升，努力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确保到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纳入评价的全球 141 个国家中，中国位列第 11 位，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是前 30 位中唯一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将创新型国家前列界定为创新指数排名前 5 位，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创新指数要大幅上升，而且科技研发、原创能力、人力资本水平要有新的突破。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科技创新正从跟跑转向部分领域并跑领跑、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转向系统能力提升，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与此同时，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比，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和弱项，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创成果偏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科技领军人才仍然偏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大国竞争制高点。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小院高墙”战略，推出《创新和竞争法案》，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措施，以确保美国在关键战略技术上“超前两代”的竞争优势；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对半导体材料、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设计工具、人工智能芯片及相关人员等实施前所未有的限制措施。对此，中国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动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我们要更好统筹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三位一体”推进科技创新，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实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性突破，塑造科技创新的新优势。

（三）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经过改革开放后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完备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宽而不深，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不少“堵点”“卡点”，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们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迅速缩小了中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部分终端产品领域逐步形成国际竞争力，比如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仍是短板，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迫切要求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势资源合力攻关，加快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中国传统产业具有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领先优势，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产业价值链水平，提升传统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培育壮大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经济是影响各国竞争力消长的重要力量。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 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构建智能制造生态，推广“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四）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

按照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①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过 4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30%。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50%~75% 的水平，尚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也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刚迈过中等收入下限的区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争取用 15 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到 2035 年由现在的 4 亿多人上升到 8 亿多人，使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60%，就能基本形成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型”社会结构。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保持中速增长基础上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二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满足第一个条件，必须推动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并有效

^①国家统计局将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 10 万~50 万元（2018 年价格）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人群。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满足第二个条件，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推进形成更加普惠包容的发展方式。从各方面条件判断，如果到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翻一番，居民收入增长略快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善，公共服务支出占比明显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能加快扩大，到 2035 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能超过 8 亿人，基本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

走向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以推动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战场，特别是要促进临近中等收入门槛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为主攻方向，通过保障教育公平提升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能力；以破除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主要途径，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和纵向发展阶梯，为低收入人群创造更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平机会。而无论是帮助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都需要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 GDP 从 1 万美元到 2.5 万美元这个区间上，政府支出比重的提高最为显著，主要体现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如 20 世纪 40 年代到二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计划，英国实施“贝弗里奇计划”，瑞典进行福利国家建设等，都改善了收入分配，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今后一个时期人均 GDP 正好处在这个阶段，增加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健康、幼育、住房、社区建设等方面公共服务支出和均等化水平，对改善收入分配，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五）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中国是全球碳排放大国，根据《BP 世界能源统计》，2021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105.2 亿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30% 左右。过去 10 年，中国碳排放进入平台期但总量仍有上升。力争 2030 年前碳达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关键在于实现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

碳达峰，实际上是要把碳排放增量速度尽可能降下来并使之趋向于零。碳达峰后稳中有降，实际上是增量速度降为零后开始趋于下降的过程。从国际上碳排放轨迹看，许多早期工业化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实现了碳达峰，但达峰之后的碳排放下降速度十分缓慢。中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效率偏低，给实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带来更多挑战。这就要求中国立足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从趋势上看，中国碳排放达峰后很可能形成一个平台期，还可能出现多峰突起、波动下降，但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碳减排进程。

近年来，中国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成效显著，装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发电量占比稳步提升，成本快速下降，已基本进入平价无补贴发展的新阶段。同时，新能源开发利用仍存在电力系统对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网和消纳的适应性不足等制约因素。这就要求对未来煤、电、油、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战略部署，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使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逐步提高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等发电装机和发电量的比重，更好发挥零碳能源在能源保供增供方面的作用，确保实现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

四、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未来的首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阐明了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战略意义。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通胀水平仍处高位，出现滞胀的风险上升。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人口出现负增长，老龄化加速，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科技创新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要素循环仍然不畅，一些领域风险水平上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主动调整和战略选择。

走向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统一到高质量发展上来，形成两者有机结合的新的战略方向，推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良性互动和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有效应对外需拉动作用减弱、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要在合理引导消费、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提升传统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加大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消费预期。鼓励扩大有效投资，补齐创新能力、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短板。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投资增长机制。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加有效供给、赢得发展主动具有关键作用。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在创新战略上，要从过去的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优势，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局部领先优势和非对称反制能力。在创新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间品创新，强化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在创新方式上，要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二）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质”和“量”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合理的增速，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实现。从已有的研究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往往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快的阶段，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的阶段，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没有合理的增速，各种矛盾和问题就难以缓解，各类风险就可能集中爆发，提高发展质量也就无从谈起。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持续强化，已经不可能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稳定投资边际产出，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减缓过去积累的风险。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步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高质量发展

的主旋律。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大体稳定在 40% 左右。如果把达到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 60% 和 80%，作为 2035 年、2050 年必须迈过的两个台阶，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要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提高。据测算，如果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过去一个时期的接近 1% 年均增速，那么 2021—2035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达到 2.7%，才能在 2035 年达到美国 60% 左右的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仍不到 2%。如果今后一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至 5% 左右，那么全要素生产率要实现 2.7% 的年均增速，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要达到 50% 以上。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并非易事。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打一场硬仗。首先，要清除阻碍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障碍，推动生产要素由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转移。这是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重要动力，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其次，加快产业技术扩散和技术变革，促进更多产业生产效率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从而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再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部分领域实现对国际领先水平的超越。

（三）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和重塑，这既有中长期变量的作用，也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形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得传统制造环节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减弱，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权重提高，发达国家依托智能制造技术优势，降低了对低工资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其次，经济全球化退潮影响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全球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重新调整和组合，全球供应链在持续 30 年扩张后开始收缩，区域化、近岸化、多元化特征更趋明显。再者，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芯片短缺、航运受阻、物流不畅、能源危机等，加剧各国对供应链安全问题的担忧，推动供应链分散化，在经济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难以身处局外。过去几年，中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遭遇巨大挑战。美国为维护自身的竞争优势，不惜成本和代价，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建立“印太经济框架”，实行“友岸外包”等，以此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延缓中国现代化步伐。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脆弱的状况，以及个别西方国家推进脱钩断链的做法，中国必须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保障。

首先，要坚持锻长板补短板。立足中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技术攻关，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链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在关系安全的领域补齐短板。其次，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水平。加快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供应链服务的快速定制、全程可视化，以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灵活响应，深化跨区域大范围协作，鼓励电子商务、数字贸易发展和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再者，要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健全和发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新型产供储销体系，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畅通的物流体系。加强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储备能力投资，推进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建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

（四）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重视城市集聚人口、资源和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又要注重乡村的生态屏障、提供农产品、传承历史文化的功能，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布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破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平享有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吸纳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持续高于东部地区，相对差距逐步缩小。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出现新情况，主要是南北分化态势趋于明显，形成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份额“南升北降”的态势，各板块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经济和人口空间极化现象日益突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量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发展优势不断增强，而一些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等要素外流严重，成为“收缩型城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尊重经济规律，推动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区际分工；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使各地区群众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建设，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生态的空间均衡。

（五）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更是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的过程。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银行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

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强对国际高端要素的吸引力，使国际循环更有效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要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边境后”规制改革为重点，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开放，缩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六）着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化石能源是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由于二氧化碳以外的其他温室气体的零排放更难实现，而通过森林碳汇、碳捕集与碳封存（CCUS）等来实现碳中和的作用相对有限，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以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核心，并持续推进工业、建筑、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关键是处理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能源安全，最重要的是能源资源的可靠保障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新能源技术迅速发展，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从传统能源视角看，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但从新能源视角看，中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赋存最多的能源资源。中国石油、天然气等优质化石能源资源难以自给，长期依靠煤炭不可持续，但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资源可以保障中国能源长期可持续供应，同时也可以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建设以零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要构建新型零碳能源供应系统和重构终端能源消费系统，用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能源消费向高度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绿色低碳模式转型。随着供应端零碳能源规模扩大，如果消费终端不能同步发展有利于消费零碳能源的电能替代，零碳能源就无用武之地。因此，需要加快在能源消费终端全面布局电能替代，提升电气化水平。在新型能源体系下，从非化石能源直接得到电力，实现终端用能高度电气化，大幅度简化用能过程，除生物质能源燃料外，绿氢成为主要二次能源，这将推动能源体系的系统性转变，并将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进工业、建筑、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要根据各领域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举措。在工业领域，要落实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确定各行业具体碳达峰时间和峰值范围。树立并滚动更新行业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鼓励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引导工业企业开展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逐步形成零碳能源消费模式。在交通领域，推广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推行大容量电气化公共交通和电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开展多能融合交通供能场站建设，完善充换电、加氢、加气（LNG）站点布局及服务设施。在建筑领域，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升建筑节能标准，健全建筑能耗限额管理制度。完善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标准，支持利用太阳能、地热能 and 生物质能等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供能系统，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 年。
2. 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学习与探索》，2022 年第 9 期。
3. 王一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国特色和目标任务》，《中国领导科学》，2023 年第 1 期。
4. 王一鸣：《科学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经济日报》，2021 年 11 月 10 日。
5. 王一鸣：《科学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光明日报》，2022 年 12 月 6 日。

责任编辑：李蕊

中国式现代化 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陈文玲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每个国家都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具有超越传统现代化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色，体现了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面临风险与挑战，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与奋斗。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新形态 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 2023 年 2 月 7 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一、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每个国家都能找到一条 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意义非常重大。世界上很多国家过去一直把西方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等同于民主，等同于先进。近代史上，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并取得阶段性成功，因此现代化一度被西方定义为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随着世界现代化实践的发展，早期“单线进化论”式的现代化理论遭到了现实的挑战，又逐渐形成“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所谓现代化理论。随着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深入发展，一些西方国家靠直接掠夺或变相掠夺保持霸权和财富集中度，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西方式现代化产生了严重质疑。一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现代化，所谓社会先进，所谓民主自由，所谓一系列可以输出的价值观等，一个个地暴露出真面目。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时代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工程，体现了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支撑的独特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和理论创新能力。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在“两个结合”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不断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产生了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支撑了巨大规模市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了更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使不断创造共同富裕的能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不断提高供给侧满足需求侧的能力，包括提高满足消费者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必须转变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与消费偏好，趋向更为健康的环境优化型和高质量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必须是和平的，才能保证中国人民能够过上稳定可持续的生活。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我们达到国际通行的标准，例如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一个国家实际消费能力的购买力平价（PPP），反映各国人类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一系列衡量人类发展使人的能力提升的重要参数，例如贫困率、健康长寿水平，还有人们获得文化技术和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与此同时，还要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与内涵，形成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功与否的指标体系。

关于现代化的指标，世界各国有很多指标体系和形态的描述。如美国社会学者英格尔斯提出，以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互为基础，包括10个衡量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过去是国际上受认可度比较高的表述。主要体现经济规模、经济质量、各国经济发展程度（购买力平价）、人类发展指数等。联合国新千年计划提出关于人的现代化、经济社会现代化等国家现代化的若干目标，是各国为之奋斗的共同努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明确宣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基本特征。

从全球看，所谓现代化和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动态概念。现代化在历史不同阶段有不同衡量标准，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500~1000美元以后，仍然能够保持7%以上的增长，就可以说进入了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如1950—1973年，日本年均增长率为8.9%（日本经济腾飞）；1965—1996年，韩国年均增长率为7.9%，第三个5年计划期间（1972年至1976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1%，被称为“汉江奇迹”；1948—1979年，巴西年均增长率为7.2%，其中1968—1973年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被称为“巴西奇迹”，其GDP居南美洲第一，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这些国家都曾迈入现代化门槛，一些国家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间保持了年均

9.6% 的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是世界之最，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几个大的失衡。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失衡；四是人类生存发展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失衡；五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悬殊。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西方的现代化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不可能靠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具有五方面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道路有哪些经验可借鉴？比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科技的原始创新能力、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人才制度、政府公共政策与制度、政府公共品采购制度等等，就特别值得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学习和借鉴。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 具有超越传统现代化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① 从几个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或许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一）从战略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新方略，是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总战略，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到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序幕拉开之后加速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10 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与奋发有为，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的基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体现在九个方面。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①本报评论员：《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光明日报》，2023 年 2 月 9 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笔者体会，这九个方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是要构建基于更高文明要求的社会文明形态和生态体系，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方式，包括人民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命方式，包括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包括现代国家的执政能力等等。

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有自己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个文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路径一致，是我们在持续几十年努力形成的基础上向一个更高的目标迈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蓝图，与两个百年奋斗的目标一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致，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一致，与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一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又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还是中国从一个台阶迈上另一个更高台阶的过程。

（二）从理论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开创、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普遍性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视角、新路径和新范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充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不断迈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阶段是发展过程的一次飞跃，具有同以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完全不同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大工业生产，现代科学技术，世界整体、高度分化和整合，世俗化和城市化。实现民族独立是开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化的基础，但世界上并无实现现代化的固定道路和可复制的模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乱局，变乱交织。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断加剧，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规则和地缘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必须开创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中国进一步深化对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三）从历史的维度看，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坚持不懈奋斗的总体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的文明古国在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各种政治力量相继登场，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无一不是跟在西方现代化后面亦步亦趋，特别是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被动地应对世界现代化大变局，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对中国全面封锁下，中国选择了苏联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顺利完成了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通过“走自己的路”，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着严重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提倡“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适应中国国情，“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① 在发展方式上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在发展目标上由少数人的富裕向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性任务，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周恩来同志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快车道。1979 年 3 月，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随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② 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到 20 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了现代化建设“新三步走”战略、“三位一体”布局和“四位一体”布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化、体系化思想，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从贫穷落后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如果对形成世界认同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追根溯源，所谓“西方文明”的许多要素实际上源于“东方”的北非和中东。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大都起源于地理上的东方世界。在西方崛起并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之前，世界是一个“东方化”的世界。“西方”最初和最持久的核心部分是现在的西欧国家，只是随着欧洲国家开始在世界各地殖民，其内部东、西方之分的重要性才开始下降，“欧洲”逐步成为西方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避免陷入欧洲纠纷的美国成为西方的领导者，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二战后的冷战塑造了一种以两种社会制度竞争为标识的“东—西方”（the East – West）之争，原来意义的东方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终结后，世界似乎恢复到了“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本来面目，但世界体系结构的历史性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和嵌套，改变了原来意义上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分野的物质基础，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人员往来，为全球的文明交流、比较借鉴和相互融合创造了将近 80 年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早就有多名西方学者指出，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成功“秘诀”扩散、欧美关系的松弛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等，西方的所谓现代化和民主制度的唯一性及排他性已经“终结”了。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动摇了支撑西方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历史根基，即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世界体系。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第三世界革命”的不断冲击，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非西方国家为“外围”的世界体系并没有解体。但冷战结束后的 30 年里，一批非西方大国相继崛起，更多新兴市场国家融入世界体系，改变了“中心”乃至整个体系的力量配比和依存模式，西方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才真正遭遇了挑战和危机。不过，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会重复西方国家争霸世界的老路，而是要超越东、西方的历史界限，重构人类文明体系，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命运共同体。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使 14 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经验，为人类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新的选择。从 2012 年到 2021 年，中国 GDP 从 53.9 万亿元增长到 114.4 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 11.3% 增长到 18.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38.6%，超过七国集团（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2022 年中国 GDP 增速降到 3%，但 GDP 达到 121 万亿元，已经是日本的 4.19 倍、德国的 4.35 倍、印度的 5.18 倍、英国的 5.7 倍和法国的 6.33 倍。2023 年 1 月 25 日，联合国发布《2023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受多重危机交汇的影响，世界经济前景黯淡且存在不

确定性。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 1.9%，成为数十年来增速最低的年份之一。报告预测，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 4.8%；1 月 31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 2.7% 上调至 2.9%，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由 4.7% 上调至 5.2%，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由 1.1% 上调至 1.2%。毕马威（KPMG）、摩根大通预期中国 2023 年将实现 5.2%、5.7% 的经济增速。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报告《巨大的经济竞争：中国与美国》指出，中国的迅速崛起为全球力量平衡带来了巨大改变。^① 20 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20 年后的今天，如果用传统的 GDP 衡量标准——市场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已经从 2000 年的 10% 上升到 2021 年的 78%；用 PPP 来衡量，中国的水平比美国高了 15%。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2022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2022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根据全球 111 个国家（23 个低收入国家、85 个中等收入国家和 3 个高收入国家）的最新数据，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 10 个指标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水平进行了评估。报告指出，在涵盖 111 个国家的 61 亿人口中约有 12 亿人生活在贫困中（日均生活费低于 1.90 美元），占总体人口的 19.1%。其中，约有 5.93 亿人口是 18 岁以下的儿童；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 5.79 亿人），其次是南亚（3.85 亿人）；5.95 亿贫困人口生活在没有完成至少 6 年教育的家庭中；10 亿贫困人口面临固体烹饪燃料的危险；8.61 亿贫困人口无法得到安全的卫生设施；5.33 亿贫困人口无法在步行 30 分钟往返的范围内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来源；6.08 亿贫困人口没有电力供应；9.14 亿贫困人口住在用不合格材料建造的房子里；5.13 亿贫困人口至少缺少 8 种主要资产（收音机、电视、电话、电脑、畜车、自行车、摩托车或冰箱）中的 7 种。

新的数据表明，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得贫困程度更深、范围更大。有 81 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MPI）均呈现下降态势，并且贫困的数据越来越难以获取，多重因素积累叠加，致使贫困状态越发严重且不易统计。而全球经济政治外交格局深刻演化，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外部因素又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普遍上涨，贫困形势愈发严重。从区域分布上看，南亚的贫困人口更多表现为营养不良、烹饪燃料、卫生设施和住房等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表现在没有安全的饮用水与电力的匮乏方面。从城乡分布看，有近 83% 的 9.64 亿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区域，17% 的 1.98 亿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或者城市的边缘区域。据权威统计，世界范围中所有的贫困国家，约有 65% 集中在非洲。津巴布韦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全国总人口 1600 余万人，国土总面积约为 39 万平方公里，极度的通货膨胀使其沦为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最穷的时候人均 GDP 仅 0.1 美元，平均寿命男性为 37 岁、女性为 34 岁，全国平均每天停电超过 20 小时。亚洲最穷的国家阿富汗，人均 GDP 仅有 508 美元，目前有 1000 万左右的难民。

2019 年数据显示，排名前十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约 66%，前 20 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近 80%，其余 173 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的 1/4。可以说，发达经济体占据了全球绝大部分的财富。实际上，绝大部分国家都处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地位，这些国家大多数在 20 世纪曾是殖民地，或者在 21 世纪曾被帝国主义侵略剥夺，无法也不可能通过西方式的方式发展，使自己走上

^①Graham Allison, Nathalie Kiersznowski, Charlotte Fitzek, The Great Economic Rivalry: China vs the U. 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22.

现代化道路。中国从一片废墟中站立起来，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变为一个独立自主发愤图强的国家。中国的发展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走上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这让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看到了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人民的力量，通过奋发努力可以不断创造美好的愿景。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色，是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巨大规模人口迈入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标志性事件，将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中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将使发达国家人口在世界上占比从 16% 上升到 34%，这是重塑世界现代化格局的历史性超越。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共有 141178 万人，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让如此巨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遇到的最大难题和挑战。经过多年坚韧不拔的努力，中国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在迈向强起来。如何把 14 亿人潜能挖掘出来，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同时使 14 亿人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14 亿巨大规模人口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面临的问题。

经过新中国 70 多年、改革开放 40 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懈努力，已经充分激发了 14 亿人的爱国主义热情，每个人都是新中国的见证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奉献者。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增长韧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 14 亿多人口、超过 4 亿中等收入群体，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人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从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出发，继续释放人口红利，在不断实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推进国家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和独特的社会制度走出来的，是脚踏实地地干、包容兼蓄地学、革新鼎故地闯出来的。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富裕。推进和实现共同富

裕，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注重效率，坚持高质量发展，在更高层次上做大“蛋糕”，又促进公平，完善分配制度，更高水平地分好“蛋糕”，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前有三个标志性变化：一是中国富起来进入新阶段，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动后富，到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实际上已经走了两步，现在正在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二是中国在脱离绝对贫困的基础上，要通过消除相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现行贫困标准下，2013 年至 2020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9899 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1.3 个百分点。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最低收入国家人均每日 3.2 美元的底线，中国还有 2.73 亿人处于相对贫困之中。2013 年至 2021 年，全国就业人员稳定在 7.4 亿人以上。10 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3 亿人，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分别覆盖超过 13.6 亿人、10.4 亿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外方嘉宾交流时的一番话，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2021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5.4%，比 2012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我国的城镇化率由 53.1% 上升到了 64.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或者说差距由 2.88:1 降低到了 2.5:1。三是保持创造财富激情和动力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制度安排走向共同富裕。一方面绝不能使创造财富的动力减弱；另一方面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四次分配等制度性安排，创造机会平等、分配合理、鼓励创造的体制机制，激发更多人的创造性。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追求的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那种贫富悬殊式的现代化，也不是以日韩为代表的那种属于财阀特殊利益阶层的现代化。后两种都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就告诉我们，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不是齐步走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必须基于形成激发人创富能力释放的制度性安排，将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在做大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绝不能使一部分创造财富的人躺平或内卷，另一部分人去抢剩下的蛋糕，这样的共同富裕不会走向富裕，更不能真正地走向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 10 年，中国经济总量从 53.9 万亿元提升到 114.4 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 11.4% 提升到 18.5%。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达 80976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2012 年增长 69.7%，年均增长 6.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 12551 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 12695 美元只有 1.8 个百分点差距，连续 3 年超过 1 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中国国家统计局 2023 年 1 月 1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 2022 年 GDP 达 121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这标志着继 2020 年和 2021 年中国经济分别突破 100 万亿元和 110 万亿元大关后，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式现代化要创造更多的物质文明，使精神文明的基础更加牢固。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

中国创造的物质文明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在二战结束之后的 10 年，美国 GDP 约占世界 GDP 的 50%。倚重这种经济主导地位，美国率先推动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与全球金融框架，共同构成了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但到 1991 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已经缩水至 1/5，到现在则只有 1/6 了。两千年前，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所在地。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了欧洲，然后是美国，今天经济重心再一次转移到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并对所有其他经济体产生了强大的引力。在过去 40 年里，中国经济几乎每 7 年就翻一番。中国 GDP 的增长缩小了中美两国之间人均 GDP 的差距。在 21 世纪初，美国人均年收入（3.6 万美元）是中国（1000 美元）的 36 倍。到 2020 年，美国人均 GDP 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6.3 万美元，而中国人均 GDP 则翻了十倍，达到 1 万美元。虽然中国人均 GDP 落后于韩国（3.1 万美元）和日本（4 万美元）等邻国，但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2000 美元）、印度尼西亚（4000 美元）和越南（3500 美元）。然而，这种收入增长大部分来自中国沿海城市的居民，内陆一些省份和农村的收入仍然与印度居民收入相当。

我国仍然存在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其突出表现不仅是享有物质文明方面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享受精神文明的差距。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在发展经济、促进物质全面丰富的同时，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转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美好生活需要更多地体现在精神文明上。我们要创造更多的精神文明供给，包括创造精神文明财富的制度供给、产品供给、行业供给。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一个民族的内在修养，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是能否受到世界各国尊敬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0 后、80 后、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①平视这个世界，就要以更高的文化修养、更完美的人格魅力和更加具有自尊自强自爱的精神力量打动人。使我们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也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也是最终决定国家胜负、决定中国在上世界上认同度的关键所在。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绿色发展态势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形成。2021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比 2015 年提高 6.3 个百分点。2013—2021 年，全国累计造林总面积约 5944 万公顷。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大约 34%，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的装机容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居世界第一。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五位一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①向洋：《参考说两会“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令人感慨万千！》，参考消息网，2021 年 3 月 7 日。

非常重要。比如城市建设的方向是形成生态型城市，园区建设的方向是形成生态型园区，企业发展的方向是形成生态型企业，资源利用形成循环型经济，等等。中国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虽然西方一些国家由于能源危机正在走回头路，但是中国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和我们的承诺在各个方面继续努力。在新能源领域，特别是核能、水能、光伏能、风能等方面，中国毫无疑问走在了世界前列。比如，高储能电池产能，中国现在已经占全球的 80%；电动汽车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销量已经占全球 40% 以上，产量已经占全球 70% 以上。中国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江河湖海湿地正在恢复原有的生态，河长制、湖长制都是中国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一系列生态文明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思想，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已经逐步转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能为世界生态环境转变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已经作出了很大贡献，比如世界上新增的绿化面积 25% 来自中国。中国森林覆盖率在恢复，草原在恢复，湿地在恢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河流在恢复、珍贵的湖泊已经出现。中国的生态文明毫无疑问会为子孙后代带来永续的可以利用的资源、永续的可以生存的环境，如果是只顾当代不顾下一代，这种现代化是没有意义的。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主张文明交流互鉴，打破了西方所谓“文明冲突论”，创立了具有包容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内含的殖民扩张基因，创造了具有包容性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还有中国近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提出来的一系列全球文明观、和平观、价值观、合作观等等，都是坚持同世界合作共赢，推动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的开放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具引领性的方向迈进，以更广博的胸怀站在世界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面临风险与挑战，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与奋斗

（一）中国面临人口红利递减的挑战，从长周期看需要进一步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与支撑力

一方面中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联合国 2022 年 11 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报告数据显示，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2022 年为 13.8%，到 2035 年和 2050 年分别上升至 22.6% 和 30.2%，上涨趋势发展非常快。另一方面中国少子化的速度也非常快，从 2016 年开始，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直在下降，2022 年中国人口减少 85 万人，这是 60 年来中国人口首次负增长。我国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5 岁提高到 2022 年的 78.3 岁。

据《新印度快报》（The New Indian Express）报道，印度目前人口接近 13.9 亿人，中国人口约为 14.1 亿人。《世界人口展望 2022》报告预测，印度将在 2023 年 4 月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人口增长曲线保证其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全国 1/4 的人口在 15 岁以下，约 52% 的人口在 30 岁以下。自 1950 年以来，中印两国提供了 35% 的世界人口增长。但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极大地降低了出生率，人口在 2050 年可能比现在降低 8%。在中国人口减少的同时，印度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预计其将在 2064 年达到 17 亿人口的高峰，届时印度人口将比中国人口多近 50%。从 2023 年到 2050 年，预计印度将提供 1/6 以上的世界劳动力人口（15~64 岁）增长。

人口红利将成为印度迈向超大规模经济体和全球主要强国的底气与条件，势必对中国所处的全球地位产生全方位的冲击和威胁，并对大国竞争、国际格局等产生影响。印度产业政策与人口政策配合，将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向印度转移和其工业化进程，并在进口替代、抢夺市场等方面对中国形成挑战。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美国“联印遏华”的趋势难改，美印因素叠加对中国造成的挑战和威胁将更难估量。印度一旦形成规模化、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加上其庞大体量和良好国际环境，一方面中国工业规模优势有可能被抵消，另一方面也会增大印度主导国际规则设置、获得更大国际话语权的可能。

（二）中国面临解决贫富悬殊的挑战，如何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财富涌流、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21 年世界各国人均 GDP 排名前十的国家为卢森堡（136701 美元）、爱尔兰（99013 美元）、瑞士（93720 美元）、挪威（89090 美元）、新加坡（72795 美元）、美国（69231 美元）、冰岛（69033 美元）、卡塔尔（68581 美元）、丹麦（67758 美元）、澳大利亚（63529 美元），中国居世界第 60 位。

中国有 6 亿人的月收入低于 1000 元；月工资达 5000 元以上的仅 64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5%；月工资达 1 万元的仅占总人口的 0.6%。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 3500 元时，中国有 1.87 亿人缴纳个税；2019 年起征点调整为 5000 元后，全国仅有 6400 万人缴纳个税。贫富差距既表现在社会个体之间，也反映在社会群体之间、各个区域之间。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居民总存款约为 120.3 万亿元，新增存款金额约为 17.8 万亿元，但收入水平悬殊。全国存款统计表明，有 50 万元存款的人只占总人口的 0.37%。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差距在拉大，2012—2022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7703 元增加到 17175 元，年均实际增长 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2476 元增加到 5153 元，年均实际增长 7.2%。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22 年城乡收入比为 3.33:1，已扩大到 1978 年（2.47:1）以来的最大差距。

（三）中国面临空前急剧的国际格局演化，美国正在一些领域对中国“坚壁清野”，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外部环境

美国执意将中国当作假想敌，把中国定义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威胁”。美国政客到处渲染“中国威胁”，挑拨有关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并利用盟友对其传统依赖，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拉拢甚至胁迫他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试图拼凑所谓“价值观联盟”，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美国种种挑动阵营对抗的做法对国际秩序稳定构成了严重挑战，对亚太地区及全球和平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美国财政部《2021 年制裁报告》显示，2000—2021 年，仅美国财政部对外实施的经济制裁就增加了 933%。据统计，美国上届政府累计实施逾 3900 项制裁措施，

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 3 次制裁大棒。截至 2021 财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 9400 多项，是名副其实的“制裁超级大国”。截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被美国财政部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和受封锁者（SDN）清单”的中国实体已达 395 个，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已达 2029 个，涵盖了教育、科研、通讯、军工、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美国对中国新疆等地区的制裁则给中国的光伏、棉花等产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同时，美国对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中国友好国家的严厉制裁，也使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受到了重大阻碍。

以光刻机、光刻胶为例，荷兰、日本和美国于 2023 年 1 月达成了新的协议，要向中国限制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光刻机。这意味着几个世界顶级的芯片制造设备大国将对中国形成技术铁幕。继 2022 年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之后，美国变本加厉，鼓动其盟友一起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拜登总统亲自会见日本、荷兰领导人，讨论遏制中国的相关措施。1 月 15 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表示，荷兰不会草率接受美国对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技术实施的新限制。1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电话就双边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几天荷兰就改变了态度。这次被卷入其中的企业包括阿斯麦（ASML）、尼康、东京电子等。禁售范围可能涉及极深紫外线（EUV）光刻机和最新一代深紫外线（DUV）光刻机，中国被卡脖子的是最先进制程（比如 5 纳米、7 纳米）的光刻机。一台先进制程光刻机，售价 3 亿~4 亿美元，甚至高于一架波音飞机。它的重量可达 180 吨，零件超过 45 万个。运输一台光刻机，需要使用 40 多个恒温恒湿专用箱、专业防震气垫车，以及 4 架次的波音 747 货机。高端的单反镜头支持 6000 万像素分辨率，而一台 7 纳米光刻机的像素可以达到 1600 亿像素，是顶级单反的 2666 倍。2021 年阿斯麦全年销售总额达到 4.02 万亿元，相当于北京市一年的 GDP 总量。

继英特尔“灾难级”财报之后，全球芯片巨头“爆雷”的消息如多米诺骨牌般来袭。2023 年 1 月 26 日，英特尔发布 2022 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其四季度业绩大幅下滑 32%，创下 2016 年来最低季收入；1 月 31 日，三星公布初步数据显示，按合并财务报表口径，2022 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利润 4.3 万亿韩元，同比下滑 69%，创 8 年来最低水平，最重要芯片事业群营业利润暴跌 97%；2 月 1 日，个人计算机（PC）芯片巨头 AMD 公布 2022 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第四季度净利润仅 2100 万美元，同比下降 98%。

中国已经将芯片产业放到第一目标，仅两年时间内，中国新增 6 万多家企业投身芯片研发，中企也取得诸多重大突破。在制裁下的华为开始逐渐转危为安，2022 年利润同比增长 75.9%；3 纳米光子芯片晶体管技术取得突破，有助于实现 3 纳米光子芯片量产；OLED 关键材料国产化；5G 小基站实现国产化。据企查查数据，目前中国的芯片企业数量已达 14.29 万家，仅 2022 年上半年就增加了 3.08 万家。进入 2022 年后，中国每天都在缩减芯片的进口数量。2022 年 12 月，台积电将 5 纳米先进制程产业链迁至美国亚利桑那州，美国高层和科技巨头为台积电新厂站台，让美国高层兴奋至极的是，台积电要追加投资到 400 亿美元，直接建设 4 纳米和 3 纳米工厂。中国在补短板和追赶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三五年甚至十年内仍处于劣势。

（四）中国面临国家现代执政能力亟需提高的挑战，必须在吸收物质文明的同时吸收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加快建设现代化国家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提高国家现代执政能力，当前不适应现代国家执政要求的主要

表现有：一是部分人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与西方制度。在一些官员和经济学家脑海里，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国家的实践，是衡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一条隐形准绳。二是创造性工作与负责任开展工作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存在比较严重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民粹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从校门到机关门，不了解中国国情闭门造车却指导全国；一部分地方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上下一般粗；一些地方政府及官员内卷和躺平同时存在，过多的务虚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相当部分政府官员浸泡在会议中，以此作为懒政和躺平的借口。三是一些领域治理不利或者还有治理空白。例如网络暴力、演艺人员合理收入、短视频及网络直播的规范化、元宇宙等新领域的管理等。四是舆论斗争不够有力。智库及学者在国际交往和舆论斗争中往往受到一些约束，在出国、发声、出版、合作研究等方面的管理一刀切，舆论斗争总体呈美西方强大、而我弱小的局面。美西方舆论铺天盖地，中国舆论场上除新媒体外，体制内学者和国家智库专家，由于受到约束多反而发声较少。五是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和关乎人民重要利益的措施具有随意性。以罚代管，以管代服务，缺少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必要程序，出台重大的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缺少必要的调查研究，或者制定政策急转弯，或者形成政策合成谬误，或者政策脱离实际。六是缺少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探索性的伟大事业，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探索达到具有共同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目标和特征，还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更有价值的现代化道路。这确实是一项艰难的使命和任务，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实践，创造和开拓一番不一样的境界和愿景。要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系统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既要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和问题，还要准备爬坡过坎，迎接惊涛骇浪甚至疾风巨浪的考验。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准方向，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目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思想，引导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工作，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体系与形态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22 年 10 月 16 日。
2. 新华社：《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华网，2023 年 2 月 7 日。
3. 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2 年。
4. 曲青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 年 2 月 16 日。
5. 潘圳：《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科学报》，2022 年 11 月 10 日。
6. 陈文玲：《世界经济大变局与中国的大战略》，《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年。

责任编辑：李 蕊

改革开放创新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奇帆

摘要：通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实现历史性跃升，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从现在到 2035 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创新，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方面，要消除地区间过度竞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行政配置资源、物流体系不畅、政策性梗阻、部分技术标准滞后的负面效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国有资本内外循环。开放方面，要推动 RCEP 规则在政策制度层面加快落地，支持扩大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支持开展双向投资。创新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

关键词：改革开放 高质量发展 统一大市场 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简介：黄奇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

2022 年以来，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通胀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严重受挫，全球性、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持续累积。而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认真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对冲各种风险挑战，才能真正统筹两个大局。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笔者认为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创新。

一、国内大循环的 8 个堵点

改革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多个环节，当下改革的重点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潜力，形成世界经济强大引力场的头等大事，需要我们以改革的思维、务实的措施消除经济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阻碍内循环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拓展市场新空间。从现实来看，当下至少有 8 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问题，造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第一，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第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市场分割。在要素配置方面，劳动力在城乡间、区域间的流动仍有

不少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一些在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在城市流通的同类商品外表看上去很像，但质量相差很大，甚至部分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受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这与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2021 年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就是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配置不平衡造成的。国家为此推出了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在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能。

第四，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2021 年，中国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4.6%，^① 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美国的物流费用只有 GDP 的 7%，欧洲、日本为 6% ~ 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 10% 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中国社会共识。基本原因有 3 个：一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铁路运量仅占总运量的 9.5%，公路、水路分别占 74.3%、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 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 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 15% ~ 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二是公路收费高。一些高速公路收费几十年了，到期了依然在收费。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建设—经营—转让”（BOT）收费期满，就停止收费。三是多式联运效率不高，还没有实现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无缝对接。

第五，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过去几年，治理过剩产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 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 837 辆、德国为 589 辆、日本为 591 辆，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 433 辆，而中国仅为 173 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现在一些城市的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从规划上把原来要建的部分写字楼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能拉动消费，又可以平衡市场。

第六，部分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中国是当今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家。同时，中国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目前中国钢结构产量仅占钢产量的 7% ~ 8%，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 40%，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 40 ~ 50 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 100 年以上。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既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现有钢铁产能，又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长远来看，还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等，一举多得。

第七，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需提速。由于种种原因，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目前正在实施的“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

^①国家发改委：《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降至 14.6%》，中国发展网，2022 年 9 月 26 日，<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n/fgw/2022/09/1800099.shtml>。

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需按中央的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

第八，国有资本内外循环有待打通。2020 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268.5 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 76 万亿元，^① 99% 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建立一批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要求，从现有国有资本中划转 10 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或股权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决定进退，既能盘活国有资本，又可以推动混合所有制，促进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畅通，扩大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

如何推动以上 8 个方面的改革，党中央早有部署：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到 2020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 年 5 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再到 2022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些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落实好上述文件精神，认真推动一批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助力经济循环。

二、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用足、用好 RCEP 开放红利

开放同样涉及各个方面，当下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实。RCEP 将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 5 个方面的发展机遇：一是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有利于扩大优势产品出口；二是服务贸易准入门槛降低，为中国发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设计服务、跨境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是原产地累积规则的深入应用，有利于深化区域内产业分工、优化产业布局；四是有利于高质量“引进来”，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五是有利于高质量“走出去”，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但是，这些红利、好处的产生需要各地方各部门用好、落实好。建议各地方从以下几方面深化 RCEP 政策的推广和应用。

第一，推动 RCEP 规则在政策制度层面加快落地。要系统梳理地方的法规制度，落实 RCEP 在营商环境改善、服务贸易和投资部门开放等方面的强制性义务，同时还要着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于那些没有被自贸试验区覆盖的地方，RCEP 的签署就相当于也享受到了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所以不要“等靠要”，要主动对接、适应。那些已经批准的自贸试验区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更高的对标要求，加快健全以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为重点的政策制度体系。

第二，支持扩大货物贸易。鼓励企业加强 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应用，支持社会专业机构为重点企业提供 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定制化服务，包括国别关税筹划、锁定高税差产品、将原产地规则纳入生产管理、开展进口关税优惠尽享未享情况调查、提供切换协定运用建议等。鼓励企业深挖对 RCEP 成员国的进口需求，引导企业在产品同质同价的情况下优先采购成员国产品，围绕成员国的消费特点研发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推动货物通关便利化，完善通关模式，简化产品预审手续，培育

^①国务院：《关于 2020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21 年 10 月 21 日。

RCEP 规则下的“经核准出口商”。

第三，扩大服务业开放，支持发展服务贸易。对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物流配送、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服务，对银行、证券、保险、产业链金融等金融行业，对跨境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各类进出口货物贸易相伴随的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服务贸易开放。要加快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伴随的银行、证券、保险、保理、租赁、金融结算以及跨境发债融资、投资、并购、资金集中运营等业务。同时，进一步优化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物流体系，建设面向 RCEP 的服务贸易信息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培训服务平台和融资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在自贸试验区内落实“简税制”“低税率”的要求，吸引一大批专业性强、效益利润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和专业人才。

第四，支持开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等。支持企业应用 RCEP 规则开展服务外包，发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贸易。对于合理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海关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对贸易合同货单、贸易清算结算税单和物流仓储货单实行三单分离审核。以这些政策带动加快发展保税展示进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其数据处理中心领域的准入门槛，减少限制范围。

第五，支持开展双向投资。在“引进来”方面，注重开展全产业链招商，重点招引掌握“三链”的跨国公司，同时用好开放政策将其上下游一并引进来，力争在 100 公里半径范围内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同时，还要注意引进 RCEP 成员国的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和世界 500 强跨国企业来华建立独立研发机构。在“走出去”方面，一方面要用好 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在推动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同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将价值链结算环节留在国内；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到 RCEP 成员国投资或收购科技创新企业、知名品牌、优质矿产资源项目等。

以上 5 个方面是各地方可以起而立行的，做好了可以产生万亿级红利，要加快落实。美国联合十几个国家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意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目前 IPEF 的 14 个成员国中，除了美国、印度和斐济外，其他 11 个国家都是 RCEP 成员国，而中国恰恰是这 11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认真落实好、用好 RCEP 的开放规则和政策，中国与其他 RCEP 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只会更紧密。2021 年 9 月 16 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10 月 30 日，最高领导人宣布决定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可以说，中国正在朝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开放全面迈进，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的新浪潮即将到来。任何想在产业链供应链上让中国与世界脱钩、“去中国化”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三、坚定不移强化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也是涉及多方面的，当下创新的重点要集聚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 40 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拉动。但是，目前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不论是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再通过大规模借债进行大量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减弱；在劳动力方面，城镇化率到了天花板，人口老龄化在加快，劳动力供给也下降了。要注意到，虽然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 76%，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 40%

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约为日本的 63%、德国的 44%。而且，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因此，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需要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除了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外，还要坚定不移强化创新：不仅要重视科技创新，更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组织创新。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应重点抓好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持之以恒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这是创新的“0-1”阶段，是实现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所必需的。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 GDP 的 2.44%，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投入占全部研发费用比重长期徘徊在 5%~6%，而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 15%~20%，差距较大。“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在“十四五”末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8%。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再经过 10 年能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提高到 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继续逐步提高。

第二，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能停留在“杂、散、小”阶段，要重点培育以下三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第一类是产业链中起到卡位作用的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这类企业是中国形成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工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第二类是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长期专注于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到生产技术或工艺全球领先、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在行业内起到核心导向作用，往往掌握着某一行业的定价权，控制着整个产业链中 30%~40% 的产值，影响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第三类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国际制造业领军企业大都已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目前，服务收入已占世界 500 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 1/4。随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绿色化、集群化和智能化，需要一大批专业从事研发设计、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等的中小企业。

第三，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来组织全球价值链，已进化成了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中国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本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从现在到 2035 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阶段。只要我们牢牢抓住这个重大机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这三件大事，眼前遇到的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地缘竞争甚至个别国家对我们的打压，都不足为惧。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新成果，扎扎实实地推动实现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李蕊

· 理论前沿 ·

依基本原理扩展的“剩余价值” 认知框架及“管理劳动”的相关辨析

贾 康 张新强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相关的两个假设角度入手，依基本原理探讨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认知框架体系。由此得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劳动和占有并管理生产资料的企业家（主）的劳动可同属于抽象劳动来源”的结论，以及“作为利润本质的剩余价值形成的来源，一部分来源于直接劳动，另一部分则来源于间接劳动（管理劳动）”的结论，从而合乎逻辑地在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系根基之上，扩展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覆盖面与解释力，并为更好认识“复杂劳动”与“管理劳动”的贡献，肯定企业家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以及正本清源认识“剥削”问题，理性把握“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并存问题，形成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劳动价值 剩余价值 管理劳动 剥削 分配

作者简介：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张新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一、基本概念、问题的提出和文献概述

（一）基本概念：三对“劳动”概念及内在的对应性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直接劳动（劳动）与间接劳动（管理劳动），这三对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中都有涉及，它们也都可以被视为在付出人身能力耗费维度上的一般无差别人类抽象劳动，即属于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一般而言，体力劳动、简单劳动和直接劳动这三者间，有更多的对应性和一致性；脑力劳动、复杂劳动和间接劳动这三者间，则有更多的对应性和一致性。卓别林电影中表现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所从事的劳动显然属于前三者，工程师、科研人员和职业经理人等的劳动则主要属于后三者。

本文还涉及另一对概念，即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与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主/管理者的劳动。以上这一对概念，也是在对劳动进行同质抽象的规定基础之上能够成立的，即两者都具备人的劳动能力可以按照时间与强度、复杂性等为计量单位而在“耗费付出”维度上的规定性。一言以蔽之，以上提及的四对概念，在共性上，这些劳动都具有人类无差别抽象劳动的性质。

（二）问题的提出

本文提出问题的切入点，是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原理而形成的重大思想贡献即剩余价值学说，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其原理性意义如果仍然成立，那么由劳动创造而来的“剩余价值”这一核心概念的“劳动主体”的边界是什么，是否应合乎逻辑、回应现实地有所扩展？

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清楚界定究竟什么才是商品价值决定的因素。关于价值理论，经济学界存在三大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的供需均衡价值理论体系和斯拉法的商品价值体系（孟奎，2013）。在马克思主义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其来源之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应该正本清源，在坚持将劳动作为价值与其交换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形成实体的原理性认识基础上，亟有必要结合时代发展和新的经济环境，深化对古典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在确定（剩余）价值来源的内涵是劳动的大前提之下，有必要从更为开阔的视角对价值来源的外延，即相关的劳动都包括哪些，进行基本的整理。

（三）简要综述

裴小革（2001）曾提出，“在不研究人们除市场交易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经济关系的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各种学说中，是不存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工人出卖的是自己的和其他物质生产要素一样的劳动，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加到产品中的价值得到收入，所以不会生产出剩余价值，利润的产生与工人的劳动无关”。最为彻底地批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庞巴维克就断言，“如果价值仅以劳动含量为基础，那就不能解释现实世界的价格和利润。如果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价格和利润结构，那么断言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工人剥削的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崩溃了”（杨玉生，2002）。在日本，柄谷行人则用他的浪漫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尝试解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比如他认为“产业资本的增值（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的产生）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时间’意义上互不相同的两种价值系统来获得差额。这意味着生产领域剩余价值的产生只和劳动生产率有关，而和工人的生产劳动无关”（王庆丰，2013）。以上对于剩余价值的否认，以及对于剩余价值来源的完全割裂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相关性的解说，都是我们所不接受的。

本文限定（剩余）价值来源的实体只是劳动这一前提，但接着需着重讨论的，是对于价值及其剩余价值来源的外延分析如何理清认识，这依然纷争不断。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剩余价值（surplus - value）被规定为“在生产过程中由雇佣工人新创造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徐光春等，2017），也就是由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出来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由此形成了必要劳动、剩余劳动这一对区别。但直到如今，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深化中，还有从复杂劳动、脑力劳动、管理劳动（间接劳动）等角度对剩余劳动来源进行的不断探索。比如，有论者提出“工人的劳动是微观的，而资本家的劳动却侧重于宏观方面”，由此认为“剩余价值是由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资本家并不是剥削了全部剩余价值，而只是无偿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张大增等，1988）。虽然这里“微观劳动”“宏观劳动”的概念并不严谨，但在这类认识框架之下，显然意味着雇主的劳动也至少是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来源。柳昌清（2003）在《试论知识参与创造剩余价值》一文中，尝试说明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是剩余价值创造的源泉而非“剥削”获得的来源，“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增加知识创造者的劳动量，所以，资本家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质就被大大地淡化了”。该文实际上已经初步肯定了作为直接劳动以外的间接劳动，及其作为间接劳动主干的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也成为剩余价值形成的源泉，

只不过尚未在理论探索上更进一步。比如，没有直接肯定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包括“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劳动应被认为是相应地以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为劳动特质的另外一种形态的管理劳动，从而有可能成为剩余价值形成的源泉。此外，李光玉（2018）在《剩余价值理论的三大现实挑战及回应》一文中，一方面承认作为被雇佣劳动者的管理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一旦劳动从属于资本之后，管理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一样都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直接同资本交换，不仅把资本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并且还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在这里，管理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又认为，同一的管理劳动（活动）只是因为出现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由此就作为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标准，“可见，资本家的收入本质上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本家管理劳动是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这种劳动所得就是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剩余价值量的大小不是取决于管理劳动的努力程度，而是取决于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而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的劳动性质只是由于劳动者关系之间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差别”，而导致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剥削属性的差别，这样的解释显然牵强，难道同一性质的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及其有无剥削性，只是来源于劳动主体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的差别？这无法自圆其说（在产业工人已广泛持有股份的现代社会，这一点更加明显）。如果坚持劳动作为商品价值形成的唯一来源，那么由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推导出，剩余价值即利润的产生，也会与资本家、企业家的管理劳动有关。

以上综述可以初步得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是不被视为劳动者的，从而他们的活动也不会被视为劳动，由此更不可能创造劳动价值及其剩余价值，这是很长时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前提。而对这个大前提，我们有必要作更展开的讨论，以求得合乎科学规则、逻辑规范的认识延伸与丰富。首先，对此大前提的形成，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及古典经济学的原始文本中去作追溯。

二、马克思所阐述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基础之一： 在《资本论》中，雇佣工人的直接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由一组较清晰的假设条件，经分析论证综合形成的思想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作更为开阔的延伸考察与讨论。在马克思看来，形成剩余价值的本质，是来源于资本私有制的存在而导致的资本所有者购买劳动力商品后，在其使用中所带来的不劳而获的剥削。这对于《资本论》聚焦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任务，意义十分明显。如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提到的那样：“顺便让我们来夸奖一下这里的教授法：不论剥削这个词现在所取得的意义如何别致，并且离它的平常的意义有多远，不论它得自自然法、经院哲学、启蒙作家的支持如何可疑，它到底被接纳到科学论证的领域之内，从而有助于帮助其门徒进行战斗。”^①如完全从学理思考出发，我们有必要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论证并提出剩余价值这个概念的。在这里应有两个视角剖析马克思是如何形成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并形成逻辑自洽的：可以将他在理论创作中的探寻作为第一个视角，将早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认识如何启发他分析论证剩余价值作为第二个视角。

首先看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定义。《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提出：“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

^①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8页。

形式是 $G - W - G'$ ，其中的 $G' = G + \Delta G$ ，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值额。我把这个增值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值了”“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值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① 可见，马克思最开始在头脑中酝酿这个有创意的概念时，是通过货币流通逐渐深入的。可是很快，马克思的思路在《总公式的矛盾》这一节出现变化，他强调剩余价值不应该是从流通中形成而只能是通过生产形成，“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② 他拿葡萄酒生产商和谷物生产商的交换来论述这个道理，认为葡萄酒生产商生产了比如 100 价值的葡萄酒，但是谷物生产商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内生产了 100 价值的谷物，于是葡萄酒商和谷物商的交换就只能是等价交换。此外，他又论述了交换中“假定是非等价物的交换”这一形式，认为在商品市场上普遍的加价行为，卖者加价 10% 卖给买者，可是买者又同时作为卖者加价 10% 卖给最初的卖者也就是这笔交易的买者，想必这种普遍的加价并不能使每个人获得剩余价值，接下来又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互为卖者和买者来论述了这样的交易同样不能产生剩余价值。总之，马克思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剩余价值不应该是从流通中形成而只能是通过生产形成。

让马克思更加执着、更费心思的是，他如果试图证明剩余价值不是在交换（流通）中形成，那就必须要说明剩余价值是如何在其他“地方”形成的。他把这个“地方”归为不占有生产资料并被雇佣的工人的生产领域。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试图从反面说明剩余价值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那么他在第五章从正面讲述的一个故事，就是资本家是如何像变戏法一样使价值增值了。以资本家组织的生产棉纱劳动为例，“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因此，工人在工厂中遇到的，不仅是 6 小时而且是 12 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 10 磅棉花吸收 6 个劳动小时，转化为 10 磅棉纱，那么 20 磅棉花就会吸收 12 个劳动小时，转化为 20 磅棉纱。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在这 20 磅棉纱中对象化了 5 个工作日，其中 4 个工作日对象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量中，即 24 先令，1 个工作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的，即 6 先令。5 个工作日用金来表现是 30 先令，或 1 镑 10 先令。因此这就是 20 磅棉纱的价格。1 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 先令 6 便士。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 27 先令。^③ 棉纱的价值是 30 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 $1/9$ 。27 先令转化为 30 先令，带来了 3 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④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意在由此让读者明白一个道理，即这种剩余价值只是雇佣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和资本家没有一点关系，这成为资本家对普通劳动者赤裸裸的“剥削”。在他对商品价值变动的分析框架中，完全忽略资本家介入生产活动中所发挥的任何作用，在这一章中马克思所用的概念、思路，都只是结合这个逻辑框架。

还需交代一个已知相关的关键性概念，是马克思在第五章中讲述剩余价值只能是从雇佣劳动者的生产中产生时，提出的一个由他表述的新概念——必要劳动（时间），并在第七章论述绝对剩余价值时，做出理论上的系统化论证。雇佣劳动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和劳动能力如何划定这个必要劳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1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84 页。

③24 先令的不变资本，3 先令的可变资本投入。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26 页。

动时间，并由此推出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及其创造的价值呢？首先从“定性研究”角度看，剩余价值概念正确不正确，要看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剩余价值以及形成剩余价值的上位概念——必要劳动时间及必要劳动价值的概念论证是否符合逻辑。很显然，从客观现实角度看，在每个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中，的确有一部分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存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必须从事劳动的时间，李嘉图就首先表述过相关观点，比如他提出的“劳动的自然价格”^①。只不过到了“定量研究”视角，这段时间究竟是多长，即这个必要劳动时间为什么不能再短点亦或再长点？反对者提出：“实际上，把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还把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仅仅从实际的生产过程进行这种区分是不可能的”（柄谷行人，2006），“可见，哈特和奈格里将劳动力价值和满足劳动力生命需要的使用价值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劳动力价值自然也就无法量化。剩余价值要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劳动力价值无法量化，那么剩余价值也就必然无法量化”（李光玉，2021）。

但以上无论是从交换流通领域并不形成剩余价值的视角，还是从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的视角分析，都不能必然引向资本家、企业家（管理人员）不创造劳动价值这一命题。马克思在论证这两个作为大前提的命题时，隐匿遮盖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前提，正是这个并没有被明说的大前提构成了上述两个视角认识的支点。这个大前提就是，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其他人从事直接劳动的一切其他活动，并不具有抽象劳动的特质，由此就不具备创造劳动价值及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可能。这本身应是需要在科学探索中论证真伪的假设，但却被马克思当作值得肯定且隐匿化的最大前提。“在这一点上，‘论证’掩盖了这种消失，但是也暴露、背叛了这种消失。”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原点之一，“这个本质方面既是可以看见的，又是隐藏的，既是出现的，又是不出现的。它的不出现是由它的出现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是由马克思的革命的发现的令人困惑不解的独创性决定的”（路易·阿尔都塞和艾蒂安·巴里巴尔，2017）。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起始于马克思，还有必要向前端来源作追溯。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的形成基础之二： 在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同样只认可不占有 生产资料的主体活动才是劳动

第二个视角，则是看马克思所处时代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是如何分析论证剩余价值来源的。想必读者会产生一种疑问：为何资本家的劳动不创造价值，亦或资本家占有并管理生产资料的实践活动不算作劳动？因此就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假设的另一个认识源泉。

先回顾剩余价值发现史。首先，重商主义学派的斯图亚特提出了让渡利润或贱买贵卖说，魁奈提出了土地纯产品说，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或节欲报偿论以及资本家的劳动说，欧文的货币存在论，马尔萨斯的流通领域剥削说，萨伊的非劳动要素收入或创造说，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解释占有生产资料并作为雇主的经济主体的收入来源的成因。而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创者的亚当·斯密，则将其理解为是其他生产要素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无偿扣除说，以及大卫·李嘉图的为了工人总体收入的增长或积累而不得不无偿提前扣除说（刘永佶、王郁芬，1992）。在他们纷繁芜杂的理论模型中，其实都隐含

^①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了一个没有明示的大前提，似乎资本家的劳动是不能算作劳动的，只是没有像马克思这样既隐晦又明确地规定、肯定之。通读古典经济学家所规定的劳动概念论述，充满了对对应生产过程的各种劳动相关因素的现实考量，但是唯独没有将区别于工人的资本家、企业家的劳动也当成一种特殊的更有价值的劳动。因此，资本家自己所表现的生产性活动也就不创造（形成）哪怕一丝一毫的价值。这自然而然就得出了：为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者的劳动，就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可是这理论因此又自相矛盾：既然商品的价值形成中只有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商品中除了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对象客体的保存价值以外，又从哪里形成利润呢？于是他们只能将这种情形归因于，是资本家的可变资本和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不等价交换。对于这种不等价交换，亚当·斯密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区别于古代封建简单商品经济的经济特征，从而出现支配的劳动和耗费的劳动的不一致。“由于在文明国家内，交换价值单由劳动构成的商品极不常见，大部分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含有大量的利润和地租，所以，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①而实际上亚当·斯密在这里强调的劳动量所对应的，都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直接劳动者的劳动，不包括占有生产资料者的雇主方生产实践行为所耗费的劳动量。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要与那些同时代坚持多元价值源泉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做理论上的斗争，比如穆勒、萨伊、孔狄亚克等。像萨伊从亚当·斯密那里借用来的“三位一体公式”，就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协同创造的。而借用的这三个要素所形成的要素价值就构成了三种收入：工资、利息和地租。这三种收入相当于三个要素在创造效用时各自耗费的代价，构成效用的生产费用，于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是资本和土地两个要素协同创造的。马克思对这一点有所批驳，他认为这是拿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来说明生产商品价值的源泉。此外，还包括像孔狄亚克提出的效用价值论等，属于类似的表述，而穆勒或是麦克库洛赫则认为资本也是一种积累劳动，从而区分于那种工人的直接劳动。可是难道资本家的技术变革、经营管理决策劳动，就只是积累的劳动，而没有与工人那种直接劳动性质相同的活劳动吗？又比如，到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而商品的价值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评价，该价值论是建立在戈森第一定律即效用递减法则基础上的。总之，与马克思相对立相区别的多元价值论，比他所坚持的劳动价值论的队伍庞大很多。

本文重点分析一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对形式上的剩余价值的相关论述，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观点最接近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商品价值是由耗费的劳动直接决定的，显然这种对“商品背后所能支配的劳动”的理解很有意义。比如，一件商品由工人的直接劳动创造的价值是 10（通过其工资来体现），但是最后该商品卖到了 15 的价值，那么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商品背后所能支配的劳动”就可以有两种理解，即资本家扣除了本也是工人的直接劳动所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 5，或资本家的劳动在这个商品形成中贡献了接近 5 的价值，只不过资本家是以间接劳动所贡献的价值对应于工人直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李嘉图所理解的只是前者而非后者：“亚当·斯密准确说明了交换价值的最初来源，所有物品的价值与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是成比例的，他应当使这一逻辑保持一致性，但是他却确立了另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并声称物品价值的大小随着交换衡量标准的变化而变化。他有时将谷物作为衡量标准，有时将劳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所说的劳动并不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指该商品在市场上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似乎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六章，商务印书馆，1972 年，第 48 页。

这两种说法是等同的，就如同一个人的劳动效率提高一倍，他生产的商品量随之就会增加一倍，那么他用这种商品交换其他商品获得的量就会比以前多一倍。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如果工人的报酬与其生产量总是成一定的比例，那么工人在商品中耗费的劳动量应该与这件商品所购买的劳动量是相等的，并且这两种劳动量中的任意一种劳动量都可以准确地衡量出其他商品量的变化：但是两者并不同。”^① 李嘉图看似抓住了亚当·斯密第二种价值论的矛盾，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劳动者的报酬总是和他的生产量成正比，那么投在一种商品内所需要的劳动量和该种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就应该相等，可事实上却并不相等（显然该种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是要大于投在其中所需要的劳动量）。这虽然只是因为劳动效率上升了一倍而导致商品内在的劳动消耗价值减小为之前的一半，但是其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相统一条件下的交换价值，即所能换得的劳动量却依然近乎等同于（或略低于）劳动效率没有增加一倍时的商品价值。从以上来看，这种差别形成的原因，依然是没有将所有参与商品创造的劳动者的劳动，都认定为同一抽象劳动本质前提下的两种异质类型的具体劳动所导致。这也为李嘉图的反对者包括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并批判“李嘉图两难”这一伪命题提供了可能。

反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不彻底、缺失甚至自相矛盾提供了解决途径的。马克思提出了一整套在现实经济体系中相当大程度能够实现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如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与劳动力以及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劳动价值明确区分的理论等。这些为马克思版本的剩余价值理论创新做了原理层面的支撑，而这些解释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比如劳动力价值和资本交换是等价的，但工人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其为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力价值，从而产生被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利润），因此就能解决马克思的思想前辈们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上论证的不充分、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但不得不进一步反思的是，这种解决的办法仍然存在逻辑断点。正是这样一条解决途径，视工人劳动为价值唯一源泉，随之使剩余价值剥削论成为必然。除了马克思在谋划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过程中，始终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最高宗旨而引向否定（扬弃）资本私有制以外，另一重要的成因，就是在马克思之前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也没有明确将非雇佣工人的活动视为同属人的本体活动并赋予其劳动价值。进而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② 是“凝固的劳动”“僵死的劳动”，而且他把管理“死劳动”的资本家、企业家的市场调查预测、生产经营方案设计与决策等活劳动，也一同认作死劳动，即不属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范畴。

总之，马克思在有所批判中继承了以往的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真正的劳动”这一思想，从而认为作为利润、地租等本质的剩余价值，只是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占有者所获得的剥削收益。上文所提到的第二个大前提，也是古典经济学家不予否定的。基于此，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者是创造价值的，而因为资本家在这个生产全过程中没有与工人的劳动形态相似的劳动特征，由此资本家的“劳动”形态并不创造劳动价值，于是作为商品的总价值扣除必要劳动价值，就是资本家赤裸裸地“剥削”普通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能不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逻辑体系虽总体上是自洽的，但论证逻辑链条上又是存在遗漏项的。合乎逻辑地以科学精神研讨这一问题而作出应有的延展认识，是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后来人应尽的职责。

^①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8页。

四、剩余价值来源应包括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生产实践活动

如上所述，马克思连同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把以非体力消耗为主的创意设计、管理生产资料（比如管理土地等自然资源、数据、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知识等）并雇佣其他人劳动的企业经营活动（市场调研分析和预测、投资风险评估与决策、市场营销思路指导与贯彻等）视为劳动，由此不认为这些也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接下来笔者意图做出弥补遗漏项、连接逻辑断点的补充，必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资本要素所参与的收入分配。

对此，已有论者提出，“在新古典要素价格理论中，企业家仍然被看成企业资本的所有者，尽管他也利用一部分借入的资本，而企业家才能实际上被看成了一种边际生产力很高的特殊劳动要素，其所获得的正常利润也就成为了支付给这种特殊劳动要素的报酬”（胡罡、楚建波，2003），“也就是说，生产劳动者的范围不是仅仅局限于在第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它包括从事管理劳动的资本家，从事发明创造的专业技术人员等脑力劳动者，只要实际参与了生产过程，为生产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实际贡献的人，都是总体工人（总体劳动者）的一员，都是劳动者”（冯海波、张峰，2011）。还有论者指出“尽管斯密、马克思等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很重要，但至今还没有清晰地界定总体劳动从哪儿开始，以及到哪儿结束，不仅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合理答案，甚至至今还没有任何人找到让人信服的答案，即社会劳动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它们在价值创造中所起的作用究竟如何理解？……一般地，直接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可以直接由它的劳动量来衡量，非直接生产的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则主要由它增加直接生产劳动的有效性及相关增加的价值量来衡量”（朱富强，2022）。这意味着，从以往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也可以有所批判地开辟出广义的劳动价值论，而非从马克思所限定的只有工人的直接劳动才作为唯一的价值创造（或形成）来源。从这个视角进行理论上的开辟，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实际生活中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纵观那些非劳动价值论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价值及其来源，其背后驱使并承载非劳动生产要素价值形成的（生产）实践活动，正是以企业管理者、资本运营者、土地开发者以及科学技术人员等脑力劳动者或至少绝大多数是非简单体力劳动者等为主体的这一类人的劳动。而这一类占有生产资料的行为主体，其管理各类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从事科技创新等活动，正是形式上区别于作为主体的普通劳动者主要以体力耗费的方式直接作用于（生产）实践客体的那些劳动形态的劳动，从而表现为主要以脑力消耗的方式间接作用于（生产）实践客体的那种劳动形态的劳动，但在人类“抽象劳动”意义上却是本质相同的人类劳动。“因此，在我们所研究的关系中，具有实际上推动社会生产资料的能力的要素（劳动者）不仅由雇佣劳动者和非雇佣劳动者（智力劳动者）构成，而且也由执行监督和组织这些技术职能的资本家本人所构成”（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2017）。

当我们深究马克思本人对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以及劳动的定义时，同样可以发现，对它们的界定不仅适用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的劳动，也完全适用于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主的劳动。需特别注意的是，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

身”“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只不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被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像马克思当年所论述的那样，更多是以生理上体力耗费为主的劳动，是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或劳动资料的劳动，从而区别于那些以生理上脑力耗费为主的劳动，以市场分析预测、资本融通、科技创新、管理分工、配置资源、风险控制、经营决策等这一类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或劳动资料的劳动，但绝不能就据此说这些生产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者的劳动，就不是劳动或不具有抽象劳动的实质了。

狭义劳动价值论派的经济学者人为割裂了广义层面的劳动及其生产范畴，从而也就给马克思肯定“工人劳动是唯一创造价值的对象”这一显得极端的论断埋下了伏笔，并客观上促使劳动价值论派越发成为经济社会中许多人直观感觉上的一种并不符合现实的异端，似乎只表明了马克思式“抽象价值”学说的独特性。如果能充分理解而认知了马克思“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理论已具备的基本逻辑框架上的自洽性，并基于基本原理而推演、延长其逻辑链条以弥补马克思有生之年未能察觉和填补上的遗漏项，那么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成果，不再把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资本家、企业家、雇主等形式上有不同称谓但本质上却是颇为一致的社会成员）及其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价值排除在外。马克思当年，为了突出强调剩余价值相关的剥削论必然成立，将占有生产资料主体的这些广义生产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价值排除在外，而今，如果我们不将这些广义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价值排除在外，就会因为在两类经济主体之间剩余价值分割的比例差别，必然带来剥削并非对应 100% 的剩余价值的认识。

亚当·斯密其实也试探性地说明过，与工人的工资相区别的占有生产资料的实践主体的收入是“特种劳动”所得，比如“资本的利润只是特种劳动工资的别名，换言之，不外是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但他又立刻觉得这种理解方式很棘手、很“矛盾”，于是他又提出“但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②事实上，如果亚当·斯密能够坚持像马克思那样的抽象劳动观并有所发展，只是将承载这种同一抽象劳动形态的劳动力主体作出形式上的区别，比如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很可能就不会让日后的马克思借自身提出的抽象劳动概念，隐晦地肯定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实践不具有抽象劳动的特质，形成这一内含对抗性而非包容性的理论框架了。进一步说，两种类型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倘若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受两个完全不同方式的原则支配，那我们就可以用类似于西方经济学已有的技术性的生产函数，比如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那样的形式，用同一个劳动计量公式的骨架，却在其内赋予不同的系数和计量单位。比如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商品价值计量公式的骨架中，都包含有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和劳动复杂度，但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商品价值计量公式还包含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质量及其对应的配比系数的大小（对应于“按要素分配”法则）。这样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占有生产资料的实践主体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实践主体同样具有同一抽象劳动特质，而技术化的计量形式则可以是区别化的两种类型的计量公式。

既然劳动力在交换经济中作为商品而存在，在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类型的劳动力价值计量公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0、207、195、207~208 页。

②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 年，第 43 页。

式。首先假设单位时间的劳动强度系数是 s ，单位时间的劳动复杂度系数是 c ，劳动时间系数是 t 并假设等于 1，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劳动计量系数要包含每个系数的配比系数，并设为 s^l ， c^l ， t^l ，于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简单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公式则可以计量为 sct ，而占有生产资料的、从事管理性质复杂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计量公式则可以是 $s^l c^l t^l$ ，小字母则为劳动计量系数的劳动配比系数。据此，我们可以根据一段时间内的所有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集合矩阶来确定各自劳动力商品的值域，以及由之前确定的 s 和 t 以及 c 的大小，来倒推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其各自的劳动配比系数的大小，或由之前确定的 s 、 t 倒推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各自的劳动复杂度系数 c 的大小。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这种倒推所得出的劳动计量系数与客观真实发生的劳动计量系数（包括配比系数）似乎并不一致，这很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商品的市场价值往往受到更复杂的供需因素影响而出现了暂时偏离劳动主体的劳动自然价值计量系数及其配比系数的值；二是占有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劳动自然价值系数及配比系数也是动态调整的，这种动态调整往往体现了两个类型的劳动力商品的自然价值受制于各自的市场价值波动情况。^① 从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者（力）商品的自然价值和市场价值是可以在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动的情形下纳入统一的认识框架，即劳动力商品的市场价值既可以按照其自然价值进行波动，劳动力商品的自然价值也可以随着持续变动的市场价值演化趋势有自我调节。从以上来看，可最终体现为在市场经济社会，统一的劳动计量公式下的按劳分配（这里的按劳分配具有新的内涵，即劳动力商品的市场价值需要按其动态调整的自然价值进行调节）与按要素分配（这里的按要素分配也具有新的内涵，其本质是劳动力商品的自然价值调节也需按其市场价值演化趋势进行自我调节）是可以广义化而合理地形成其包容性的。

对此展开，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对剩余价值的新认识。一是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和占有生产资料的管理劳动者的劳动共同创造的。设不占有生产资料并被雇佣的劳动力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为 $l^{\top}$ ，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其他人劳动的劳动力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为 $l^{\text{占}}$ ，剩余价值为 m ，工人获得的工资为 v ，则 $l^{\top} = s(\text{工}) c(\text{工}) t(\text{工})$ ， $l^{\text{占}} = s(\text{占}) c(\text{占}) t(\text{占})$ ， $v = \text{工人实现的劳动价值} = \text{被雇佣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那么 $m = s(\text{占}) c(\text{占}) t(\text{占}) + s(\text{工}) c(\text{工}) t(\text{工}) - v$ 。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高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低估了构成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二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人均被剥削的劳动价值 = $[s^l c^l t^l - s(\text{占}) c(\text{占}) t(\text{占})] / \text{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人数}$ ，而占有生产资料的管理劳动者人均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 $s^l c^l t^l - s(\text{占}) c(\text{占}) t(\text{占})$ 。三是影响 $v/l^{\top}$ 和 $m/l^{\text{占}}$ 即偏离系数大小的因素，往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较为稳定的，而影响这种较为稳定的偏离系数的因素往往是多元的。鉴于分析的复杂性，这里只是提出该命题，有待以后进一步深化分析说明。

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在其理论体系中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忽略了复杂劳动或是脑力劳动概念体系的展开考察，这种劳动异质性的忽略，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即认为（或隐含认定）一切劳动力商品的劳动复杂度都是同一的，这会带来劳动复杂度的差异性被抽象掉，变成同质同一的了。但是我们

^①需要说明的是，稳定的市场调节机制指的是那种由于更大程度上可以预知的供需所致的商品价格变动调节，相对应的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商品的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价值的变动，因此其价格变动相对更加平缓，同时这种机制中的价格变动一方面作为果，另一方面又作为因，来动态良性地调节生产要素的市场供需结构优化。非稳定的市场调节机制是由于更大程度上不可预知的供需调节因素所致的商品价格变动调节，因此其价格变动相对更加剧烈，往往这种机制中的价格变动只是作为市场调节机制的果，并不会自发地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的市场供需结构，正文中提到的第一种情况就符合这点。但无论是哪种机制，在这里所说明的供需调节的变量主体都是劳动者，既包括被雇佣劳动主体，也包括管理劳动主体。

可以发现，这个规律如果在原始社会或是古代私有制社会是近乎适用的话，到了技术变革系统演化水平高度提升的现代化大生产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这种假设的现实环境就基本不存在了，因此这种理论模型也就缺乏适用性了。可这又要回到上文提到的逻辑自洽性问题上，即如果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异质性，那么他的理论体系中就必须允许交换价值同样通过倍加价值或是交换过程来形成，这一命题存在且合理化。而且进一步说，马克思如只是关注于承认随劳动生产率上升，商品价值只是下降不上升，那也会引出如下认识：如果承认商品价值也上升以后，就涉及同一类商品的劳动异质性问题，也就是这一类商品价值上升的创造归属问题。是工人的劳动变复杂了吗？可是结合现实来看，这种产品的直接生产工人的劳动复杂度并没有同比例增大，甚至就没有增大。或者是工人的劳动强度变大了？还是雇佣管理他们的领导劳动变复杂了，从而价值变大了？如果都变大了，谁创造的部分更大？如何分配？这直接导致了同一商品只由单一主体创造价值论认识体系的不周延，而合乎逻辑地应该转变为同一商品的多主体创造价值论。于是，所谓剩余价值100%“剥削”论便难以成立了。显然，有意或是无意地忽视了同一商品的多劳动主体论和劳动异质性思想（忽略了复杂劳动及脑力劳动的展开分析），是理论体系中的不足，而又是可以基于马克思已提出的逻辑框架基本自洽的原理性认识，而加以延展弥补的。如果对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做出进一步的科学发展，就需要更好结合垄断理论、效用价值、超额利润、技术变革等概念进一步凝练、丰富和完善。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剩余价值并非全部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是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主（资本家）的管理劳动、职业经理人（企业家）的管理劳动与工人的劳动共同创造的。简要归结为两点：即“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劳动和占有并管理生产资料的企业家（主）的劳动可同属于抽象劳动来源”的结论，以及“作为利润本质的剩余价值形成的来源，一部分来源于直接劳动，另一部分则来源于间接劳动（管理劳动）”的结论。而这也为剩余价值剥削论的解构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如果沿尽可能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认识链条而形成的认识框架，定性地说，应是：（两种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产出物）的价值；在其中，抽象劳动包括“简单劳动倍加”而成的复杂劳动、管理（决策）劳动的折算，而不论这种劳动主体有无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些劳动主体中，既包括从事管理活动的“资本家”，也包括“职业经理人”，还包括“有股权的企业员工”。股份制下，惠及“食利者”（依股权规范而取得红利者）的“不劳而获”，则可认为至少有一部分是对其“用脚投票”的“决策劳动”的“风险回报”。

因此，“剩余价值”不是仅以“剥削”可以概括的概念。如做理论联系实际的考察，可简要提及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早年“血汗工厂”式剥削，已随法规、社保、工会等相关制度机制的发展而得以遏制。对于可能存在的“资本对劳动强势”的相关因素（可能包含部分“剥削”因素）的认识（如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所指出的基本结论所示），需要做出更为细致、复杂、全面的分析。

当然以上的结论，只有在更为系统深入展开的逻辑框架中才能得到更加细致、丰富和完整的说明。比如，为何在面临假设同一劳动强度及复杂度、时间等条件下，一般而言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比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比占有更少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其劳动力

价值更大?^① 进一步说, 古典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成因的分析, 除了建立在本文所指出的“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主体的活动不算作是劳动”这个大前提下, 还包括像马克思和马尔萨斯等人对其分析的命题的范畴产生直觉上的偏差所致。比如, 本应分析“剩余价值的生成”或是“剩余价值即占有生产资料的管理劳动者的收入为何比工人的廉价工资更高,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高得离谱”的成因分析, 但往往在过去却被归结为“剩余价值为何具有‘必然’的剥削性”这一过于简单化的命题。这只是因为某种假设条件下, 这个命题并不具有存在的必然性而只具有或然性, 由此原认识框架中的遗漏项所引致的归因偏差, 带来进一步认识上的偏差, 即认识路径表述上的彻底分离。因此, 面对马克思身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 关于“肯定企业家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科技第一生产力功能作用”“管理决策科学”“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等方面密切相关于复杂劳动、间接劳动、管理与决策劳动等概念的认识进步, 严谨的、求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很有必要基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基本原理, 将马克思的认知体系中的遗漏项造成的意识构造框架中的认识偏差矫转回来, 从而得出更为科学、全面的认识结论。

参考文献:

1. 孟奎:《经济学三大价值理论的比较》,《经济纵横》,2013 年第 4 期。
2. 裴小草:《当代国外经济学家剩余价值理论评述》,《经济研究》,2001 年第 9 期。
3. 杨玉生:《评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
4. 王庆丰:《剩余价值理论新释——马克思〈资本论〉的柄谷行人解读》,《学习与实践》,2013 年第 4 期。
5. 徐光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崇文书局,2017 年。
6. 张大增、郭利平、杨晓明:《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学术研究》,1988 年第 5 期。
7. 柳昌清:《试论知识参与创造剩余价值》,《中州学刊》,2003 年第 6 期。
8. 李光玉:《剩余价值理论的三大现实挑战及回应》,《湖北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9. 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
10. 李光玉:《非物质劳动理论可以解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吗?》,《理论月刊》,2021 年第 3 期。
11.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
12. 刘永佶、王郁芬:《剩余价值发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13. 胡翌、楚建波:《价值分配理论与人力资本定价》,《经济论坛》,2003 年第 16 期。
14. 冯海波、张峰:《马克思理解的“剥削”和“资本家”》,《科学社会主义》,2011 年第 1 期。
15. 朱富强:《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劳动性质辨析——提高劳动有效性的两套劳动》,《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 李 蕊

^①这里用假设二字是要说明某些劳动计量单位的计量系数并不是通过单一生产端直接确定的, 比如劳动复杂度计量系数, 而是要包括在交换端乃至整体的生产关系结构的抽象化中才能形成较为稳定的劳动计量系数。

国际支付手段的更替机制及启示

陈炳才

摘要：本文介绍了黄金、英镑、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历史情况，重点分析了英镑替代黄金、美元替代英镑的原因和机制，分析了美元霸权形成的原因及挑战美元的难度，并就货币替代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本文认为：金本位货币制度支持了英镑国际化，英国海上霸权和工业革命是英镑国际化的坚强后盾；美元替代英镑在于英镑地位下降、美元地位提高，两次世界大战和美国主动作为，成就了美元崛起和国际化，而摆脱黄金约束后的美元逐渐走上全球货币经济发行的霸主地位。本文提出：国际贸易需要一种可自由兑换货币或信用物，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货币必须可自由兑换，国际支付手段的本质是信用和价值尺度，外汇管制和汇兑危机源于货币可兑换性不足，国际货币替代的关键或前提在于货币是不可替代品、是信用物。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支付体系始终存在，也是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同时，要看到国际货币地位替代时间漫长，但也存在突变机遇。

关键词：国际支付手段 国际货币 金本位 货币国际化 储备货币更替机制

作者简介：陈炳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

主权国家通过政权、法律的强制使纸币在国内履行基本职能，但在国际上则行不通。那么为什么少数货币（或者称为主要货币、储备货币）能够在世界流通、支付、结算呢？这是研究货币国际化需要回答的问题。国际支付手段（国际储备货币）是指从事跨境贸易、投资、金融交易等活动的国际货币，只是表达的角度不同。历史上，国际支付手段种类很多，但作为大规模的跨境贸易、投资、金融交易等活动的支付手段，19 世纪以来主要是白银、黄金以及与黄金挂钩的纸币。本文着重探索黄金尤其是与黄金挂钩的英镑、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历史演变（更替）机制，并归纳总结其带来的启示。

一、黄金作为世界支付手段的历史

以黄金作为法定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于 19 世纪早期在英国诞生。1816 年英国通过《金本位制度法案》，确认以黄金作为本位货币来发行纸币，规定一盎司黄金为 3 镑 17 先令 10.5 便士。1819 年英国颁布条例，要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 1821 年能兑换金条，在 1823 年能兑换金币，并取消了对金币熔化及金条输出的限制。从此，英国真正实行了金币本位制，直至 1870 年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毫不

动摇的金本位国家，在 20 世纪成为被效法者。^①

1813—1848/1850 年，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盛行了几个世纪的银本位。1867 年举行的第一次国际货币会议上，除荷兰外，所有国家都赞成金本位，1871 年德意志帝国改银本位为金本位。^②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就已经是金本位了。1878 年以来，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富有的法郎国家，不仅采用金本位，而且不断补充黄金储备。19 世纪 90 年代，所有国家都热衷于参加黄金使用国集团。如 1892 年奥地利原则上采用金本位，1900 年予以明确使用。俄国 1897 年和 1899 年的法律也决定采用金本位。日本 1897 年采用金本位，印度 1899 年将金镑定为法币。1897—1907 年，墨西哥、阿根廷和其他产银的美洲各共和国也逐渐改为金本位制，最后只剩下少数几个国家包括中国作为银本位国家。^③ 美国从 19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将黄金大量吸收到通货中去。1900 年 3 月 14 日美国颁布一项条例，宣布黄金为唯一的本位货币。

1873 年之后作为本位货币的黄金主导世界，一直持续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所有欧洲大陆参战国立刻宣布停止黄金兑付。英国没有正式宣布停止兑付，但英国政府授权英格兰银行对私人兑换黄金设置障碍，英格兰银行发起反对“不爱国的黄金囤积行为”活动。美国 1917 年 4 月对德国宣战后，也没有立即停止黄金兑付。当年 9 月威尔逊总统签发公告，要求出口黄金必须得到国家财政部长的许可，实际上就是不批准。公告持续到 1919 年 6 月终止，美国才恢复了金本位。^④

一战前夕的长时期内，伦敦一直是欣欣向荣的世界金融中心，但战争改变了一切。英国不仅消耗了黄金储备，而且积累了对美国越来越多的债务，且对这些债务无力偿还，以英国为龙头的金融和货币秩序无法在战后的胜利中保存下来。面对黄金储备不足，为维系英镑的地位和信用，1922 年的意大利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提出将英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再兑换黄金。随着美国对金本位的坚持，1925 年 5 月 14 日英国恢复金块本位，1924—1928 年大约 20 个国家陆续恢复了金本位。1929—1933 年的大危机使得各国再次放弃金本位货币制度。1931 年 9 月英国不得不再次放弃金本位，此后 25 个国家仿效，1933 年 4 月美国宣布放弃金本位。^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的 1944 年 7 月 31 日，44 个国家的 730 名代表（中国代表团 33 人，仅次于美国）聚集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经过三周的紧张谈判，各方达成协议，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以及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即“布雷顿货币体系”。^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由于美元的泛滥和贬值，国际社会纷纷将美元兑换为黄金。到 1971 年美国黄金储备从 1948 年的 21682 吨下降到 8000 多吨，为阻止黄金储备下降，1971 年 8 月 15 日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黄金与美元不再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此崩溃。从此，黄金退出了国际货币历史的舞台。

①[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8 页。

②[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8 页。

③[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462 页。

④[美] 乔治·塞尔金：《美国金本位兴衰史（下）》，胡修修译，《金融市场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⑤[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26 页。

⑥[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VI，12 页。

二、英镑替代黄金成为国际支付手段的机制

（一）金本位货币制度支持了英镑国际化

英国 1821 年正式履行金本位后，是此后唯一坚持不变的国家。这意味着任何持有英镑（英镑汇票）的机构、个人随时能够兑换黄金而没有障碍和限制。这就树立了英镑的国际信用和地位，英镑因此可以进行国际支付。1844 年《银行特许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英镑）发行权，要求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其资本金。^① 法律严格限制纸币的发行，联合王国的纸币大体 4000 万镑，而黄金铸币达到 4600 万镑。12 年之后，纸币流通额有所下降，而黄金则增加了 50% 以上。到 1887 年纸币数量增加很小，大体在 200 万 ~ 300 万以上。此时的黄金超过了 1 亿镑，是纸币的 2 ~ 3 倍。^② 虽然如此，在支付中却多以纸币支付，甚至以存款支票和汇票（具有立票人担保、承兑人和 20 笔背书的可靠商业票据）作为支付的第一手段。铸币交付在各商业银行中的比例多为 1% 不到，曼彻斯特约 6%。^③ 黄金数量超越纸币面额，确保了支付的国际国内信用。英镑与黄金的兑换比率从 1816 年直到 1914 年差不多 100 年中，没有发生改变，这是最大的信用。

英国实行金本位的时候，有很多国家实行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但由于银币的含量调整，出现低含量银币驱逐高含量银币的现象，不利于开展国际贸易支付结算。故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贸易大国逐渐采取金本位，世界各国纷纷改制。英国凭借金本位和率先工业化以及强大的贸易、保险、金融体系竞争力，世界工厂地位和殖民体系，将纸币英镑在遍及五大洲的 37 个国家流通和使用，支付结算则用英镑为面值的汇票，其他国家也使用英镑汇票进行支付结算。英格兰银行则通过票据贴现进行国际汇兑，通过利率调节资金跨境流动，确保金本位的稳定和信用。其时国际金本位制实际成为黄金—英镑本位制，英镑替代了黄金。事实上，由于纸币和汇票的便利以及黄金的自由兑换，英镑比黄金更受欢迎。

（二）海上霸权和工业革命是英镑国际化的坚强后盾

海洋霸权为英镑国际化奠定了贸易基础。1651 年英国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条例规定所有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商品，必须由英国或产品生产地（制造地）的船只进行运输。从此以后，英国在多次战争后获得胜利，到 18 世纪初逐渐成为海上强国、大洋霸主，开始组织大规模贸易。^④ 大洋霸主和工业革命的便宜产品使得英国贸易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为英镑流通、计价和结算带来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工业革命为英镑国际化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贸易产品。英国是最早实行工业革命的国家，1760—1840 年就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当时工业和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也是提供贸易品最多的国家。与当时的竞争对手西班牙、法国等比较，作为工业生产发展代表的产品煤炭和生铁在英国的年均产量及人均产量远远领先（见表 1）。1850 年英国造船业和铁路规模均居世界首位，工业产值占世界总量的 39%，其中煤炭占世界总量的 2/3，棉织品、金属制品、铁等占世界 50%。1860 年英国工业产值占世

①格物资本：《英国货币史：纸币的诞生和大统一》，百度，2019 年 6 月 1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956363486192641&wfr=spider&for=pc>。

②[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457 页。

③[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458 ~ 459 页。

④[英] 詹姆斯·菲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年，第 156 ~ 161 页。

界总量的 40% ~ 50%，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1850—1870 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 3.12%，即使是 1870 年，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也占 1/3，优势无敌。^① 这些使得英国的金本位和英镑的国际化具有坚强的物质基础。

（三）英国贸易的发展和强大有力支持了英镑的流通及使用

1846 年 5 月，英国废除 1815—1846 年间实施的限制低价进口谷物的《谷物法》，开启了自由贸易时代。早期的国际金融离不开贸易的发展，主要是支持贸易支付结算。而且英国是 19 世纪最强大的国际贸易国家。1848—1870 年，英国将分散的世界通过贸易连接起来，成为世界工厂。期间输往土耳其和中东的出口额从 350 万英镑增加到 1600 万英镑，输往亚洲的从 700 万英镑增加到 4100 万英镑（1875 年），输往中美和南美的从 600 万英镑增加到 2500 万英镑（1872 年），输往印度的从 500 万英镑增加到 2400 万英镑（1875 年），输往澳大利亚的从 150 万英镑增加到 2000 万英镑（1875 年）。35 年间，世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与遥远和落后地区的贸易额增加了 6 倍，连接世界的网络明显加强。^② 就海上贸易来说，英国在 1870—1910 年商船中的蒸汽船远远领先其他国家，显示了英国的海上运输和贸易控制实力。1850 年英国贸易份额占世界 35%，1860 年达到 40%。即使到 1913 年，世界制成品的 60% 依然来自欧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而法国和德国也借助伦敦进行贸易支付结算，这是因为伦敦城的金融体系有世界范围的联系，英镑起着共同的贸易作用。^③

在商船吨位、进出口规模上英国也远远超过西班牙、法国等国家。1850—1880 年英国船舶吨位增加了 15 倍，而世界其他国家只增加了 4.5 倍。英国船舶吨位占世界比重从 1850 年的 25% 上升到 1870

表 1 1864—1866 年英国、法国、西班牙煤炭、生铁比较

单位：万吨，公斤

	煤炭年均产量	生铁年均产量	煤炭人均产量	生铁人均产量
英国	8132	382.7	3437	163
法国	830.4	89.8	216	23
西班牙	41.4	8.6	26	5.5

资料来源：[苏联]伊·莫·马依斯基，《西班牙史纲 1808—1917 年上册》，北京编译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 年，第 418 ~ 420 页。

表 2 1870—1910 年主要航运注册商船吨位

单位：千吨

	1870		1910
英国	木帆船	4578	1113
	蒸汽船	1113	10143
法国	木帆船	921	638
	蒸汽船	151	846
德国	木帆船	872	507
	蒸汽船	67	2383
美国	木帆船	2363	1655
	蒸汽船	1075	4900

资料来源：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1 页。

表 3 1860—1870 年英国、法国、西班牙贸易、商船比较

	英国	法国	西班牙
法郎/人	401	111	41
出口（亿法郎）	41.5	22.77	2.75
进口（亿法郎）	52.5	18.97	3.71
商船（万吨）	540	100	40

资料来源：[苏联]伊·莫·马依斯基，《西班牙史纲 1808—1917 年》，北京编译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 年，418 ~ 420 页。

注：人均法郎为 1860 年人均贸易额；进出口数为 1860 年数；商船吨位为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数。

①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5 页。
②[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58 页。
③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17 ~ 118 页。

年的 33%、1880 年的 50%。^① 1860 年英国进出口额远远超过西班牙和法国。

（四）海外投资和债权扩大了英镑国际地位及使用范围

金本位下，英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为防止黄金过度流入乃至英镑流动性不足，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英国一直保持对外资本输出与投资。1825—1914 年英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见表 4），推动了英镑的输出和国际流通，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伦敦的金融市场就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投资英国国债或发行以英镑计价的债券日益活跃，英镑随之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重要交易手段。英国国债是当时世界上信用度最高的国债，其利率在世界范围内起着基准利率的作用。^② 1904—1905 年，日本在伦敦市场发行以英镑计价的国债 6.86 亿日元，占日俄战争支出 17.2 亿日元的 40%（是 1903 年日本税收收入的 11.7 倍，1903 年日本存款余额 7.6 亿日元），支持了日俄战争的军费支出。^③

（五）英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支持了英镑成为世界货币

1800—1870 年，伦敦按黄金计价的白银价格一直固定在 5 先令一盎司，几乎没有波动。^④ 1841 年英格兰、威尔士已经有私人银行 252 家和营业以英格兰为限的股份制银行 120 家左右，他们大多发展有分支机构，发行自己的货币。伦敦 1850 年之前就有几家美英商业银号，开往美国的货运商常常在这里开立美国商家的支票来付款，一些汇兑商和外国票据承兑商在伦敦兴起，此后 20 年国外票号、汇兑商、银行不断到伦敦设立机构，开立往来账户。1873—1886 年英国没有卷入任何战争，也使得伦敦的金融中心得到巩固。苏格兰银行在 1858 年的总分支机构和整个英格兰的银行机构不相上下，而且 18 世纪以来就建立了清算制度，起初是为纸币清算，比伦敦清算所历史更悠久，该行一直和伦敦有往来，19 世纪初就每 10 天在英格兰银行将其汇票差额清算一次。到 1873 年该行承兑全世界都需要的伦敦票据，并帮助殖民地银行汇款。其时的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所有票据若不在伦敦兑付等于不能进行买卖。^⑤

18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银行业迅速发展，伦敦的证券市场、国债市场和黄金交易市场也日趋成熟。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不仅美国从资金便宜的伦敦借款，荷兰等其他国家也在伦敦借款。而且美国大量的各种证券（包括各州公债和银行券）也在欧洲（伦敦）出售，以获得黄金。英格兰银行的一些主要行号就凭这些证券按预期可出售的数量放给信用贷款。伦敦的三威银行（威金、威尔德、威尔逊）也是经营对美贸易的商业银行。为恢复英美之间的贸易，1838 年英格兰银行装运 100 万镑的金

表 4 1825—1914 年英法德荷美五国对外投资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英国	法国	德国	荷兰	美国
1825	55.6	11.1		33.3	
1840	58.3	25		16.7	
1855	63.9	27.8		8.3	
1870	62	31.6		6.3	
1885	55.7	23.6	13.6	7.1	
1900	51.1	21.9	20.3	4.6	2.1
1914	44	19.9	12.8	2.6	7.8

资料来源：《英镑的国际化》，百科知识，2021 年 7 月 23 日。

①[德] 贡德·弗兰克：《19 世纪大转型》，吴延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 30 页。
②格物资本：《英国货币史：大英帝国下英镑霸权形成记》，2019 年 6 月 8 日，<https://zhuanlan.zhihu.com/p/69230980>。
③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④[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463 页。
⑤[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467～469 页。

条到美国帮助已经停止支付的银行。英格兰银行向巴黎开出票据也是日常贸易业务。^①

19 世纪中叶后，英国海外银行业稳步扩张，伦敦的金融影响力扩展到全球，英镑也随之被更多的国家接受和使用，更多的银行机构（包括各国央行机构）也愿意储备英镑纸币。^② 1899 年英镑储备占官方外汇储备的 42.6%；到 20 世纪初，90% 的国际贸易计价、结算都使用英镑。一战之前，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 64% 存放在伦敦，而巴黎和柏林分别约有 15% 的资产。20 世纪 20 年代，英镑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占 80%，1938 年依然达到 70%。^③ 即使到 1947 年，国际官方外汇储备中英镑结存也达到 121 亿美元，占 88%，美元只占 12%。^④

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还体现为是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印度、菲律宾、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荷兰和拉丁美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英属国家的储备都选择英国国债或者在伦敦储蓄银行存款。如果希望将债务或存款兑换黄金，央行或政府可以到英格兰银行兑换。即使在 1931 年英国宣布放弃金块本位之前，英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⑤

票据和汇票业务也是支持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工具。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英国先后出台了《票据付款法》《期票法》《汇票法》，19 世纪来自国外的进出口商在英国金融市场信用不足，伦敦商人银行通过汇票承兑，弥补那些进出口商信用，极大地促进了英镑汇票的发展，英镑成为当时唯一的国际货币。^⑥

（六）英国的海外战争和殖民地拓展了英镑的流通和使用地域

英国在 19 世纪进行了 50 场殖民战争，先是征服了印度，1837 年之后，在亚洲和非洲进行了 72 场军事行动。在 1839 年、1856 年至 1859 年的中国，1856 年的波斯，1867 年的埃塞俄比亚、新加坡，英国都进行了武装干涉。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英国这种武装干涉更加频繁（19 世纪的后 25 年频繁干涉，规模也更加庞大）。^⑦ 到 1876 年，英国占领的殖民地面积达到 2250 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全部殖民地面积 4000 万平方公里的 56.25%，1914 年扩大到 3350 万平方公里，是其本土面积的 110 倍，占全部殖民地 6500 万平方公里的 51.54%。而美国、日本在 21 世纪初的殖民地只有 30 万平方公里。^⑧ 1877 年，英国在全球殖民地人口达到 20350 万人，1900 年达 35250 万人，1913 年相当于英国本土人口的 9 倍。1850—1899 年英国贸易额从 1.74 亿英镑增加为 7.49 亿英镑，增长了 3.3 倍。经济史学家将 1818—1914 年称为“英国霸权”时代。

英国如此广大的殖民地、自治领，都使用英镑，不需要黄金，以致英国商人认为英镑与黄金是否挂钩，对英镑并不重要。即使在放弃金本位的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也通过组建英镑区避免了英镑与黄金挂钩的汇兑危机。凭借国家实力和工业品竞争力，英镑成为国际计价、结算、支付和储藏货币，履行着国际货币的职能。

①[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695～698 页。

②格物资本：《英国货币史：大英帝国下英镑霸权形成记》，2019 年 6 月 8 日，<https://zhuanlan.zhihu.com/p/69230980>。

③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④[美] 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陈尚霖、雷达译，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69 页。

⑤[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279 页。

⑥佚名：《承兑汇票让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让英镑成为当时唯一的国际货币》，搜狐网，2019 年 4 月 23 日，https://www.sohu.com/a/309838083_434290。

⑦[德] 贡德·弗兰克：《19 世纪大转型》，吴延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 30～36 页。

⑧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7 页。

三、美元（取代英镑）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机制

（一）英镑地位下降

1. 英国霸权在 1873—1913 年经历了衰落

1873—1896 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使得英国经济实力下降，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开始崛起。1880 年英国煤产量高于德国、美国之和，但 1900 年后英国在整个工业世界和商业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英国钢产量很快落后于美国，1900 年只有美国的 1/4；生铁产量 1890 年被美国超过，1913 年只有美国的 1/3；煤炭产量 1913 年只有美国的 50% 多。美国的崛起，对英国霸权形成了挑战。1850—1870 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 3.12%，1870—1913 年只有 2.1%。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 1870 年占 1/3，1900 年为 1/5，1913 年下降为 1/7。^① 随着工业生产的下降，英国对外贸易在世界中的比重也下降，从 1880 年的 25% 下降到 1913 年的 1/6。英国的衰退也在于其固守传统工业结构，20 世纪初虽然扶持了汽车、电力、人造丝等，但部门规模小，旧的组织模式没有改变，垄断程度比较低，^② 没有发展起来。

英国的衰落，不仅表现为被美国超越，同时它也被德国超越了。20 世纪初，德国也超越了英国。1870—1914 年德国工业增长 4.7 倍，煤炭产量从 3400 万吨增长到 1913 年的 2.77 亿吨。德国钢产量因新技术发展，从 1870 年的 17 万吨增加到 1913 年的 1832 万吨，超过了英国、法国总和；生铁产量从 139 万吨增加到 1931 万吨。此时，德国的化学工业和电器工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③ 英国的衰落还体现在非英镑货币作为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外汇资产占比提高。1899 年英镑占政府和私人机构外汇资产的比重为 30.03%，1913 年下降到 27.20%，法郎和马克占比从 12.75% 提高到 25.39%。^④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英镑地位发生动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军费开支猛烈增加，各国纷纷停止了金币铸造及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也禁止黄金输出和输入，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金本位制赖以存在的基础。^⑤ 英国政府下令要求英格兰银行中断纸币和黄金的自由兑换。同年 8 月，英国财政部印刷发行了 10 先令和 1 英镑票据（目的为筹集战争资金），当作纸币在市场上流通。^⑥ 政府还授权英格兰银行发行流通券，发行超过法定黄金限额的纸币，并直接购买国债，导致英镑 1914 年 9 月开始贬值，从 1 英镑兑换 4.9 美元贬值到 1915 年 9 月的 4.54 美元，迫使贸易商以美元标价和支付结算，并将存放在伦敦的黄金转移到纽约。英国、法国在美国发行的债券也改英镑为美元计价。1916 年 1 月，在美国支持下，英镑与美元挂钩，此后英镑稳定到 1919 年 2 月的 1 英镑兑换 4.76 美元，但美国撤销支持后的 1 年内，英镑迅速贬值到兑换 3.38 美元。^⑦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英镑地位的衰落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长期国际收支赤字，而且无法得到纠正，^⑧ 就其国内来说，经济困难重重。

①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5 页。

②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6 页。

③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8 页。

④[美] 巴里·艾肯格林：《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第二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⑤佚名：《英镑作为世界结算货币逐渐被美元所取代》，新浪财经，2009 年 4 月 5 日。

⑥格物资本：《英国货币史：纸币的诞生和大统一》，网易网站，2019 年 6 月 1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EGGA-JSMS0541634Z.html>。

⑦邵宇、陈达飞：《英镑的没落：一战中的“货币战”》，新浪财经，2022 年 4 月 22 日。

⑧[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139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费开支 250 亿英镑，国债从 1939 年的 72 亿英镑增加到 1945 年的 214 亿英镑，仅仅欠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务就达到 90 亿美元，几乎和德国战争赔款一样多。^① 出口从 1938 年的 4.71 亿英镑下降到 1944 年的 2.66 亿英镑，战时国际收支累计逆差 40 多亿英镑，英国甚至变成了自己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债务国。虽然实力下降，但英镑区贸易依然占据世界贸易的 40%，英国希望保持英镑区，并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新国际货币体系。1941 年 9 月英国财政部顾问、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即“凯恩斯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中央银行这样的战后国际货币机构。^② 美国坚决不同意英镑区存在方案，要求英镑与美元自由兑换。

1945 年 8 月美国宣布停止“租借法”后，英国购买美国商品必须支付现款，带来国际收支严重逆差，不得不求助于美国。1945 年 12 月，两国签署《英美财政协定》，英国获得 37.5 亿美元贷款，条件是英镑自由兑换美元，降低英国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50 年内还清借款本金和利息，英国接受了该条款。英国政府以为 5 年内可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但美国 1946 年取消物价管制，英国购买的美国商品价格猛涨，贷款的实际价值降低了 28%，贷款一年就花完了，1947 年英国爆发财政危机，不得不再次乞求美国援助度过国际收支危机。1947 年 7 月 15 日，英属殖民地放开货币兑换后，殖民地国家居民纷纷将英镑兑换为美元，用以购买美国商品。抛弃英镑之后，印度等国家纷纷独立，^③ 美元在英镑区的地位提高，逐渐取代英镑。尤其是二战后，在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击下，殖民体系日趋瓦解，殖民地国家独立，英国的影响力逐渐削弱，美国的渗透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④

通过马歇尔计划，1948—1950 年英国获得了 23.51 亿美元的物资和 3.37 亿美元的贷款，恢复了经济，改善了贸易逆差，但依然困难。为制止黄金外流，1949 年 9 月英镑宣布贬值 30.5%，从 1 英镑兑换 4.03 美元贬值为 2.8 美元。

4. 忽视金本位价值导致英镑兑换美元出现大幅度波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913 年，美国黄金储备就达到 12.9 亿美元，战后的 1923 年达到 45 亿美元。^⑤ 英国黄金储备 1913 年只有 1.65 亿美元，即使 1921 年也只有 6 亿美元，^⑥ 与美国差异巨大。一战前 1 英镑可兑换 4.86 美元，^⑦ 英国的失业率不超过 3%，到 1920 年，战争使英国债务沉重，而债主是美国，借债合同的利息是战前利息的 3 倍，英国开支的 1/3 是偿还美国债务。1920 年末，1 英镑兑换美元为 3.4 美元，1923 年春天恢复到 4.7 美元，下半年再次跌倒 4.3 美元以下。^⑧

表 5 1913—1938 年主要国家黄金储备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13	1917	1933	1938
美国	12.9 (26.5%)	26.58 (39%)	40.12 (33%)	145.12 (56.8%)
英国	1.65	5.21	9.28	26.9
德国	2.79	5.39	0.92	0.29
日本	0.65	2.25	2.12	1.64
合计	48.59	68.16	120.05	255.22

资料来源：《英镑的国际化》，百科知识，2021 年 7 月 23 日。

①[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277 页。
②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世界历史》，2009 年第 6 期。
③佚名：《美元是怎样压倒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网易网站，2019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ENP7PJ3F05360MVZ.html>。
④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当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7~38 页。
⑤宋鸿兵：《货币战争（第四卷）》，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11 年，第 7 页。
⑥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18 页。
⑦[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73 页。
⑧[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32 页。

1925 年，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国际要求，英国试图恢复金本位，但由于黄金不足，英国提出了金块本位制度，即有限兑换黄金，最低兑换额度为 1700 英镑。倡导其他国家将英镑作为外汇储备，在美国贷款支持下，英国勉强维系了金块本位制。1929—1931 年大危机，英国贸易收入减少，投资难以收回，国际收支恶化，加剧了其他国家对英镑的不信任。1931 年德国、奥地利发生银行挤兑，境外英镑持有者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1931 年 9 月 16 日英国因弗戈登的一群水手发动暴动（因为被削减 25% 的工资），引发了对英镑的挤兑。9 月 21 日英国财政大臣宣布脱离金本位，几天之内英镑贬值 25%，低点曾下降到 1 英镑兑换 3.75 美元，以后回升到 3.9 美元。1931 年 12 月英镑汇率曾经跌落到 3.25 美元，全月平均 3.47 美元。^① 1932 年 3 月英镑汇率从低点 3.5 美元上升到 3.8 美元。^② 英国被迫宣布脱离金本位后，脱离金本位的国家有 25 个，其中大部分是大英帝国的国家。^③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英国实业家们普遍反对将英镑与黄金挂钩的做法，认为英镑与黄金挂钩导致 1925—1931 年英国经济出现困境。由于 1929 年以来的贸易大萧条，英国实业家的绝大部分出口都是流向使用英镑的英国自治领，因此，他们对英镑的汇率波动不关注，对汇率问题缺乏兴趣，认为如果英镑价格相对其他货币发生了变动，那肯定是其他货币价格发生了变动，而不是英镑。^④

（二）美元地位提高

1. 美元坚持与黄金挂钩，不断提高黄金价格和黄金储备

货币是一种信用。历史上，美元与黄金的汇兑从 19 世纪以来一直保持在 20.67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金，1900 年 3 月 14 日美国颁布一项条例，宣布黄金为唯一的本位货币。^⑤ 1913 年颁布《联邦储备法》，成立美联储。1934 年 1 月 31 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据《黄金储备法案》授予的权力，将美元兑换黄金的价格固定在 35 美元，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 1971 年。^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 6 月美国就解除了禁止黄金出口的禁令，恢复金币本位制。^⑦ 1920 年美国黄金储备达到 3679.29 吨，当时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一半是英镑。^⑧ 1922 年的意大利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则明确：以可与黄金兑换的英镑、美元同黄金一起构成各国的国际储备货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金汇兑本位制，从此开启了英镑和美元共同成为世界货币的时代。^⑨

不仅如此，美国利用 1929—1933 年大危机提高黄金价格而储备黄金。1932 年 8 月 16 日罗斯福告诉时任财政部长摩根索，愿意以高于市场价格买进黄金，以抬高市场商品价格；9 月 8 日罗斯福将其国内黄金价格从 20.67 美元一盎司提高到 29.82 美元，这一措施导致英镑兑换美元达到 1:5（同年 4 月为 1:3.75），美国股票价格随着美元贬值而上涨。罗斯福提出，美国必须把对黄金价格的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从 1932 年 10 月 25 日开始，摩根索与罗斯福一起推动金价逐日提高，直到 1934

①[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185 页。

②[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206～207 页。

③[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185 页。

④[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32 页。

⑤[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7 页。

⑥[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28 页。

⑦佚名：《经济史反思：上世纪后半叶，金本位制的各种类型及其衰落原因》，2022 年 6 月 8 日，https://www.sohu.com/a/555256654_120934664。

⑧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⑨李文增：《作为最强世界货币的英镑向美元移位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参考网，2021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fx361.com/page/2021/0427/8236176.shtml>。

年 1 月 15 日，价格确定为 35 美元一盎司黄金。^①

1935 年美英法签署三国货币协定，带来物价、工资和产量上涨信号，引起了黄金抛售潮。欧洲投资者们纷纷出售黄金，到美国购买证券。工业股票指数从 1936 年 6 月的 121 上涨到 9 月的 130，1937 年 2 月达到 152，黄金持续流向美国。1934 年 1 月美国黄金储备估价为 68 亿美元，1936 年 10 月突破 110 亿美元，1936 年 12 月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实行封存黄金的计划，以阻止黄金进一步流入。^② 即使如此，美国黄金储备 1937 年依然增加到 127.9 亿美元，1949 年提高到 245.6 亿美元，占全球黄金比重从 50.5% 提高到 74.3%。^③

2. 美国经济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支持了美元霸权地位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国推动，使得英国走向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1860—1914 年则可以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美国、德国推动，这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扩散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860 年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四位，1890 年美国工业生产比 1860 年增长了 6 倍，这一年工业产值达到了 94.98 亿美元，而同年英国工业产值为 42.63 亿美元，德国为 33.57 亿美元，法国为 29 亿美元。1894 年美国工业跃居世界第一，^④ 当年美国工业生产量等于欧洲各国总量的一半，1913 年美国工业产品占世界 1/3 以上，比英法德日总和还多，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且把英法德日远远抛在了后面。^⑤ 1870—1913 年美国工业增长了 8.1 倍，而英国只有 1.3 倍。1914 年美国工业产值 240 亿美元，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1/3。1860 年美国生铁产量只有 64 万吨，1915 年达到 3300 万吨；钢产量因为技术革新，从 1.2 万吨增加到 3200 万吨；石油开采从 50 万桶增加到 20960 万桶。1895 年美国汽车产业起步，1914 年汽车产量达到 56 万辆。^⑥

就经济来说，1870 年美国就与英国不相上下了，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经济规模已经是英国的 2 倍。^⑦ 到一战的 1914 年，美国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越英国，达到 370 亿美元，而英国只有 110 亿美元。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强大，为美元获取国际地位奠定了国际竞争力基础。二战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工业生产增长 4.0%，60 年代增长 5.0%，增长速度比受到战争破坏的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低，但比英国高，也明显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1945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3552 亿美元，1953 年为 4128 亿美元，1960 年为 5037 亿美元，60 年代被称为繁荣的 10 年。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种状况到今天依然如此。

3. 强大的国际贸易，支持了美元地位的提高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新机器、新发明的机械用品出口已经影响英国工业变革趋势，有时候影响是显著的。80 年代美国出口相对停滞，大体规模为每年 2800 万英镑（英国当时仅仅是棉纺织品的出口就是美国的 2 倍）。但 1899 年美国出口是 1891—1895 年平均出口的 2 倍，达到 7100 万英镑；1900 年为 9000 万英镑。1897—1898 年美国这种异常的迅速发展在英国议论纷纷，但也没有得到英国的特别在意。^⑧ 美国制成品占全部出口商品比重从 1890 年的 4% 提高到 1913 年的 11%，1929 年达到 18%。

①[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265～269 页。

②[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315 页。

③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0 页。

④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783 页。

⑤余志森主编：《美国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5～27 页。

⑥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7 页。

⑦[美]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 269 页。

⑧[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49 页。

美国制造品生产占全球比重从 1870 年的 23% 上升到 1913 年的 36%，1926—1929 年达到 42%。^①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 81% 是美国生产的，收音机已经普及，美国资本输出从 1919 年的 70 亿美元增加到 1929 年的 172 亿美元。美国商品输出从 1919 年的 39.71 亿美元增加到 1929 年的 51.57 亿美元，纽约开始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②

20 世纪 30—40 年代，美国拥有大量贸易顺差，而英国是逆差，其他货币则面临贬值的压力。^③ 二战后初期，美国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1/3，而战前的 1937 年只有 14.2%。1946—1950 年美国平均年出口 118.29 亿美元，进口 66.59 亿美元，顺差 51.7 亿美元，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元荒。^④ 1970 年美国出口 432.24 亿美元，进口 399.516 亿美元，顺差 32.7 亿美元多。1970 年美国出口占世界 15.5%，1971 年其第一次出现外贸逆差。直到 21 世纪最初的 10 年，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目前依然是进口第一大国。

（三）历史的机遇和主动作为，成就了美元崛起

1. 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元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1914 年 7 月 28 日一战爆发，8 月 4 日美国发表《中立宣言》。1917 年 4 月 6 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战争损失较少。战争期间，交战各国依靠美国供应武器、装备、粮食和商品，加速了美国商品和资本输出。这使得美国出口快速发展，从 1939 年的 30 亿美元猛增到 1943 年的 130 亿美元，而进口基本没有变化。1941 年 3 月到 1945 年 12 月，美国对外输出商品和服务近 500 亿美元。战争期间，美国

表 6 一战后的世界经济变化

单位：万度，万辆，%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1913 年发电量	248	45	82	51
1939 年发电量	1613	242	220	614
1913 年汽车产量	48.6	3.4	4.5	1.6
1939 年汽车产量	357.7	50.4	22.9	33.8
1921—1929 年世界经济增长	4.3	1.7	9.4	7.1
1930—1937 年世界经济增长	0.67	2.7	3.9	0.7

资料来源：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68 ~ 170 页。

表 7 1870—1938 年六国制造业各占世界的百分比

单位：%

年份	1870 年	1913 年	1936—1938 年
美国	23.3	35.8	32.2
德国	13.2	15.7	10.7
英国	31.8	14.0	9.2
法国	10.3	6.4	4.5
俄国	3.7	5.5	18.5
意大利	2.4	2.7	2.7

资料来源：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王春法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 24 页。

表 8 1871—1959 年五国各自相对于英国的实际产出

单位：%

	1871—1875	1900—1904	1909—1913	1938	1959
英国	100	100	100	100	100
美国	84	116	126	129	181
加拿大	74	89	101	86	121
德国	61	68	73	82	96
法国			91	82	95
日本		11	12	24	26

资料来源：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王春法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 26 页。

①[美]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 291 ~ 292、339 页。

②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84 页。

③[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134 页。

④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当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0 ~ 31 页。

工业产值从 239 亿美元增加到 620 亿美元，资本输出从 20 亿美元增加到 70 亿美元，对外贸易从 23 亿美元增加到 62 亿美元。1944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比 1939 年增长 132%，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 40%，产值增长 118%。1948 年美国工业占全球 53.9%，超过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总和。^① 美国掌握了全球黄金储备的 40%，故美国试图夺取欧洲的领导权，称霸世界，提出了世界和平的 14 点建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 70% 的商船被击沉，消耗了 80 亿英镑的军费，从战前的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欠美国债务 40 亿美元。到 1919 年，法国欠美国债务 30 亿美元达 9 年，欧洲 17 个国家欠美国债务 30 亿美元。二战结束后的 1946 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负债达 460 亿美元。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恢复中，美国经济远好于交战双方国家的经济发展。

2. 主动作为，推动美元成为货币霸主

美元取代英镑是 20 世纪以来美国持续不懈的追求和行动。一是战争期间给交战双方提供美元贷款。美元地位的提高表现在，美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交战国家的主要债务货币，美元因此得到推广，尤其是英国使用美元贷款，间接承认和接受美元与英镑平起平坐。

二是战后援建和投资，推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919 年巴黎和会上，美国提出使用美元结算，未取得英国同意。1922 年会议同意，但世界依然主要使用英镑结算。于是，美国从债务入手，扩大美元在世界的流通和使用。战后，美国提出了道威斯计划，以美元贷款和投资支持德国重新建设，恢复经济，偿还其对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债务，然后由这三国再偿还美元债。1924 年到 1931 年通过道威斯计划，美国流入德国的资金达 60 亿美元，美国向德国贷款 22.5 亿美元，协约国还给美国 20 亿美元债务，美元从美国流向德国，到协约国，再到美国，形成了一个美元循环。^② 1924—1929 年美国对外贷款合计 64.29 亿美元，而英国只有 33.01 亿美元。^③ 就对外投资来说，美国以美元对外投资不断增长以扩大美元使用范围。美国的国外投资从 1913 年大约 20 亿美元增加到 1930 年的 45 亿美元。^④ 二战前美国对外投资只有英国的 50%，战后成为最大资本输出国，1943 年达到 142 亿美元，1948 年达到 294 亿美元。^⑤ 二战后，1946—1972 年美国先后向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 380 亿美元援助，其中向欧洲提供了 286 亿美元，占 74%。

三是推动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在 1934 年成立了美元集团，到 1939 年发展为“美元区”。“美元区”是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组织，没有法律的约束。在美元区内，所有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与美元保持固定比价，一般不实行外汇管制，贸易与非贸易的支付均以美元结算，各国外汇和黄金大都存放在美国。当时参加美元区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菲律宾、利比里亚和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1935 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提醒中国大使：中国元应以美元形式报价。这是罗斯福政府决心要阻止中国以及欧洲列强针对美元的货币持续贬值的策略。其时，中国货币与英镑挂钩，而英镑对美元贬值，中国拟放弃银本位，提议向美国出售白银储备。1936 年 5 月，中国银行家陈光甫出使美国，强烈要求美国财政部购买中国更多的白银，而美国财政部反复抱怨中国元紧跟英镑变动。陈光甫最后承诺终结以英镑报价的制度，与美元挂钩。^⑥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正式将货币与美元挂钩，被认为是维

①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28 页。

②佚名：《破局先识局，美元如何成为世界货币》，知乎网，2021 年 10 月 14 日，<https://zhuanlan.zhihu.com/p/421203297>。

③[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47 页。

④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18～119 页。

⑤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当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0 页。

⑥[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49 页。

持美国产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要素。^①

（四）摆脱黄金约束，美元逐渐走上全球货币经济发行的霸主地位

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火和保护（出口先进武器、训练现代化军队），条件是沙特所有的石油交易都要用美元结算。1974 年美国与沙特达成协议，将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唯一货币，并要求其购买美国国债，石油美元体系建立。^② 美元不仅没有被抛弃，而且得到了更广泛运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金融衍生品交易等，多以美元计价、报价，对美元的需求因此而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1995 年全球场外衍生品交易为 410 亿美元，2019 年达到 32740 亿美元，美元占场外利率交易比重从 27% 提高到 50%。交易所的日均美元利率和外汇交易额从 2020 年的 47800 亿美元增加到 2022 年 6 月的 73570 亿美元，一年半内增加了 54%。

1976 年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决定，即《牙买加协定》（1978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彻底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再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停止黄金兑换，很多国家开始由固定汇率制度走向浮动汇率制度。从此以后，美元扩张不仅没有带来美元危机，反而使得美元在世界的流通和使用规模越来越大。

随着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大宗商品交易的扩张和价格上涨，美元需求也逐步扩张，美元发行成为全球货币经济发行，美联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全球中央银行。尤其是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化解了金融危机，扩张了美元，也带来了 2010—2013 年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繁荣。2020 年新冠疫情蔓延，美国再次实行更大的量化宽松政策，2021 年国际贸易和投资再次繁荣，增长达到了 27%。当美联储资产缩表、提高利率，美元走强，则带来诸多国家汇率大幅度贬值、债务危机，美元的霸权地位更显突出。

四、国际支付手段替代机制的启示

（一）国际贸易需要一种可自由兑换货币或信用物

商品之间能够进行跨境贸易，国家之间能够进行经济往来，进行投资、金融交易、跨境支付结算，就在于存在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信用物。这种可自由兑换货币、信用物，一开始是黄金、白银等，最后统一为黄金。当某种纸币与黄金挂钩，承诺能够自由兑换为黄金，而且具有长期的行为信用，成为一种习惯和路径依赖，该种纸币就会替代黄金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因此而成为国际计价、支付、结算、储备、资产货币，并成为国际可自由兑换货币。

英镑、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为什么依然能够成为国际支付、储备和资产货币？有四个原因：一是路径依赖、行为习惯。持有的资产不能很快抛弃，乃至没有可选择的替代资产或者说货币替代的成本巨大。这也许是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所说的国际货币先行者优势。^③ 二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其贸易品、投资品成为国际信用物，国家经济是世界最强大的，产品是国际最先进的、最普

①[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 111 页。
②任泽平：《“嚣张的美元霸权”如何在全世界剪羊毛》，新浪财经，2021 年 2 月 7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991043439461405&wfr=spider&for=pc>。
③[美] 本杰明·J·科恩：《货币强权》，张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第 20 页。

遍的、不可或缺的，没有竞争者能够替代，必须以其货币购买。三是建立了全球从货物运输到保险、支付结算、融资、资产购买、财产安全等一系列运行机制、制度以及资金流动、支付结算的高效、快捷等便利。四是建立了货币霸权。这种货币霸权表现为能够长期承受贸易逆差，让他国获得本币顺差而在全球购买。体现为本币被用于全球贸易、投资、融资等经济活动，成为全球货币的经济发行，货币的国际地位不仅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得到加强。体现为本币的货币政策调整可以影响全球各类金融资产价格涨跌、金融利益分配和资金配置大调整，某种意义上成为全球中央银行而谋取巨大的国家利益，打击和遏制货币竞争对手的崛起。这种霸权正常情况下，没有罢免机制，只能等待时局变化。

（二）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货币必须可自由兑换

货币必须可自由兑换才能获得国际地位。金本位下，纸币必须可自由兑换黄金，只有充分满足兑换人的黄金需求，才能成为国际支付手段。一旦限制兑换，纸币的国际地位就会丧失。脱离金本位后的纸币，也必须提供自由兑换才能真正成为国际支付手段。这种可自由兑换表现为国内、国际可兑换：一是持有某国纸币及资产，可以在全球随时兑换为需要的商品、服务、资产或货币；二是可以随时在全球至少是某个区域进行贸易、投资、融资等经济、金融活动；三是资金在货币母国及全球能够自由进出，在货币母国享受国民待遇，可以进行自由兑换，兑换自己所需要的货物、资产等。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本币难以成为国际支付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资产货币。

需要建立货币自由兑换便利机制。与可兑换、自由兑换相关的是必须提供交易、兑换便利，即具有国际信誉、信用的支付、结算、兑换机制，既有黄金的，也有外汇的，同时需要交易场所。就今天这个时代来说，还需要有相互授信，能够在市场拆借、筹集到资金，从而进行各种金融产品的交易。这需要资本市场、资金市场的开放，允许对方国家的机构在本国境内开设外币和本币资金账户。自由兑换的便利，不仅包括贸易、投资、投融资、资本账户开放的便利，还要有交易、支付、投资的基础设施系统及其便利，这种便利能够超越现有的储备货币市场便利，至少与之比较，有足够的吸引力。

（三）国际支付手段的本质是信用和价值尺度

国际支付手段的本质是信用。纵观黄金本位货币发展史，黄金作为可自由兑换的本位货币真正流通的时间有限，往往是与黄金挂钩的纸币或纸币汇票在流通，但法律承诺纸币、汇票可以自由兑换为黄金。由此可见，纸币替代黄金履行货币的流通、计价、支付、结算、储藏、融资等功能，是以黄金信用为基础的替代，同时有法律保障、国家承诺，而且有保障承诺、兑现的实力和基础，乃至方法和政策。货币发展的历史，就是纸币替代贵金属的历史，是纸币借助黄金的权威信用而发挥计价、支付、结算、储藏、融资功能的历史。纸币借助于黄金的地位而成为世界货币或者储备货币，是一种习惯意识，而不是必然。这种习惯意识也依赖于信用习惯、信用共识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运行机制。因此，纸币跨境履行货币职能，关键在于信用和信用共识。

国际支付手段的基础信用形式是价值尺度。黄金信用的基础表现形式就是黄金被社会共识并接受为一般等价物，即一切商品定价的价格基准或价值尺度、计价标准，国家之间的纸币汇兑也是依据与黄金的定价标准而确定。因此，国际货币信用的基础表现为以本币标价的商品、服务价格基准保持不变和稳定。

国际支付手段信用的汇兑表现是汇率长期稳定。英镑、美元能够替代黄金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就是因为长期内保持与黄金汇兑比率不变。脱离金本位以后，英镑、美元依然保持基准、计价货币的信

用地位，在于英镑、美元保持汇率、价格稳定，逐渐成为全球货币，被用于经济发行和通货膨胀发行，其他国家与之竞争过程中，不具有替代其地位的竞争力。一旦有替代者出现，通货膨胀发行的全球货币、汇率大幅度贬值的货币，必然会被取代或抛弃。

（四）外汇管制和汇兑危机，源于货币可兑换性不足

实行金本位、金汇兑本位的纸币，可以成为国际计价货币、基准货币，用于跨境支付结算，履行货币基本职能。未实行金本位、金汇兑本位的纸币，则不能跨境履行支付职能，不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纸币的地位因此有了差异：可自由兑换与不可自由兑换，不仅是相对黄金可兑换与不可兑换，也是相对纸币之间的可兑换与不可兑换。

纯纸币时代，货币不可兑换。国家要获得储备货币，必须通过出口获得。如果储备货币不足，则必须实行外汇管制，不仅实行外汇数量限制，也采取行政管制。为保障贸易的正常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交易内容和账户性质不同，区分了经常项目（货物和服务贸易）与资本项目（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金融活动），也因此有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与不可兑换。原则上要求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实行管制。对于可兑换货币国家来说，不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管制）问题。可兑换与不可兑换的本质差异，就是货币的国际地位差异，也源于不可兑换货币的国际信用不足。

纸币与黄金挂钩制度下，纸币贬值，所有人不相信纸币而需要兑换黄金时，就会带来黄金挤兑，从而导致银行破产、倒闭，乃至出现汇率危机，金本位崩溃。战争期间禁止黄金流出和汇兑，必然导致黄金与纸币之间的汇兑危机，进而带来汇率危机；在纸币替代黄金后，汇兑危机就表现为非储备货币（不可自由兑换货币）与储备货币（可自由兑换货币）之间的汇兑危机、汇率危机、债务危机。原因在于本币与储备货币比较信用不足，本国没有能力获得足够的储备货币来平衡国际收支需求。如果本国能够具有平衡国际收支的能力，保持顺差，保障本币发行对物价影响的稳定，或者相对国际物价稳定，本币就具有国际信用，就不会发生汇兑危机（包括债务、支付、汇率危机）。但由于大部分非自由兑换货币（或非储备货币）国家金融发展历史短，治理经验不足，往往会反复发生因可自由兑换货币不足而导致的各种危机。

（五）国际货币替代的关键或前提在于货币是不可替代品、是信用物

英镑替代黄金成为国际支付结算手段，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海上霸权，使得英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贸易和产品制造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制造品和服务（航海、运输和金融业务）成为世界的需求乃至不可或缺，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黄金交易中心，英镑纸币成为全球信用货币，乃至以英镑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借用英镑债务。只有使用英镑才能够购买到当时全球先进的技术和产品、金融服务乃至军事设备和产品等。

美元替代英镑在于美国成为 20 世纪以来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实力远远超过英国。一方面在于美国制造遍布全球，美国创新实力远远超过了英国，美国产品成为全球最先进的需求产品；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资需求，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同时在科技、军事和金融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向全球提供他国短期无法生产的产品、设备和军用物资，同时从制度上建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纸币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国寻找到了一条保持美元主导地位的新路径，即以贸易逆差扩张美元，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以国债、股票和金融产品投资吸引资本回

流，实行国际收支自动平衡。当前的美国在芯片以及芯片零部件、软件、高端仪器设备等方面依然是最先进的，全球对之有很大依赖，必须使用美元才能进口。

未来无论是单一货币还是群体货币替代美元的主导地位乃至与美元竞争并行作为主要货币、储备货币，也必须在经济、科技、军事、金融实力上远远超过美国，在金融市场开放和便利、创新上超越美国，比美国更具有竞争力，做得更好，为世界提供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更具有实际利益、便利的货币体系和制度，尤其是向全球提供最先进技术和产品或者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技术、产品、服务，因此而需要该货币。

俄罗斯采取卢布结算令，并不是俄罗斯提供了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而是俄罗斯提供了短期内无法替代、不可或缺的天然气和石油产品，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信用物（不可或缺的需求品）。这一做法，虽然不能说成功，但打开了国际货币的新空间。但是否真的打开，需要观察和实践。

（六）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支付体系始终存在

一是金本位存在的同时，就有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如 1865 年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组成拉丁货币联盟，这些国家就是银本位。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金本位开始流行，美国到 1900 年才立法实行金本位，中国一直是银本位。

二是在放弃金本位的时间内，存在各种货币集团（区）。1931 年英国放弃金本位。1932 年英国就在渥太华和殖民地属国及重要贸易伙伴确定帝国特惠制，对英镑集团成员国的进口商品，相互降低税率或免税。^① 1933 年大英帝国属下的各国举行了正式会议，组成了英镑区；^② 1934 年 7 月鼓励英镑区各国向英国借款，以供增加外汇储备和扩大从英国进口，同时降低信贷利率，延长还款期限。^③ 1938 年英国出口货物的 62% 是卖给英联邦和英镑集团各国，1929 年只有 51%。1938 年英国在集团内部购买的货物占进口 55%，而 1929 年为 42%。1939 年英镑区采取严格的外汇管理办法，建立“美元共同储备”机构，以排斥和限制美元的使用，要求英国各自治领应以出售商品所得的黄金、美元或其他硬通货交给在英国控制下的英镑区中央储备机构，以相应的平价换取英镑。^④ 美国 1934 年放弃金本位后，组建了美元集团区。日本也组建了日元集团区，包括朝鲜和中国台湾、广东及满洲里地区。^⑤ 日元集团之间的贸易也引人注目，其出口由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24% 上升到 55%，进口从 20% 上升到 41%。^⑥

即使在目前，在美元体系之外，依然有英镑、欧元、日元等储备货币体系，一些国家建立有以本币为主导的跨境支付结算体系。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不可能只使用一种信用货币，单一货币的国际贸易无法满足全球贸易的流动性、地域性资金需求。多元体系的存在，是推进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

（七）国际货币地位替代时间漫长，但也存在突变机遇

英镑纸币替代黄金进行国际支付，对于英国来说，走过了较长时间。英国以黄金作为支付货币从

①宋鸿兵：《货币战争（第四卷）》，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11 年，第 39 页。

②[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256 页。

③[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289 页。

④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世界历史》，2009 年第 6 期。

⑤[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第 336 页。

⑥同⑤。

1717 年就开始了，到 1816 年立法实行金本位，乃至被世界仿效也是 1870 年以后的事情。美国经济 1870 年就和英国不相上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经济规模乃至贸易规模远远超过英国，甚至与纸币挂钩的黄金储备也远远超过英国，但美元作为国际计价、支付结算手段是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期间经过了 70 年。

改变纸币英镑的结算习惯和以英镑为主的金融资产结构，对于很多利益主体来说是一个痛苦和利益损失的过程，不会突然放弃，必然是逐渐变化的过程，辅助以突变因素，故时间较长。美国 and 英国使用英语，货币地位替代后的国际商务活动语言、文本不需要转换，如果更换一种语言进行国际商务活动，成本高昂，则更不受欢迎。^①

欧元自从诞生以来，就被认为是美元的竞争对手，但 20 多年的历程表明，欧元的地位远远不如美元，这种格局在可以预见的 10 年内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当今美元已经脱离了黄金约束，美元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和机构的主要外汇资产形式，以另一种货币资产替代美元资产，不仅需要超越美国的经济实力，还要有超越美元的信用和超越美元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信用，尤其是超越美元金融资产利益的收益率。这种替代和转换，没有特别重大事件（一方面需要美国有类似英国那样因战争等导致的地位衰落，另一方面需要有一个超越当下美国的重大力量崛起），没有巨大的资产利益是不会发生突变的。就目前的全球资产结构来说，短期内难以看到有新的货币资产崛起能替代美元金融资产。

美元替代英镑是以黄金为根本信用的时代，拥有更多的黄金储备就具备基本条件。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要实现货币替代，首先必须拥有大量美元，以支持本币汇率的稳定，然后再去替代美元，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时间进程可能更长。而且，非储备货币的竞争对手不仅是美元，还有欧元、日元、英镑以及非储备货币本身，故难度更大，时间更长。

当然，货币替代也是有规律的，就是货币的币值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真的被市场接受。美国从战后到 1971 年之前都是贸易顺差，但 1971 年出现了逆差。英国早期贸易也都是顺差，但 19 世纪都是逆差。储备货币制度下的长期贸易逆差，通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就可以解决。因为所有流出国门的纸币必然要回到国内才能生息，才能进行清算。美国通过国债和股市、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开放，迷惑世界投资者进行钱生钱的游戏，实行了国际收支的自动平衡。而美国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创新研发和吸引人才，推动创新发展，维持美元地位。

表 9 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2022 年 3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8 年	2016 年
美元	58.88	58.86	58.92	61.76	65.36
欧元	20.06	20.58	21.29	20.67	19.14
日元	5.36	5.52	6.03	5.19	3.95
英镑	4.97	4.80	4.73	4.43	4.35
人民币	2.88	2.8	2.29	1.89	1.08
加拿大元	2.46	2.38	2.08	1.84	1.94
澳元	1.93	1.84	1.83	1.63	1.69
瑞士法郎	0.23	0.18	0.17	0.14	0.16
其他货币	3.23	3.04	2.65	2.45	2.33
外汇储备	125501.2	129209.6	127016.2	114327.5	107206.5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一旦世界认识到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必然带来泡沫，泡沫将最终破灭，尤其是认识到纸币地位的平

①[美] 本杰明·J·科恩：《货币强权》，张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第 21 页。

等，认识到真实汇率是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实行主权货币支付结算，并建立起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市場制度，在某些突发事件和因素的作用下，所谓货币霸权也会轰然倒下。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2020 年新冠疫情危机以及 20 世纪两次石油危机冲击，都曾经对美国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和危机压力。如果主要经济体达成共识，限制、禁止美元使用、抵押、担保、计价、融资、储藏等，以贸易品、投资品为信用物，建立适用、满足本币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需求的支付结算体系，本币跨境支付结算就有了市场，就可以部分替代以美元计价支付融资结算的市场，因此而摆脱美元依赖的束缚和美元不足的困境。

事实上，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例 1999 年为 71%，2016 年下降到 65%，2022 年第一季度末下降到 58.8%，而其他货币的储备是持续增加的。这种变化，也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同时也表明各国意识到美元的风险。美国随意动用金融制裁也会激起众多国家建立摆脱美元的支付结算体系，在这些冲击和影响下，美国的地位和美元信用可能会逐渐衰退，一旦诸多国家开启主权货币结算，尤其是亚洲国家之间开启主权货币结算，美元地位的衰落只是时机问题。当然，彻底取代美元，必须在科技及其产品乃至军事实力上超越美国，才能为货币替代和竞争提供实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
2. [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2014 年。
3. [美] 乔治·塞尔金：《美国金本位兴衰史（下）》，胡修修译，《金融市场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4. [美]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
5. [英] 詹姆斯·菲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年。
6. [苏联] 伊·莫·马依斯基：《西班牙史纲 1808—1917 年（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 年。
7. 徐天新等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8.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 年。
9. [德] 贡德·弗兰克：《19 世纪大转型》，吴廷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
10. 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11. [美] 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陈尚霖、雷达译，商务印书馆，2021 年。
12. 邵宇、陈达飞：《英镑的没落：一战中的“货币战”》，新浪财经，2022 年 4 月 22 日。
13. 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世界历史》，2009 年 6 期。
14. 宋鸿兵：《货币战争（第四卷）》，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11 年。
15. [美]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 年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
16. 李文增：《作为最强世界货币的英镑向美元移位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参考网，2021 年 4 月 27 日。
17. 余志森主编：《美国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8. [美]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
19. [英] 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王春法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78 年。
20. 任泽平：《“嚣张的美元霸权”如何在全世界剪羊毛》，新浪财经，2021 年 2 月 7 日。
21. [美] 本杰明·J·科恩：《货币强权》，张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

责任编辑：谷 岳

世界经济复苏道路崎岖不平 下行压力持续存在

——2022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及 2023 年展望

李婧婧 郝悦 朱祎 王庭锡

摘要：2022 年，高通胀和高利率冲击全球经济活动，强紧缩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世界经济增速从 2021 年的 6.2% 回落至 3.4%。主要经济领域方面，需求不足导致全球货物贸易数量和金额齐跌，制造业、服务业快速收缩，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强烈。主要经济体方面，美国、欧元区经济颓势渐显，日本经济缓慢修复，新兴经济体增长分化。展望 2023 年，IMF 指出，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初步显现，全球通胀水平有望继续小幅回落，世界经济前景略有改善。虽然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出一定韧性，通胀预期有所下降，但距离央行目标水平尚有距离，未来仍需在抑制通胀与经济“软着陆”中艰难寻求平衡，金融环境依旧脆弱。叠加极端自然灾害、地缘局势动荡和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等负面因素，总体风险仍然趋于下行，预计 2023 年世界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至 2.9%，处于历史相对低位。

关键词：世界经济 高通胀 高利率 经济衰退

作者简介：李婧婧，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高级统计师；
郝悦，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统计师；
朱祎，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助理统计师；
王庭锡，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2 年，新冠疫情反复、乌克兰危机升级、供需失衡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在主要经济体央行连续大幅加息作用下，下半年全球通胀虽有所缓解但形势依然严峻，国际金融市场深度调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估计 2022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3.4%，较上年回落 2.8 个百分点。展望 2023 年，全球通胀水平有望继续回落，主要国家加息步伐预计放缓，疫情扰动对经济活动的干扰持续减弱，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较 2022 年 10 月 2.7% 的预测值有所上调。但通胀预期较各国央行目标水平尚有距离，紧货币周期仍未结束，叠加地缘冲突对经济活动的扰动，虽然经济复苏前景略有改善，但诸多风险因素和下行压力将持续存在，世界经济增速或进一步放缓至 2.9%，低于 3.8% 的历史平均水平（2000—2019 年）。

一、世界经济主要领域运行情况

（一）从需求端看，全球贸易活动持续放缓

2022 年，包括乌克兰危机升级、高通胀持续、高能源价格和货币环境快速收紧在内的多重冲击对全球经济造成压力，市场需求在上半年集中释放后趋于疲软，全球贸易动能持续减弱，贸易前景不容乐观。从贸易额看，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2 统计手册》数据，2022 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 13.8%，增速较上年回落 12.7 个百分点；从贸易量看，据 IMF 2023 年 1 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22 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长 5.4%，增速回落 5.0 个百分点。贸易活动后续乏力，动能不足。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数据，2022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月度环比增速在 5 月份达到 2.7% 的年内最高后波动下行，11 月份为 -2.5%，创 2020 年 4 月以来最大跌幅。货运需求持续回落，货运成本回落至新冠疫情前水平。在经历 2021 年全球货运市场的空前紧张之后，随着供应链好转和市场需求下降，2022 年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和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快速回落。其中，BDI 指数年内累计下跌 31.7%，年末较年内峰值（5 月 23 日）下跌 55.0%；SCFI 指数年内维持下跌趋势，累计下跌 78.3%。

（二）从供给端看，主要行业活动逐步萎缩

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高位回落。2022 年 2 月，制造业 PMI 升至 53.7% 的年内相对高位，此后逐步回落，9 月份降至 49.8%，为 2020 年 6 月以来首次跌至收缩区间，并在年末进一步降至 48.6%，再创新低。全球服务业 PMI 波动下行。受新冠疫情扰动，1—6 月，服务业 PMI 在 51% ~ 54% 的扩张区间波动，随着高通胀逐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蔓延，8 月份降至 49.3%，为 2020 年 6 月以来首次跌至收缩区间，年末为 48.1%。

（三）从金融市场看，国际金融市场深度调整

2022 年，在持续高通胀的影响下，全球货币政策快速收紧，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基准利率均升至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叠加地缘政治动荡和通胀回落缓慢等不利因素，市场避险情绪不断升温，国际金融市场深度调整。全球股市表现低迷。2022 年，明晟全球股票指数累计下跌 17.46%，其中 10 月 12 日达 677.82，为 2020 年 11 月以来最低。美国三大股指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年度跌幅，纳指全年累计下跌 33.10%，标普 500 指数下跌 19.44%，道指下跌 8.78%。欧洲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股市情绪相对乐观，英国富时 100 指数全年累计微涨 0.91%，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 12.35%，跌幅略小于 2018 年的 18.26%。新兴市场股市波动较大，明晟新兴市场股指全年累计下跌 17.95%，创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债市收益率进入高位。2022 年，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上涨 236 个基点，10 月 24 日达到 4.25%，创 2008 年 7 月以来最高；德国、英国、日本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累计上涨 277.0、278.6、36.5 个基点，均达到相对高位。美元指数冲高回落。2022 年前三季度，受加息预期不断升温以及市场对欧洲经济衰退预期增强影响，美元指数一路走高，四季度在疲软的经济数据和美联储加息放缓的市场预期打压下回落，全年累计上涨 7.84%，其中 9 月 27 日收盘价为 114.1596，创 2002 年 6 月以来最高，较年初累计上涨 18.6%。在强势美元的影响下，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欧元、日元汇率全年分别贬值 5.86% 和 12.22%，其中欧元汇率 9 月 27

日收于 0.9594，日元汇率 10 月 20 日收于 150.1350，分别创 2002 年 6 月和 1990 年 9 月以来最低收盘价；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比索全年累计贬值幅度超 40%，土耳其里拉贬值幅度超 25%，哥伦比亚比索、印度卢比等贬值幅度均超 10%，韩元、越南盾、菲律宾比索和土耳其里拉年内一度跌至金融危机以来新低。

（四）从商品市场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高回落

受新冠疫情持续、乌克兰危机升级、供应瓶颈及部分经济体实施出口限制措施等因素影响，2022 年上半年全球商品市场供给不畅，主要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下半年，随着乌克兰危机影响逐渐减弱，大宗商品供给有所改善，叠加全球流动性收紧、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市场需求回落，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调，但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 年国际能源价格指数为 152.6（2010 年 = 100），较上年上涨 60.0%，非能源价格指数为 123.6（2010 年 = 100），上涨 10.6%，均为 1960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其中，农产品上涨 13.3%，化肥上涨 62.6%，均为记录最高；金属和矿产下跌 1.2%，为记录次高。国际油价呈倒“V”走势。2022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较上年上涨 43.2%。年初，乌克兰危机迅速升温，市场普遍担忧俄罗斯原油在运输、结算等方面的风险，供给短缺预期升温，恐慌情绪大幅提振原油价格，3 月 9 日，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升至 128.27 美元/桶，创 2008 年以来新高。此后，随着地缘因素影响减弱，欧洲持续补充库存，市场供需失衡有所缓解，叠加全球流动性收紧抬高美元指数，油价承压回调。12 月份，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降至 79.68 美元/桶，为年内最低。

二、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情况

（一）美国经济显现颓势

2022 年，美国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劳动力供给持续紧张，美联储采取了激进加息政策，在此作用下，国内消费和企业投资逐步走弱，工业生产活动有所降温，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较上年大幅放缓，经济活动颓势显现。展望 2023 年，由于通胀水平仍处高位，加息周期尚未结束，紧缩政策仍将继续冲击经济，美联储将在抑通胀与防衰退中艰难寻求平衡，经济将继续下行，或陷入温和衰退。

1. GDP 增速回落。如表 1 所示，2022 年美国 GDP 增速为 2.1%，较上年大幅回落 3.8 个百分点，为 2016 年以来次低增速。分季度看，四个季度环比折年率增速分别为 -1.6%、-0.6%、3.2% 和 2.7%，上半年陷入“技术性衰退”；同比增速分别为 3.7%、1.8%、1.9%、0.9%，呈回落趋势。

私人消费和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项。2022 年，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增速较上年回落 5.5 个百分点至 2.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由上年的 5.54 个百分点回落至 1.86 个百分点；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上年的 1.55 个百分点回落至 0.71 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拖累 0.04 个百分点，私人存货变动贡献 0.74 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增速加快、进口增速放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由上年的 1.25 个百分点降至 0.40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0.80 个百分点，进口拖累经济增长 1.20 个百分点。

2. 工业生产活动降温。2022 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速为 3.8%，较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制造业生产增速为 3.1%，回落 2.7 个百分点；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9.6%，提升 2.2 个百分点，达到 2007 年以来最高水平。从月度数据看，由于市场需求走弱，工业生产和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速分别从 2 月份的

表 1 2020—2022 年美国 GDP 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单位：%

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GDP	-2.8	5.9	2.1	-1.6	-0.6	3.2	2.7
私人消费支出	-2.01	5.54	1.86	0.91	1.38	1.54	0.93
商品	1.07	2.72	-0.12	-0.02	-0.61	-0.08	-0.13
服务	-3.08	2.83	1.99	0.93	1.99	1.63	1.06
政府消费与投资	0.45	0.11	-0.10	-0.40	-0.29	0.65	0.64
私人投资	-0.95	1.55	0.71	0.98	-2.83	-1.80	0.66
净出口	-0.26	-1.25	-0.40	-3.13	1.16	2.86	0.46
出口	-1.54	0.64	0.80	-0.53	1.51	1.65	-0.19
商品	-0.76	0.52	0.49	-0.58	1.18	1.38	-0.62
服务	-0.78	0.12	0.31	0.06	0.33	0.26	0.43
进口	1.28	-1.89	-1.20	-2.60	-0.35	1.21	0.65
商品	0.67	-1.61	-0.86	-2.38	0.05	1.19	0.71
服务	0.61	-0.28	-0.35	-0.22	-0.41	0.02	-0.06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最高点 6.9% 和 7.3% 回落至年末的 1.0% 和 -0.7%；产能利用率于 4 月份达到最高点 80.2%，年末回落至 79.9%，为年内最低，且低于长期平均水平（1972—2022 年）1.7 个百分点。

3. 国内消费逐渐走弱。2022 年，美国零售总额为 8.12 万亿美元，增速为 9.1%，较上年回落 10.5 个百分点。从月度数据看，2 月份零售额同比增速为 17.6%，为年内最高，年末回落至 5.1%。

4. 对外贸易增速回落。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数据，2022 年，美国进出口总额为 69675.2 亿美元，增速为 16.9%，较上年回落 2.9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增长 17.7%，进口额增长 16.3%。全年贸易逆差 9480.6 亿美元，较上年扩大 12.2%。

5. 通胀压力高企。2022 年，美国消费价格上涨 8.0%，涨幅较上年扩大 3.3 个百分点，为 1981 年以来最高。其中，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上涨 6.2%，涨幅扩大 1.6 个百分点，为 1982 年以来最高。生产者价格上涨 9.5%，涨幅扩大 2.5 个百分点，为 2011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

6. 劳动力市场高度紧张。2022 年，美国全年平均失业率为 3.6%，较上年下降 1.8 个百分点，为 1969 年以来最低；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481.4 万人，为 1940 年有记录以来次高水平。

（二）欧元区经济温和放缓

2022 年，由于防疫政策全面开放和供应紧缺缓解，欧元区上半年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但在持续的能源危机、高通胀、需求疲弱、货币政策收紧等因素交织下，经济复苏逐渐走弱。展望 2023 年，在外部面临乌克兰危机持续、国际贸易活跃度减弱，内部面临高通胀、能源供应紧张、融资条件收紧、债务压力增大等多重风险下，经济复苏前景面临更大挑战。

1. GDP 增速放缓。2022 年，欧元区 GDP 增速为 3.5%，较上年回落 1.8 个百分点。得益于供应紧张的缓解和防疫限制政策的放开，上半年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下半年在能源危机、高通胀、需求疲弱等不利因素持续影响下，季度增速逐步放缓。GDP 环比增速分别为 0.6%、0.9%、0.4% 和 0.0%；同比增速为 5.5%、4.4%、2.4% 和 1.8%。

从主要成员国看，欧元区经济增长引擎德国增长 1.8%，较上年回落 0.8 个百分点。由于高通胀导致居民消费大幅下滑，叠加能源紧张、劳动力短缺问题持续，经济增速在欧元区成员国中处于较低水平。法国增长 2.6%，较上年回落 4.2 个百分点，主要受居民消费下降拖累，但经济整体延续了自 2021 年疫情管控放宽后的增长势头，保持平稳运行。意大利增长 3.7%，较上年回落 3.3 个百分点，公共投资拉动工业、建筑业增长。受旅游业恢复以及年末通胀回落提振，西班牙增长 5.5%，增速与上年持平。爱尔兰（12.0%）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速，为成员国中表现最好的国家；爱沙尼亚由上年 8.0% 回落至 -1.3%，为表现最差的国家。

2. 工业生产维持低速。2022 年，欧元区工业生产和制造业生产分别增长 0.9% 和 1.4%，增幅较上年回落 7.1 和 7.4 个百分点，维持低速增长。从月度数据看，各月基本保持在 -2.5% ~ 3.0% 的区间波动，其中 7 月份分别为 -2.5% 和 -2.7%，为 2020 年 10 月和 12 月以来最大降幅。

3. 消费市场表现低迷。2022 年，欧元区商品零售量增长 0.7%，较上年回落 4.3 个百分点，为 2012 年以来次低。其中，汽车燃料零售量增长 6.6%，为 2001 年以来次高，是主要拉动项；食品饮料烟草零售量下降 2.8%，为 1996 年有记录以来最低；非食品（不含燃料）零售量增长 2.4%，回落 5.4 个百分点，为 2018 年以来低位。

4. 进口额大幅增长，贸易逆差达历史最高。2022 年，欧元区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60704 亿欧元，较上年增长 27.5%，创 1999 年有记录以来最快增速。其中，货物出口额为 28778 亿欧元，增长 18.0%；因能源进口价格大幅上涨，货物进口额为 31925 亿欧元，大幅增长 37.5%，为 1999 年有记录以来最快增速；净出口额由上年的 1164 亿欧元降为 -3147 亿欧元，为有记录以来最大逆差。

5. 价格水平创历史新高。2022 年，欧元区消费价格上涨 8.4%，涨幅较上年扩大 5.8 个百分点，为 1997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乌克兰危机、极端天气推升能源价格涨至高位，并逐渐向其他领域蔓延，能源（37.0%）、食品烟酒（9.0%）、非能源工业产品（4.6%）、服务类产品（3.5%）涨幅均创记录新高。核心消费价格上涨 3.9%，涨幅扩大 2.4 个百分点，为记录最高。受能源价格高企影响，全年生产者价格上涨 34.4%，涨幅扩大 22.1 个百分点，为 1996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

6. 劳动力供给持续短缺。2022 年，欧元区平均失业率为 6.7%，较上年回落 1.0 个百分点，为有记录以来最低。全年平均失业人数为 1116.0 万人，较上年减少 145.0 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新低。

（三）日本经济缓慢修复

2022 年，日本消费需求保持增长，就业形势逐渐改善，但受日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影响，物价保持上涨趋势，货物贸易持续逆差，工业生产表现疲弱，经济仍处于缓慢恢复状态。展望 2023 年，人口老龄化等长期性问题依然存在，叠加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全球经济下行、物价上涨以及供给制约有可能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日本经济将延续缓慢修复态势。

1. GDP 低速增长。如表 2 所示，2022 年，日本 GDP 增速为 1.0%，较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四个季度环比增速分别为 -0.5%、1.2%、-0.3% 和 0.0%；同比增速为 0.5%、1.7%、1.5% 和 0.4%，呈现波动修复态势。

从 GDP 构成看，净出口为经济增长主要拖累项，全年拖累经济增长 0.6 个百分点。防疫限制措施的放开以及鼓励国内旅行政策的推出带动了居民需求回暖，私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1.7 个百分点，其中私人消费拉动 1.1 个百分点，为主要拉动项。

2. 工业生产表现疲弱。2022 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 0.1%，较上年 5.6% 的增速由正转负。从月度数据看，工业生产指数波动较大，3 月份 107.1（2015 年 = 100）为年内最高，5 月份 83.8 为年内最低，全年为 95.6，仍明显低于新冠疫情前水平。

3. 消费需求保持增长。由于物价上涨叠加防疫政策逐渐放开，2022 年日本零售额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全年增长 2.6%，为 1991 年以来最高增速。新车登记数下降 4.4%，降幅较上年扩大 4.3 个百分点。消费者信心持续走低，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1 月份的 36.6 波动回落至 12 月份的 30.9，远低于新冠疫情前水平。

4. 贸易逆差急剧扩大。2022 年，日本货物贸易出口额增长 18.2%，增速较上年回落 3.3 个百分点；进口额增长 39.2%，增速加快 14.4 个百分点；由于能源等进口价格高企叠加日元贬值，贸易逆差较上年扩大 181824 亿日元至 199660 亿日元，为历史最高。

5. 价格较快上涨。2022 年，日本消费价格上涨 2.5%，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上涨 2.3%，均较上年的 -0.2% 由负转正，为 2014 年以来最大涨幅。生产者价格上涨 9.7%，涨幅较上年扩大 5.1 个百分点，为 1980 年以来最高。

6. 就业形势有所改善。2022 年，日本失业率为 2.6%，较上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为近 3 年最低。因新冠疫情好转和防疫政策逐步放开，求人倍率为 1.28，较上年上升 0.15，为近 3 年最高。

（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分化

2022 年，新冠疫情扰动、高通胀和货币政策收紧抑制需求增长，叠加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供应链陷入瓶颈，新兴经济体内外需均呈疲弱态势，生产和贸易受阻，复苏进程整体有所放缓。展望 2023 年，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可能会进一步减弱，但由于各经济体复苏的拐点与步伐存在较大差异，新兴经济体增长或将持续分化。

1. GDP 走势分化。2022 年，受上述因素影响，多数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有所放缓。如表 3 所示，韩国（2.6%）、墨西哥（3.0%）和中国台湾（2.5%）GDP 增速较上年分别回落 1.4、2.0 和 4.0 个百分点，中国香港（-3.5%）再度出现负增长；印度（6.7%）、巴西（2.9%）、南非（2.0%）等经济体经济增速均有所下滑，俄罗斯（-2.1%）出现经济衰退。与此同时，得益于出口强劲反弹，部分经济体超预期增长。新加坡（3.6%）GDP 增速高于官方预测的 3.5%；越南（8.0%）较上年大幅提高 5.4 个百分点，高于 6.0% ~ 6.5% 的增长目标，创 1997 年以来新高；印尼（5.3%）较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创 2013 年以来新高。

表 2 2022 年日本 GDP 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单位：%

指标	2022 年	2022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GDP	1.0	-0.5	1.2	-0.3	0.0
国内需求	1.6	0.0	1.0	0.3	-0.3
私人需求	1.7	0.1	0.9	0.3	-0.4
私人消费	1.1	-0.5	0.9	0.0	0.2
私人住宅投资	-0.2	-0.1	-0.1	0.0	0.0
私人企业设备投资	0.3	0.0	0.3	0.3	-0.1
政府需求	-0.1	-0.1	0.2	0.0	0.1
政府消费	0.3	0.1	0.2	0.0	0.1
政府投资	-0.4	-0.2	0.0	0.0	0.0
净出口	-0.6	-0.5	0.1	-0.6	0.4
出口	0.9	0.2	0.3	0.5	0.3
进口	-1.5	-0.7	-0.2	-1.1	0.1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注：季度数据为环比贡献。

2. 通胀超预期上涨。2022 年，印度（6.7%）、俄罗斯（13.8%）、巴西（9.3%）、南非（6.9%）等金砖国家通胀水平呈快速上涨态势，均达到近 10 年来高位；印尼（4.2%）和菲律宾（5.8%）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均超过官方 2.0% ~ 4.0% 的通胀目标；韩国（5.1%）创 1998 年以来新高，远高于 2.0% 的通胀目标。

3. 外贸增长失速。2022 年，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在经历上半年的强劲增长后开始持续放缓，下半年全球货币紧缩政策效应逐渐显现，外需呈现疲软态势，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增速逐渐下滑。12 月份，全球经济“金丝雀”韩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速（-6.1%）连续 2 个月萎缩，为 2020 年 8 月以来最大降幅，其中，出口额同比下降 9.5%，连续 3 个月负增长，进口额同比下降 2.4%，为 2020 年 11 月以来首次负增长，全年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增长 6.1% 和 18.9%；越南（-14.0%）、中国台湾（-11.8%）、印度（-6.9%）进出口总额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表 3 2021—2022 年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 单位：%

经济体	2021 年	2022 年	2022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中国台湾	6.5	2.5	3.9	3.0	3.6	-0.4
越 南	2.6	8.0	5.1	7.8	13.7	5.9
韩 国	4.0	2.6	3.0	2.9	3.1	1.4
印 尼	3.7	5.3	5.0	5.5	5.7	5.0
巴 西	4.6	2.9	2.4	3.7	3.6	1.9
新加坡	7.6	3.6	4.0	4.5	4.0	2.1
中国香港	6.4	-3.5	-3.9	-1.2	-4.6	-4.2
南 非	4.9	2.0	2.8	0.3	4.2	0.9
印 度	8.7	6.7	4.1	13.2	6.3	4.4
墨西哥	5.0	3.0	1.8	2.4	4.3	3.5
俄罗斯	4.7	-2.1	3.5	-4.1	-3.7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注：—表示无数据。

三、2023 年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一）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中国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助力全球经济增长。随着中国防疫政策调整，国内需求逐步回升，叠加政策效应，2023 年中国经济活力将进一步释放，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银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认为，随着全球需求前景恶化，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有望逐步向内需转移。消费者信心改善和消费需求释放，将推动国内消费逐步复苏；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和投资者情绪回暖，也会推动投资增速回升。根据世界银行 2023 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3 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4.3%，带动新兴经济体增长 3.4%，较其他新兴经济体 2.7% 的增速预期高 0.7 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 1 月 25 日发布的《2023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随着中国政府优化防疫政策、采取利好经济措施，2023 年中国经济将加速增长，增速将达到 4.8%，带动东亚地区经济增长 4.4%。根据 IMF 1 月 30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3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5.2%，较 2022 年 10 月预

测值大幅上调 0.8 个百分点。

主要经济体加息步伐将有所放缓。为遏制高企的通胀，2022 年美联储开启激进加息模式，全年共加息 7 次累计 425 个基点。其中，6 月份以来连续 4 次加息 75 个基点，为 1981 年以来最快加息周期。随着年末美国通胀有所回落，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2022 年 12 月，美联储加息幅度由此前的 75 个基点降至 50 个基点，2023 年 2 月 1 日，进一步放缓至 25 个基点，基准利率升至 4.50%~4.75%。主要经济体相继跟随放缓加息。2022 年 12 月 15 日，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均将加息幅度由此前的 75 个基点降至 50 个基点。在美欧“紧缩退潮”背景下，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压力得到一定缓解，全球金融市场条件或将改善，推动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提升经济增长动能。

（二）拖累经济增长的消极因素

全球贸易前景面临挑战。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全球货币政策趋紧、财政政策转弱、商品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不稳等因素将对全球供应链形成新挑战，贸易活动将在短期内持续承压，2023 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期仅为 1.6%，较上年回落 2.4 个百分点，较 2022 年 6 月预测值下调 2.7 个百分点。同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2 年海运评述》数据，2022 年海上贸易增速仅 1.4%，2023—2027 年平均增速虽加快至 2.1%，但仍低于前 30 年 3.3% 的平均增速。联合国报告预测，2023 年全球贸易量将进一步下滑，在基准情景下，预计 2023 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为 -0.4%，低于 2022 年的 6.0% 以及 2000—2021 年 4.5% 的平均增速。

高通胀仍具韧性，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依然存在。尽管在各国货币政策快速收紧作用下，部分经济体通胀水平有所回落，但受能源紧张、劳动力短缺、地缘冲突、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全球通胀水平或将继续保持相对高位。IMF 报告认为，美元相对强势导致多数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及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国内物价水平或将继续保持高位。同时，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可能导致工资增长高于预期，加大工资与通胀螺旋上升的风险，令通胀短期内难以大幅回落。预计 2023 年，全球通胀水平为 6.6%，仍高于新冠疫情前（2017—2019 年）3.5% 的平均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为 4.6%，发展中经济体为 8.1%，均处于历史相对高位。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若全球通胀无法得到有效控制，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在 1.7% 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 0.4 个百分点。在低增长高通胀背景下，全球经济“滞胀”风险将持续存在。

财政能力差异加剧经济前景分化程度。联合国报告指出，疫情以来各国的经济产出损失（即 2022 年 GDP 预测值与新冠疫情暴发前预测值差异）与人均财政支持呈负相关。2020—2021 年，发达经济体人均财政支持总额高达 12200 美元，而发展中经济体为 410 美元，最不发达经济体仅为 20 美元。这意味着，受财政能力差异限制，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冲击下经济遭受的产出损失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且经济恢复速度相对缓慢。此外，2022 年美元升值令多数经济体美元债务负担在财政收支中所占比重不断升高，财政空间受到挤压，支持经济复苏的支出受限，同时政策环境收紧使许多国家更难获得融资支持，财政能力被进一步削弱。据联合国预测，2023 年各经济体增长前景将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新西兰、澳大利亚持平于 1.9% 的世界平均水平，而欧元区、巴西预期增速低于 1.0%，英国、俄罗斯预期陷入负增长；由于财政空间相对充裕以及更被资本市场所看好，中国、印度经济有望快速复苏，预期增速为 4.8%、6.0%。

紧缩政策的冲击依旧是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风险。一是全球债务风险加剧。随着以美国为首的主

要经济体加快紧缩政策步伐，全球流动性收紧推动融资成本上升，政府偿债压力增加。而当前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普遍处于历史高位，据 IMF 估计，2022 年日本（263.9%）、意大利（147.2%）、法国（111.8%）远超 90% 的国际警戒水平，英国（87.0%）、巴西（88.2%）、阿根廷（76.2%）等接近警戒水平。二十国集团（G20）中约 60% 的经济体处于债务困境，这一比例较 2015 年的 27% 翻了一番。融资条件收紧导致经济体债务违约风险明显升高，2022 年黎巴嫩、斯里兰卡、苏里南和赞比亚已出现债务违约，加纳也于 2022 年年末宣布暂停支付所有外债。联合国报告指出，国际资本市场金融条件收紧，加剧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债务脆弱性，使其陷入投资疲软、增长缓慢和偿债负担不断加重这一恶性循环的风险显著上升。二是全球投资活动或将遭受持续性冲击。由于融资条件持续收紧，主要经济体投资表现低迷。其中，2022 年美国私人投资总额逐季下降，四季度投资额较一季度下降 5.8%，对利率敏感的住宅投资大幅下降 18.6%。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投资活动也普遍受到抑制，经济景气度呈低迷状态。世界银行报告预测，2023 年，发达经济体投资将增长 0.7%，低于 1.7% 的历史平均增速（2000—2021 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预期增长 3.5%，远低于 7.1% 的历史平均增速。此外，由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存在一定滞后性，到 2024 年，全球投资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投资额（12.0 万亿美元）仍难以恢复至疫情前趋势水平（12.5 万亿美元）。三是金融稳定风险不容忽视。2022 年以来，主要国家利率水平升至历史高位。其中，美联储年内加息 7 次，加息幅度累计高达 425 个基点，基准利率达 15 年来最高；欧元区、英国基准利率均达 2008 年 12 月以来最高水平；冰岛、墨西哥、巴西等均加息 10 次以上，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利率水平。在强紧缩货币政策下，全球流动性收紧，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全球金融稳定性面临威胁。彭博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股市价值损失约 1/5，为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美元指数年内一度创下 20 年来新高，全球非美货币对美元普遍贬值。在全球市场流动性继续收紧下，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将被不断放大，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

四、国际组织机构对世界经济的最新预判

2022 年，主要经济体生产活动从疫情中初步恢复，全球供应链压力回落至新冠疫情前水平，但超出预期的高通胀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快速收紧则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的脆弱性，叠加极端气候、地缘局势动荡和欧洲能源危机等负面因素，世界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滞胀风险不容忽视。国际机构预计，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9% ~ 3.4%，仅为 2021 年增速的一半。同时，受全球通胀改善过程较为缓慢、主要经济体增速继续放缓的影响，2023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将进一步回落，但各国际组织的预测差异较大（见表 4）。与此前的预测值相比，世界银行 2023 年 1 月较 2022 年 6 月下调 2023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1.3 个百分点至 1.7%；英国共识公司 2023 年 2 月较 2022 年 6 月下调 0.9 个百分点至 1.9%；联合国 2023 年 1 月较 2022 年 5 月下调 1.2 个百分点至 1.9%；由于全球金融环境的改善和各国限制措施放开等有利因素叠加，IMF 2023 年 1 月较 2022 年 10 月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2.9%。

IMF 报告指出，在持续的紧缩政策下，全球通胀预计将从 2022 年的 8.8% 降至 2023 年的 6.6%，预计 2023 年全球约 84% 的经济体通胀水平将低于 2022 年。但通胀大幅度回落仍需时间，预计至 2024 年，全球仍有 82% 的经济体通胀率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平。

表 4 2021—2023 年世界经济主要指标年度预测 单位：%

指标	预测机构	2021	2022 估计值	2023 预测值	指标	预测机构	2021	2022 估计值	2023 预测值
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	6.2	3.4	2.9	通货膨胀率	世界	4.7	8.8	6.6
	发达国家	5.4	2.7	1.2		发达国家	3.1	7.3	4.6
	美国	5.9	2.0	1.4		发展中国家	5.9	9.9	8.1
	欧元区	5.3	3.5	0.7		英国共识公司			
	日本	2.1	1.4	1.8		世界	3.6	7.4	5.2
	发展中国家	6.7	3.9	4.0		美国	4.7	8.0	3.9
	中国	8.4	3.0	5.2		中国	0.9	2.0	2.4
	世界银行					欧元区	2.6	8.4	5.5
	世界	5.9	2.9	1.7		日本	-0.2	2.5	2.1
	美国	5.9	1.9	0.5	货物贸易量增速	世界贸易组织 ²			
	中国	8.1	2.7	4.3		世界	9.7	3.5	1.0
	欧元区	5.3	3.3	0.0		出口 北美	6.5	3.4	1.4
	日本	2.2	1.2	1.0		中南美	5.6	1.6	0.3
	印度 ⁴	8.7	6.9	6.6		欧洲	7.9	1.8	0.8
	英国共识公司					亚洲	13.3	2.9	1.1
	世界	5.9	3.0	1.9		进口 北美	12.3	8.5	0.8
	美国	5.9	2.1	0.7		中南美	25.4	5.9	-1.0
	中国	8.1	3.0	5.2		欧洲	8.3	5.4	-0.7
	欧元区	5.3	3.5	0.4		亚洲	11.1	0.9	2.2
	日本	2.2	1.0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³			
	印度 ⁴	8.7	7.0	5.8		世界	10.4	5.4	2.4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2022 年 10 月）；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23 年 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3 年 1 月）；英国共识公司《共识预测》（2023 年 2 月）。

注：1. 购买力平价法 GDP 加权汇总；2. 为 WTO 基准预测；3.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4. 印度为财政年度数据。

参考文献：

1. Consensus Forecasts, Survey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ecast. February 2023.

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anuary 2023.

3.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Subdued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January 2023.

4.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October 2022.

5.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22. January 2023.

责任编辑：郭 霞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开放银行建设： 趋势、风险与监管

边 鹏 顾 研 钱 军 黄 毅

摘要：面对数字经济革命带来的冲击，开放银行通过与商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打造平台化的商业理念，为银行创造新的价值。利用报表词频统计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比较分析，本文实证研究显示，2018年以来我国银行业明显加大了开放银行建设，其中盈利能力差和风险水平高的银行更是将开放银行视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然而，开放银行也带来了数据泄露、网络安全等新的风险，实证结果也证实，开放银行建设明显提升了银行的违规概率。因此，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发展开放银行的总体目标，一方面根据不同类型银行的市场定位，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等推动开放银行发展；另一方面针对开放银行的潜在风险，监管层也要探索建立资质准入有限竞争模式、运用监管科技等加强开放银行监管。

关键词：数字经济 开放银行 金融风险 监管科技

作者简介：边 鹏，中国建设银行研修中心（研究院）研究员；
顾 研，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钱 军，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黄 毅，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

一、开放银行：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转型新模式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诞生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经济业态。其中，融合金融与信息技术的金融科技创新极大地拓展了传统金融业的服务范围和服务能力。面对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的浪潮冲击，传统金融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转型压力。作为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部门，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持续下滑，柜员等银行员工数量不断减少，物理网点也在逐步撤离。

面对互联网与金融科技崛起带来的挑战，为了更好地提升银行经营效率，拓展银行服务范围，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寻求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尤其是探索在相关领域的垂直合作，这其中如何构建有效合作模式，建立更好的合作生态，变得尤为重要（吴朝平，2020）。在此过程中，传统银行业尝试探索自身对外开放，包括业务与部分数据的开放共享。“开放银行”理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

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开来（易宪容等，2019）。

“开放银行是一种平台化的商业理念，通过与商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客户、员工、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服务，使银行创造出新的价值，构建新的核心能力”。以上是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给出的开放银行定义，也是目前接受度相对较高的版本之一。在其基础上，陈翀（2017）从技术层面指出，开放银行是应用程序接口（API）经济在银行业的具体应用，即指银行把自己的金融服务通过开放 API 或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技术方式开放给合作伙伴乃至客户。基于对欧美国家相关理念的总结，周科（2018）指出，开放银行是一种用户无需提供密钥即可与其账户所在机构之外第三方分享和掌控自身金融数据的新方式，即基于数据的安全共享，用户可以在一个界面上管理不同的账户，根据自身需要，比较选择产品以及更好地管理资产，比如避免过度透支、平衡现金流等。

开放银行核心特征在于，通过 API 等技术实现与合作伙伴、客户等在技术、金融业务以及数据层面的共享（边鹏、林胜，2019）。早期应用互联网时，企业基本都是独立开展业务，也就是仅通过其官方网站实现与用户的交互。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强与用户的接触，包括增加对潜在用户的曝光率、拓展与用户接触的渠道，以及便于其他网站用户也能使用本公司的服务，开始出现所谓“开放互联”的新格局，比如门户网站、搜索网站以及相关链接等。但是，用户访问与使用开放仅仅是“开放互联”的第一步，而随着数据量和数据关联的不断增强，如何整合已有数据并从中挖掘潜在价值，这就要求进一步推动部分数据开放。当前银行业正面临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公司的激烈竞争，转型压力之下拓展开放银行前沿生态，将业务场景由内向外延展，是银行重要的战略转型方向 and 未来发展趋势（付英俊，2021）。

二、开放银行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银行业，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普遍将 2018 年视为“开放银行”的元年，但事实上，国际方面对于开放银行理念的提出要更早一些。早在 2014 年，英国政府开展了一项针对英国零售银行业的调查，为期两年。调查结果显示，英国前四大银行占据了英国 80% 的经常账户，而这些银行用户更换其经常账户的频率只有 3%。如此稳定的用户群体和超高的用户粘性使得老牌银行缺乏革新动力，不愿意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同时，这也导致英国整个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很弱，小银行很难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对此，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CMA）提出，要求英国前九大银行，即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爱尔兰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集团、丹麦银行、桑坦德银行、劳埃德银行以及英国全国银行，建立统一且开放的银行 API 共同标准，并强制银行将客户资料通过 API 向授权第三方提供使用。在此基础上，英国 CMA 于 2016 年 9 月进一步要求由这九家银行共同出资成立开放银行实施组织（OBIE），负责执行开放银行的相关措施。2018 年 1 月 13 日起，英国这九家银行正式共享彼此数据，标志着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落地开放银行理念的国家。

欧盟对于开放银行的关注同样较早。针对银行传统支付业务，欧盟在 2015 年 11 月颁布了《新支付指令》（PSD2）。根据这一规定，银行必须将用户的账户、交易数据开放给客户授权的第三方机构，规定同时要求欧洲经济区各国必须在 2018 年 1 月前将 PSD2 转为法律。此外，欧盟 2016 年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由此赋予欧盟居民对个人数据更多的控制权，从而为欧盟开放银行发展在数据使用和数据安全上提供重要保障。

此外，2016 年 11 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联合新加坡银行协会发布 API 指导手册，手册提供了关于 API 选择、设计、使用环节的最佳指导，以及相应的数据和安全标准建议。2018 年 5 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基本同意此前金杜律师事务所（KWM）发布《开放银行调查建议》的基本内容，对澳大利亚开放银行建设的基本框架、数据分享机制、推行范围、操作计划等提出了全面、可行的实施方案。

与国际相比，国内开放银行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媒体报道显示，早在 2012 年中国银行就提出“开放平台”概念，并在 2013 年推出中银开放平台，通过该平台对外开放了 1600 个 API 接口，但市场对这一行为的关注度一直不高。直到 2018 年下半年，我国股份制银行和大规模国有银行开始加快在开放银行领域布局。^① 2018 年 7 月 12 日，浦发银行推出国内首个 API Bank 无界开放银行；2018 年 8 月底，工商银行在半年报中提到要打造“无所不包的开放银行、服务无所不在的身边银行、应用无所不能的智能银行”；2018 年 9 月，建设银行在中国银行家论坛上提到，要“将数据以服务的方式向社会开放，把技术服务推向社会，为整个社会赋能”；同样在 2018 年 9 月，招商银行宣布，迭代上线招商银行 APP7.0 版本、掌上生活 APP7.0 版本，争取打造出一个开放式服务平台。此后，包括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国内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一些城商行、农商行等也纷纷入局开放银行，截至 2020 年 11 月，我国已有超过 50 家银行上线或建设开放银行业务。

三、我国开放银行发展趋势、特征与风险

（一）我国开放银行发展趋势与特征

1. 发展趋势分析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快速发展，诞生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经济业态。其中，面对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传统经济金融业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和转型压力，开放银行成为银行业应对数字经济浪潮的一次自我革新。为了更好地理解近年我国开放银行的发展趋势，本文首先以我国上市银行为样本，构建开放银行相关指标。

开放银行是当前银行业拥抱数字技术革命、应用数字技术的一次重要转型。近年来，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吴非等（2021）、杨贤宏等（2021）基于企业年报的文本识别，通过对数字经济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统计相关词频，构建了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指标。考虑到开放银行的核心是通过 API 实现数据共享，数据处理应是开放银行涉及的关键技术（袁进明，2021），本文仅选择我国上市银行年报中的大数据（以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相关词频并对其进行对数处理，^② 作为开放银行发展程度的度量指标 *Digital1*（和 *Digital2*）。与此同时，本文也计算了同一时期非银行金融企业的上述指标，以便更好地比较和评估我国开放银行的发展趋势。

考虑到国内关于开放银行的概念 2012 年才被提出，本文选择了 2013—2020 年的样本进行分析。图 1 展示了 2013—2020 年我国银行业和非银行金融企业与开放银行相关的数字化表现。从中可以看到，近年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金融，我国金融企业的数字化表现不断提升。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随

^①事实上我国香港地区对开放银行的关注可能更早一些。2017 年 9 月，香港金管局宣布了迎接科技与银行融合的“智能银行”（Smart Banking）时代的 7 项行动，开放 API 就是其中之一；2018 年 1 月，香港金管局又发布了《香港银行业开放 API 框架咨询文件》，旨在推广开放 API 在银行业的应用，提升银行竞争力。

^②《中国开放银行白皮书 2022》指出，在各类 IT 技术领域中，我国银行对大数据的投入比例最高，超过 30%，排名第二的是云计算，超过 13%。

随着我国银行业开始大规模关注和布局开放银行，我国银行业在开放银行相关的数字化表现上大幅提升，增长幅度上更是明显高于非银金融。图 1 的统计结果表明，近年尤其是 2018 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在开放银行业态上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为了更为严谨地验证这一结论，本文进一步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Digital_{it} = \beta_0 + \beta_1 Bank_i \times Post_t + \beta_2 ROA_{it} + \beta_3 Equity_{it} + \beta_4 Size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开放银行相关的数字化表现，包括年报中大数据相关词频 *Digital1* 和大数据与云计算相关词频 *Digital2*。解释变量为交互项 *Bank* × *Post*，*Bank* 表示是否银行虚拟变量，银行样本取 1，非银金融样本取 0；*Post* 表示是否 2018 年及以后虚拟变量，2018 年以前的样本取 0，2018 年及以后的样本取 1。控制变量包括，盈利能力（*ROA*，总资产回报率）、杠杆水平（*Equity*，权益占总资产比例）、规模（*Size*，总资产的资产对数），以及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解释变量 *Bank* × *Post* 的一次项 *Bank* 和 *Post* 也分别被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吸收。

表 1 报告了对模型（1）的实证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解释变量 *Bank* × *Post* 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相比非银金融，2018 年以后我国银行业的开放银行相关的数字化表现明显提高。经济意义上，相比非银金融，2018 年以后我国银行业的开放银行相关的数字化表现 *Digital1* 和 *Digital2* 平均提高了 78%（= $e^{0.575} - 1$ ）和 87%（= $e^{0.628} - 1$ ）。

接着，本文进一步考察 2018 年是否为我国开放银行发展趋势的拐点。具体来说，用各个年份的虚拟变量 *Year2014*、*Year2015*、*Year2016*、*Year2017*、*Year2018*、*Year2019* 和 *Year2020* 替代模型（1）中的是否 2018 年之后虚拟变量 *Post*，分别与是否银行虚拟变量 *Bank* 交乘，检验各个年份的具体影响，模型如下：

$$Digital_{it} = \beta_0 + \sum \beta_l Bank_i \times Year_k + \beta_8 ROA_{it} + \beta_9 Equity_{it} + \beta_{10} Size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表 2 报告了对模型（2）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基于 2018 年之前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都不显著，而基于 2018 年及之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都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数值也明显大于之前年份的回归系数。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2018 年确实是我国开放银行发展的一个重要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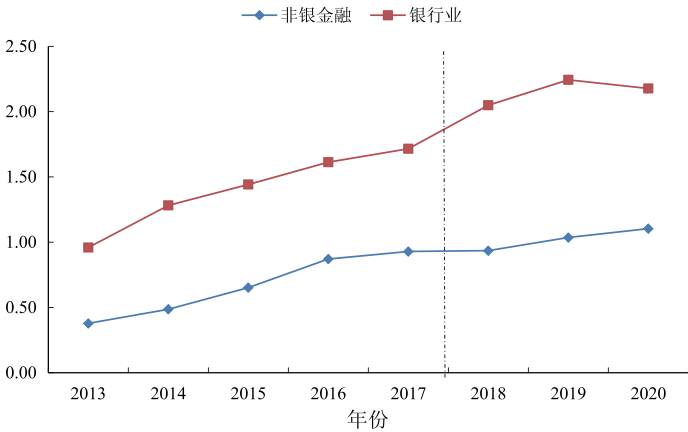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20 年我国银行业与非银金融企业的数字化表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计算而得。

表 1 我国开放银行的发展趋势

	(1) <i>Digital1</i>	(2) <i>Digital2</i>
<i>Bank</i> × <i>Post</i>	0.575 ***	0.628 ***
	(0.129)	(0.136)
<i>ROA</i>	0.565 *	0.520
	(0.309)	(0.337)
<i>Equity</i>	0.0445	−0.106
	(0.284)	(0.308)
<i>Size</i>	0.0722	0.0890
	(0.0554)	(0.0574)
Year/Firm FE	Yes	Yes
R ²	0.737	0.730
Obs	710	71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计算而得。

注：括号内为企业聚类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点，在此之后我国开放银行呈现明显的加速发展趋势。

2. 影响特征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渐下行，宏观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银行作为一个顺周期行业，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着盈利下滑、风险上升等问题。开放银行作为一种新的业态，对正在经历困境的银行来说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转型方向，一旦转型成功将会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有助于银行摆脱困境。因此，经营压力更大的银行，比如盈利表现更差、风险水平更高的银行，很可能会更重视开放银行的发展。

具体实证上，在模型（1）中进一步引入 $Bank \times Post$ 与盈利能力和风险水平的三次交互项。其中，盈利能力采用开放银行加速发展前年份（2017 年）的总资产回报率 ROA 度量，记为 ROA_Pre ；风险水平则采用开放银行加速发展之前三年（2015—2017 年）的总资产回报率 ROA 的标准差度量，记为 $Risk_Pre$ 。实证模型如下：

$$Digital_{it} = \beta_0 + \beta_1 Bank_i \times Post_t \times ROA_Pre_i + \beta_2 Bank_i \times Post_t + \beta_3 ROA_{it} + \beta_4 Equity_{it} + \beta_5 Size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tag{3}$$

$$Digital_{it} = \beta_0 + \beta_1 Bank_i \times Post_t \times Risk_Pre_i + \beta_2 Bank_i \times Post_t + \beta_3 ROA_{it} + \beta_4 Equity_{it} + \beta_5 Size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tag{4}$$

表 3 报告了对模型（3）和（4）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三次交互项 $Bank \times Post \times ROA_Pre$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三次交互项 $Bank \times Post \times Risk_Pre$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面对开放银行的加速发展趋势，原本盈利表现更差、风险水平更高的银行确实会更积极地开展开放银行业务。

（二）开放银行与银行经营风险

1. 开放银行的潜在风险

鉴于银行特殊的行业属性，风险往往是银行经营管理首要考虑的问题。开放银行要求银行增加对

表 2 我国开放银行发展趋势的拐点检验

	(1)	(2)
	<i>Digital1</i>	<i>Digital2</i>
<i>Bank</i> × <i>Year</i> 2014	0. 267	0. 249
	(0. 200)	(0. 219)
<i>Bank</i> × <i>Year</i> 2015	0. 321	0. 413
	(0. 306)	(0. 345)
<i>Bank</i> × <i>Year</i> 2016	0. 445	0. 484
	(0. 307)	(0. 330)
<i>Bank</i> × <i>Year</i> 2017	0. 551	0. 502
	(0. 373)	(0. 393)
<i>Bank</i> × <i>Year</i> 2018	0. 877 ***	0. 931 ***
	(0. 314)	(0. 337)
<i>Bank</i> × <i>Year</i> 2019	1. 043 ***	1. 141 ***
	(0. 265)	(0. 286)
<i>Bank</i> × <i>Year</i> 2020	0. 918 ***	0. 934 ***
	(0. 266)	(0. 290)
<i>Controls</i>	Yes	Yes
Year/Firm FE	Yes	Yes
R ²	0. 741	0. 734
Obs	710	71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计算而得。

注：括号内为企业聚类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表 3 影响我国开放银行发展趋势的特征

	(1)	(2)	(3)	(4)
	<i>Digital1</i>	<i>Digital2</i>	<i>Digital1</i>	<i>Digital2</i>
<i>Bank</i> × <i>Post</i> × <i>ROA_Pre</i>	- 1. 410 **	- 1. 248 *		
	(0. 538)	(0. 654)		
<i>Bank</i> × <i>Post</i> × <i>Risk_Pre</i>			6. 115 **	5. 198 *
			(2. 704)	(2. 981)
<i>Bank</i> × <i>Post</i>	1. 902 ***	1. 802 ***	0. 0455	0. 180
	(0. 553)	(0. 657)	(0. 315)	(0. 343)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ar/Firm FE	Yes	Yes	Yes	Yes
R ²	0. 736	0. 729	0. 722	0. 716
Obs	671	671	619	61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计算而得。

注：括号内为企业聚类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外的数据分享，由此带来了数据安全方面一些新的风险点。

第一，数据泄露的风险。开放银行连接了服务的提供方、交易发起方等众多主体，数据泄露风险增多，任何一方数据保护存在薄弱环节，都可能危及金融数据安全。一旦开放银行服务接口存在设计缺陷或权限设置不当，恶意攻击者就可能非法获取客户数据，应用方也可能违规使用交易信息。

第二，网络安全的风险。依托互联网渠道向客户服务，开放银行接口具有公开的共享属性，被恶意调用并发起拒绝式服务攻击，可能导致商业银行业务系统服务不可用，造成业务连续性中断。开放银行接口服务属于外部服务，面临着访问漏洞等外部应用安全风险，一旦安全漏洞被恶意利用，将导致服务器被入侵等不良后果。

第三，业务开放的风险。从业务流程再造角度看，为提升开放银行业务灵活性，商业银行将现有业务流程拆分，分装为多个业务接口，控制不严，将会导致业务流程无法按照预期执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来看，当前针对开放银行的消费者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资金偿付纠纷投诉等机制有待健全。

第四，外部合作的风险。开放银行促使商业银行与其他行业合作更加紧密，对商业银行外部合作方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事前如果缺少健全的准入机制，将导致资质不佳的合作方浑水摸鱼，增加风险事件的发生比例。

此外，由于近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合规监管趋严，本身盈利能力差、风险水平高的银行更倾向通过开放银行建设实现转型，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开放银行可能带来的经营和治理风险。总之，无论是基于银行业本身的特征，还是开放银行对银行经营模式的影响，开放银行对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都需要重点关注。

2. 开放银行风险的实证检验

一般来说，经营风险很难在事前被准确识别。因此，本文采用事后识别的违规行为作为经营风险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第一阶段仍为模型（1），交互项 $Bank \times Post$ 就是数字化表现 $Digital$ 的工具变量，第二阶段通过以下模型检验开放银行对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

$$Misconduct_{it} = \beta_0 + \beta_1 Digital_{it} + \beta_2 ROA_{it} + \beta_3 Equity_{it} + \beta_4 Size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tag{5}$$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是否违规，若事后发现当年发生违规则记为 1，否则为 0。解释变量为开放银行相关的数字化表现，包括基于大数据相关词频的 $Digital1$ 和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相关词频的 $Digital2$ 。控制变量设计与模型（1）完全一致。工具变量回归不仅能够避免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而且也能更好地明确来自开放银行快速发展对银行违规风险的潜在影响。

表 4 报告了基于上述工具变量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从中可以看到，解释变量 $Digital1$ 和 $Digital2$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相比非银金融，开放银行相关的数字化转型显著加剧了银行出现违规行为的概率，从而表明开放银行确实加剧了银行经营风险。

表 4 开放银行对银行违规行为的影响

	(1)	(2)
	$IV = Bank \times Post$	
	<i>Misconduct</i>	
<i>Digital1</i>	0.246 *	
	(0.135)	
<i>Digital2</i>		0.225 *
		(0.123)
Year/Firm FE	Yes	Yes
Obs	710	71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计算而得。

注：括号内为企业聚类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四、我国开放银行发展思路与监管对策

（一）我国开放银行的发展思路

作为近年兴起的一种新兴业态，开放银行为传统银行业应对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公司竞争提供了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当前面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开放银行也成为我国银行业转型的一个关键突破方向。2018年以来，我国银行业明显加大了开放银行建设，本身盈利能力差和风险水平高的银行更是大力加强开放银行建设，以期助力银行自身的转型升级。

考虑到开放银行的生态特征与我国银行体系的结构特点，我国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需要基于自身定位明确对开放银行的应用策略。首先，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自身的规模、资源、技术等优势，有能力实现开放银行体系中的闭环经营，也就是同时完成数据共享、技术支持和业态应用，当然这一过程中可能需要借助商业银行的不同子公司进行合作。其次，中小银行由于规模、业务范围等限制，往往很难开展过多的业务，因此引入更多的科技公司和机构合作可能成为开放银行业态下的最优发展策略（周琰，2019）。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数据、技术等的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要做好有序竞争制度设计。一方面，在保证适当竞争避免垄断的前提下，大型商业银行需要做好信贷等银行核心业务；另一方面，面对金融普惠的要求，包括大型银行在内的我国银行体系要利用开放银行发展契机，拓展金融普惠服务边界，提升金融普惠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我国开放银行发展现状，建议进一步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我国开放银行业态的发展。

第一，加强支持开放银行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当前开放银行仍处于发展初期，如何推动开放银行这一新兴业态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好的顶层设计。2020年2月13日，人民银行发布了《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这为开放银行监管开启提供了第一步的技术基础和标准。但开放银行涉及不同机构、主体的数据共享和使用，相关规则包括数据如何确权、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如何监管等问题仍需出台更明确的监管规范，这也是开放银行发展依赖的制度基础。

第二，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开放银行的关键在于数据开放，而扩大数据开放、提升数据使用效率也是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明确了数据确权、数据开放方式、范围等基础制度后，需要建立实现数据开放的共享平台。考虑到开放银行的服务主体、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建议由政府监管部门主导，金融机构、实体企业、高校等主体共同参与，建立金融大数据开放平台，从而为开放银行发展提供重要的平台性基础设施。

第三，推动银行业完善开放合作的新发展理念。相比传统意义上的直接服务客户，开放银行旨在推动银行将数据共享，通过与第三方企业、政府平台等合作，扩大服务客户范围和服务客户能力。近年随着金融科技的兴起，银行面对金融科技在服务长尾客户上的优势，不断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但相比业务上的合作，开放银行进一步拓展至底层数据上的合作，这要求银行业进一步突出“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以开放的心态和理念进一步发掘并满足客户需求。

第四，加强金融科技前沿技术在开放银行中的应用。开放银行是银行应对数字经济冲击的一种业态创新，而除了数据开放环节的API端口设计，开放之后的流程管理、风险监控等环节都对业务开展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对此，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前沿技术，将有力提升开放银行的实施效率、覆盖范围等方面，从而保证开放银行顺利、安全的推进。而在具体实施

上，除了银行自身加强技术研发和运用，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也是一个重要思路。

（二）我国开放银行的风险监管对策

银行业本身是一个风险管理要求很高的行业，而开放银行要求银行与政府、第三方企业等进行数据共享和业务合作。这很可能带来数据和隐私泄露、合规滞后监管等新型风险，实证结果也表明开放银行确实增加了银行违规的可能性。因此，风险防控也是开放银行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加强的一个方面。首先，根据近年国内外金融创新监管的经验教训，资质准入是实施金融创新过程中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引入金融科技公司等开展开放银行业务拓展时，保证这些机构具有开展金融业务的基本资质至关重要。同时，要加强信息披露，尤其要包括公司股东、技术人员、相关金融团队等的信息披露，以此降低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风险，从而避免因金融领域创新误用而导致风险扩散的重大社会性风险事件。其次，针对开放银行业务模式的创新特点，监管科技应成为监管开放银行潜在风险的重要手段（杨东，2018）。具体建议如下：第一，建立数据及信息开放相关管理标准体系，统一规范的技术、应用、管理标准不仅有利于开放银行业务的标准化推进，也有利于监管科技的接入和应用；第二，做好监管科技政策对接工作，尤其在数据采集、智能化分析以及开放底线等方面建立明确政策设计，便于监管科技的应用；第三，加强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包括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第四，加强监管科技应用的风险防控，确保新技术接入不会影响现有系统服务效率，并加快构建监管科技应用检验体系，提高应用监管科技的成熟度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吴朝平：《API 开放银行：金融科技背景下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 年第 1 期。
2. 易宪容、陈颖颖、周俊杰：《开放银行：理论实质及其颠覆性影响》，《江海学刊》，2019 年第 2 期。
3. 陈翀：《第三方开放银行平台模式》，《中国金融》，2017 年第 20 期。
4. 周科：《开放银行理念的缘由、实施和挑战》，《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6 期。
5. 边鹏、林胜：《开放银行的理论与发展》，《中国金融》，2019 年第 21 期。
6. 付英俊：《开放银行的发展路径》，《中国金融》，2021 年第 19 期。
7.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1 年第 7 期。
8. 杨贤宏、宁致远、向海凌、陈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21 年第 11 期。
9. 袁进明：《大数据视角下的开放银行数据共享模式与监管研究》，《海南金融》，2021 年第 5 期。
10. 周琰：《“开放银行”商业模式下中小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研究》，《海南金融》，2019 年第 2 期。
11. 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综合运用宏观政策工具 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

汪红驹 杨雅婷 姚 博

摘要：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控制未来全球气温升高和衍生的气候风险，各国支持绿色发展、加强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管理的宏观政策工具呈现多样化趋势。我国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任务艰巨；跨地区、多部门协调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能力不高；全国碳市场交易总体还不够活跃；棕色资产界定标准不明确，转型金融滞后于绿色金融；货币政策审慎管理与气候风险管理不匹配。为综合运用宏观政策工具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我国应完善财政政策对气候转型的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应继续深化绿色金融发展，构建转型金融框架体系，强化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信息披露，不断丰富应对气候转型风险的货币审慎工具，提高国内多部门协调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强气候风险审慎管理的国际合作。

关键词：气候变化 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 货币政策

作者简介：汪红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雅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姚 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引 言

要实现《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全球需在 21 世纪 50 年代初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同时还需大力控制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IPCC WGIII, 2022）。各国需从供给和需求两侧采取综合措施，在能源供应、能源消费等领域实现重大转型，推广工业、运输业、建筑业使用低碳、零碳能源，强化农林业以及城市地区碳吸收和碳储存能力。减缓全球气候恶化的重大转型产生了巨大资金需求，^① 金融体系在规范和引导资金精准流向气候适应性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风险是一种新型的系统性风险——“绿天鹅”风险，退化的生态环境与不可预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工作组 2022 年预估到 2030 年的多种情景，用于电力、交通、农林土地以及工业和建筑节能措施的全球年平均减碳投资需求占全球 GDP 的 3%~6%。另外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1 年估计，到 2030 年，净零排放每年可能需要近 5 万亿美元的投资，到 2050 年每年需要 4.5 万亿美元的投资。年度账单相当于 2019 年全球企业利润的一半左右，或过去 15 年公共债务年度增长的一倍半左右。农业、交通和其他部门脱碳所需的额外投资可能会使费用增加近 1 倍。

反应之间可能发生复杂连锁反应，并引发下一场金融危机，对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破坏（Bolton et al., 2020）。

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特指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减缓气候变化采取的政策作用于金融领域形成的相关风险。气候变化首先产生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前者指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损失，后者指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减碳政策以及改变投资行为而产生的损失，两者通过各种途径影响金融资产和负债，进一步演变为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危及金融系统稳定的各种金融风险（IPCC WGIII, 2022）。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导致金融业务风险暴露，具体表现为经营风险、银行贷款风险、信用风险、保险业务风险、资产重估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汇率市场风险、法律责任风险、声誉风险等多种风险类型，使得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具有长期叠加性、不可预测性和衍生多样性，在时空行业分布上具有显著差异性。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给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带来了巨大挑战，亟待深入研究前瞻性的政策组合并采取协调的集体行动，以在气候变化时代保持金融长期稳定。本文集中分析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宏观政策工具，指出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宏观政策工具

为了控制未来全球气温升高和衍生的气候风险，各国支持绿色发展、加强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管理的宏观政策工具呈现多样化趋势。

（一）综合运用公共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绿色发展

1. 公共政策。多数国家都颁布实施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以我国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加大环保、节能和低碳的执法力度。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环保督查，严厉查处企业违法排污现象。在能源方面，出台了《节能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在低碳方面，《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等文件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和实施方案。同时，也明显提高了环保、节能和低碳标准。2019 年起，生态环境部先后修订了《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10 余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了行业的覆盖面和针对性，进一步明确了控制要求，增加了大气环境监测项目。^① 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也都将降低能耗和污染减排内容纳入综合考核评价，并实行负责人问责制。

2. 财政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支持绿色发展的财政政策工具分为价格政策、支出和投资、公共担保三大类。（1）价格政策。价格政策以碳定价为核心，同时包括缓解行动补贴、低碳投资补贴、利率补贴、税收减免等内容。碳定价机制包括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两种形式。截至 2022 年 4 月底，全球有 68 个明确的碳定价机制，还有 3 个计划实施。其中包括 37 种碳税和 34 个 ETS。这些机制所涵盖的司法管辖区（国家/国家集团/省份）占全球生产总值（GDP）的 70% 以上。2021 年碳定价机制获得的碳收入为 840 亿美元，其中 ETS 收入占 67%，碳税收入占 33%。从全球范围看，碳价仍然过低。2021 年碳价从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1 美分到 134 美元不等，超过 60% 的碳定价机制确定的碳价仍低于 10 美元，达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建议价格范围的碳定价机制覆盖的碳排放

^①参见生态环境部官网相关政策文件。

量不到全球排放量的4%。2021年7月,我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行业,包括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邢丽等,2022)。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1年覆盖的碳排放范围达到4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比重超过30%,这也是全球碳定价政策覆盖的碳排放比例从2020年的15.1%上升到2021年21.5%的主要原因。^①(2)公共支出和投资。公共支出和投资工具包括直接公共投资、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公共投资基金。虽然公共投资只占缓解气候变化投资的一小部分,但公共投资可以引导私人投资。欧盟倡导政府绿色采购,鼓励成员国采购绿色产品,且应达到绿色合同的50%以上,此举较大程度推动了资金流入环保产业,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美国2005年颁布了《联邦采购规则:可持续采购》,推动各级政府建造或使用了超过50万幢绿色节能建筑(马骏等,2014)。加州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不仅增加了公共部门对低碳工业产品的需求,也拉动了私人部门的环保消费(Simcoe and Toffel, 2013)。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也有相似作用,可以锁定使用的能源组合类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锁定碳排放(Krogstrup and Oman, 2019)。而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节能环保支出近几年有所减少,2020—2022年分别为6317亿元、5536亿元、5396亿元,^②今后还需要设法保持规模增长。(3)公共担保。公共担保能够以最小的财政成本降低项目开发商、金融中介和储户的风险感知,有助于确保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公共融资和填补低碳投资缺口(IPCC, 2018)。例如,美国农业部农村能源计划(REAP)为农民和农村加工企业提供担保性贷款,帮助其购置可再生能源系统。公共担保还有助于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投资,并可帮助寻求大规模且可持续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例如,国际金融公司对我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实施贷款担保支持计划,以国际第三方资金带动商业银行共同出资分担损失资金。

3. 金融政策。很多国家通过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政策支持节能产业发展、抑制环境污染。(1)绿色贷款。绿色贷款的应用最普遍,主要是指银行为企业的环保项目提供比较优惠的利率或其他便利,或者限制企业进入具有负面环境效应的领域。赤道原则(EPs)是当前全球自愿性绿色信贷原则,在该原则下,银行更愿意为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提供融资贷款。目前我国已经有兴业银行、江苏银行等9家先后采纳EPs的银行。我国也出台了多个鼓励绿色信贷的规划政策,例如《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绿色信贷指引》等。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40.4%。^③(2)绿色债券。绿色债券通过债券市场为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产业项目筹集成本低、流动性强、长期稳定的资金。针对绿色债券标准、募集资金用途等问题,我国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2022年7月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原则》,明确了绿色债券定义及四项核心要素,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应100%用于绿色项目,实现了与国际绿色债券标准接轨。^④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我国发行绿色债券金额达8936.3亿元,同比增长62.4%。^⑤为培育更大规模的绿色债券市场,降低绿色金融的融资成本,需要在标准制定、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创新及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3)绿色保险。多国通过环境责任法律强调“污染者付费”,明确污染责任。环境责任保险就是

①World Bank,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2, pp. 8 ~ 27.

②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

③数据来源:万得(Wind)数据库。

④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关于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的公告》,2022年7月29日, <https://www.nafmii.org.cn/ggtz/gg/202207/P020220801631427094313.pdf>.

⑤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指由于污染环境，将应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对象，这样可以帮助企业提供赔偿和修复环境，并且对某些行业采取强制保险，从而将环境成本内化，减少环境风险过大的投资行为。我国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列为强制投保险种。

（二）评估气候风险，将气候因素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信息披露要有助于改善气候风险的定价和透明度，国际上已经开展了不少将气候风险纳入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的讨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2015 年创设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2017 年 TCFD 建议中央银行在支柱三中纳入影响金融运行的气候环境信息（TCFD，2017）。部分国家已开始在宏观审慎框架中考虑气候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将银行的绿色债券与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银行持有的绿色资产越多，在 MPA 中得分越高，能获得的监管激励就越多。欧洲央行制定的《气候环境风险指南（草案稿）》，要求金融机构将气候环境风险融入到现有审慎风险管理当中，增加金融机构有关气候和环境信息的披露，提高应对气候环境相关风险的透明度。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审慎监管局要求英国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评估不同气候情景下（包括物理风险和过渡风险）的压力测试影响（Bank of England，2019），以协助开展气候风险管理。

但是否将气候因素引入资本要求还存有争议。Schoenmaker 等（2015）建议可对特定的碳密集型资产赋予较高的风险权重，降低金融机构对高碳资产的融资意愿。不过也有部分研究质疑这种做法。Batten 等（2020）认为资本要求是对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约束，如果用来反映环境外部性，可能会削弱原始监管目标。对低碳领域放松监管要求可能会导致相应机构缺乏足够资本维持安全和稳健。如果监管政策收紧碳密集型企业的融资敞口，可能导致这些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低碳转型投资能力下降。此外，原本《巴塞尔协议Ⅲ》对长期项目融资设定了更高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而环境可持续性投资，特别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需要长期资金，此举可能会削弱对相关领域的融资支持。

（三）不断完善气候金融风险评估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方法

情景分析法是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评估气候变化影响宏观经济及金融体系的重要工具。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以及英国、欧盟等经济体在探讨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情景下的压力测试的经验较为成熟。中国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发了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模型（张红力等，2016）。2020 年 NGFS 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气候情景分析指南》提供了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框架，对自然灾害和行业变化影响的各个变量进行量化细算，得出不同情景下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种模式所对应的银行信贷端和负债端面临的资产估值波动变化（NGFS，2020a）。但是气候变化情景下的风险压力测试方法也有一定局限性，该方法无法避免金融体系遭遇的绿天鹅事件，未来在具体应用评估气候金融风险时，该框架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Bolton, et al., 2020）。

（四）将绿色金融纳入货币政策工具框架

随着气候相关金融风险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相关性日益增强，中央银行不断丰富绿色金融的货币政策工具。

1. 完善传统货币信贷政策。目前已有中央银行考虑通过采取差别准备金、差别再贴现率和信贷配额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领域。（1）差别准备金。部分中央银行考虑将存款准备金要求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的“含绿量”挂钩。对持有绿色资产较多的金融机构确定一个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要求，以此拉动绿色投资。黎巴嫩能源保护中心为从事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建筑节能相关项目颁发证书，如果商业银行为这些项目融资，黎巴嫩中央银行将降低其存款准备金要求。（2）差别再贴现率。部分

中央银行考虑，如果商业银行给绿色项目或企业提供融资，可以向中央银行以较低利率申请再贴现。

(3) 信贷配额。为限制碳密集领域信贷扩张，可对碳密集及相关资产风险敞口集中度设定上限，还可利用窗口指导的方式引导信贷资金流向绿色领域。例如自 2016 年起，孟加拉中央银行要求各金融机构必须将其贷款组合中至少 5% 的资金投向绿色领域。

(4) 碳减排支持工具。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以减少碳排放为导向，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中国人民银行 2021 年 11 月 8 日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该货币信贷工具旨在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自担风险、自主决定向碳减排领域的各类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该工具具有结构性降准和降息的效果，会对碳减排市场发挥补缺口、降成本、调结构的功能。

2. 央行实施绿色资产投资。有观点认为，在央行资产购买操作中嵌入可持续发展标准，可以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常见的方式有绿色量化宽松、抵押品管理、外汇储备管理、央行管理养老金计划等。

(1) 绿色量化宽松。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如果减少购买碳密集型金融资产，增加购买绿色资产，可以形成良好导向作用，抑制高碳金融资产，促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为低碳转型提供额外融资。但是质疑的声音也颇多。首先，绿色债券市场不够发达，绿色债券仍是一个新兴的投资品种。其次，当前绿色债券评级较低，购买此类债券可能降低央行资产组合质量。第三，将资产购买与低碳资产条件挂钩，可能会限制可购资产的范围，降低量化宽松的效用（Krogstrup and Oman, 2019）。

(2) 抵押品管理。商业银行更倾向于持有属于中央银行合格抵押品的资产，如果将绿色债券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更多地投资绿色债券。中国人民银行将符合条件的绿色债券与绿色贷款纳入货币政策合格抵押品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3) 外汇储备管理。部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外汇储备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例如，香港金管局在外汇储备中优先考虑绿色与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投资，并确保其长期风险调整回报与其他投资相当，还要增加外汇基金中的绿色债券组合；瑞典央行决定不再支持“气候不友好”的债券发行者，并已在外汇储备投资中剔除部分州政府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尽管部分中央银行将绿色金融资产视作外汇储备管理工具，但是绿色债券能否作为储备资产，取决于未偿还余额、风险收益比等因素。目前全球绿色债券发行与未偿还余额规模较小，限制了其作为央行储备资产的能力。

(4) 央行管理养老金计划。部分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管理养老金计划时也将绿色可持续因素纳入考虑。例如，法兰西银行的员工养老金管理遵循负责任投资原则进行投资，不允许将养老金投向涉煤资产；欧洲央行要求负责员工养老金股权投资的资产管理人签订负责任投资协议，在股权投资决策中纳入 ESG 因素；挪威央行对自己管理的政府养老基金设置 ESG 标准，并拒绝投资给可能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企业。

二、我国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其对自然生态系统已经产生不利影响，并不断向金融领域蔓延，引发的有关风险不容忽视。

（一）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结构转型任务艰巨

目前，我国碳排放总量为全球第一，但人均能源消费还有很大增长空间。2019 年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 50%^①，随着我国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①数据来源：IEA 数据库。

未来能源需求将会持续增长。现在我国碳排放占比最大的部门是发电和供热行业，其次是制造业。根据国际能源署 2020 年的统计数据，我国 2030 年实现碳达峰时的碳排放水平大约为 100 亿吨，而英国实现碳达峰时的碳排放水平约为 6.3 亿吨，我国从 2030 年碳达峰到 2060 年碳中和用时 30 年，而英国从 1973 年碳达峰到 2050 年碳中和用时 77 年，因此我国要完成碳减排的时间紧、任务重。此外，在 2020 年我国的能源结构占比中 85% 是化石能源，其中煤炭占 58%，石油占 19%，天然气占 8%，^① 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结构转型的难度非常大。按照世界银行（World bank，2022）的测算，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 37%，2060 年则要达到 80% 以上。

（二）跨地区、多部门协调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

为了实现污染减排目标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受挫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所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将高碳高排放行业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地区，为了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而过早实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地方政府必然会对污染不达标的行业企业进行强制关停，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能源断供、拉闸限电和经济增速下滑。在绿色金融和转型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即使要求企业对减排技术进行低端升级改造，暂时可能完成 2030 年碳达峰任务，但随后带来的碳排放，仍然会增加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的难度。在部门协调不到位、金融监管模糊的状态下，地方政府存在突击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绩观，将绿色金融庸俗化，部分应对气候变化任务的责任主体打着发展绿色金融的旗号会占用太多的公共资源和成本，“漂绿”和“染绿”项目浪费公共资源。

（三）全国碳市场交易总体还不够活跃

目前全球 75% 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与发电、运输、工业领域的化石燃烧相关，所以气候变暖虽然是全球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动因却在少数，主要集中在石油公司、汽车行业、大型制造业等（Harvey，2020）。因此，应对全球变暖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促进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目前虽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是交易总体还不够活跃，日交易量和交易活跃度较低迷，波动性较大。目前仅有少数行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全国碳市场还未形成反映碳排放综合社会成本的碳价信号，对企业减排和低碳融资的激励约束作用不足。

（四）棕色资产界定标准不明确，转型金融滞后于绿色金融

欧盟已经发布了绿色金融分类方案，中国人民银行也制定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目录，但是国际上还没有对棕色资产进行科学界定，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风险权重也没有考虑绿色资产和棕色资产的差别。对许多高碳企业来说，即使有可行的低碳转型项目，但因达不到“纯绿”要求，很难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2019 年 OECD 提出“转型金融”概念（Piemonte，et al.，2019）。转型金融主要针对“棕色”领域转型提供资金支持，补充覆盖煤炭、钢铁、水泥等高碳领域，并辅以较高的信息披露与转型关键指标要求，引导和督促“棕色”领域的转型发展，加速全社会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进程。我国转型金融刚刚起步，目前主要包括转型债券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金融发展滞后于绿色金融。

（五）货币政策审慎管理与气候风险管理不匹配

首先，二者的期限不一致。货币政策往往是中央银行为金融机构提供的在流动性管理工具方面的支持，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工具一般仅能起到短期效果，而气候变化所产生的风险却具有长期性

^①作者根据 Wind 数据库数据计算而得。

(Batten et al., 2020)。其次，政策目标会出现冲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出于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但是如果货币投放过多，又会引发物价上涨，形成资产泡沫甚至是通货膨胀，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不稳定 (Campiglio et al., 2018)。第三，货币政策工具严重不足。传统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要维护物价和外汇市场的稳定发展，专门为了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来实施货币政策，就面临缺少针对性更强的货币政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2020)。因此，中央银行在支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过程中，应该以自身政策目标为前提，不能以牺牲央行维护物价和外汇稳定目标为代价，而是要考虑与财政和税收政策相结合，共同发力，促进绿色发展转型。

三、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为了减缓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对金融体系造成的潜在冲击和负面影响，金融体系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中央银行更需要做好相关制度设计，防止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中央银行成为“气候救援的最后贷款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施策。

（一）完善碳定价机制，推动实现气候转型目标

一是完善我国碳定价机制，允许并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交易。有序优化完善碳市场机制，扩大碳市场配额企业覆盖范围，鼓励金融机构进入碳市场，开发碳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为应对气候变化物理和转型风险提供避险工具。二是加强碳定价国际对话与合作。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确定于 2023 年 10 月开始试运行，并计划在 2034 年之前全面实施。IMF 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议设定国际碳定价下限；美国和欧盟拟议的《钢铝贸易碳基部门安排》，通过双边贸易协议缓解碳泄露。我国应针对国际碳定价问题的这些新动态，研究其防止碳泄漏和鼓励超越国界的碳减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坚持在联合国主渠道下加强气候合作，做好应对国际组织倡议的政策储备，强调“自愿减排”，加快完善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多措并举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三是综合运用缓解行动补贴、低碳投资补贴、利率补贴、税收减免、公共环保支出和投资、公共担保等财政政策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资金支持。

（二）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继续深化绿色金融发展

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和普及绿色文化理念，不断提升金融机构的绿色投资意识。优化绿色金融的各种绿色目录，包括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或者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开展的新能源或者能效投资项目。发挥金融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控气候风险的引领作用。鼓励金融机构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积极开发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资产证券化等绿色产品，探索碳金融、环境责任险、气候保险等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推动绿色指数、绿色基金等产品开发。

（三）构建转型金融框架体系，推进转型金融发展

NGFS (2020b) 已提出中央银行应该明确绿色、非绿色、棕色、非棕色的资产标准，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尽快制订棕色资产的标准目录，帮助金融机构识别转型风险，促进转型金融发展。在产业层面，我国需要发挥产业和环保政策导向作用，有序退出淘汰高污染产能，引导资源要素向产出效益高、环境效益好的企业集聚。金融层面，需要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体系，明晰转型路径、制订明确的转型标准、披露要求以及激励措施。创新转型金融产品体系，鼓励发展支持低碳转型的股权投资基

金和并购基金、夹层基金，引导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机构更多参与转型金融活动。鼓励政府担保基金积极开发支持转型活动的担保产品，为符合条件的转型企业和转型项目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相关并购贷款业务，支持兼并重组的直接融资工具。

（四）制定低碳基准和信息披露要求的措施，强化信息披露

具体可以要求企业及时披露气候环境风险的相关信息，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应该及时披露其与气候环境有关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信息。目前对于是否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信息披露框架还存在争议。考虑到一些常用指标和方法仍在不断完善，可以强制要求金融机构披露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敞口，但是披露内容应该足够灵活，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五）不断丰富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货币审慎工具

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纳入气候因素，并对货币相关工具进行调整和校准。在资产工具方面，首先明确绿色资产和棕色资产的分类标准，然后整理两类资产的信贷违约率数据，在评估方法一致的情况下，合理分配绿色资产和棕色资产的权重，对风险调整后的风险资产进行加权计算。在资本工具方面，根据银行绿色资产来设定不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标准，对绿色指标完成较好的银行可以降低其逆周期资本缓冲条件，在计算银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指标时，按照风险调整后的风险资产进行加权测算。在结构性工具方面，设置棕色贷款集中度，根据不同行业和部门的碳密集程度，设立差异化的棕色贷款占比上限，限制信贷资源向高碳行业流动。同时控制棕色信贷的贷款价值比和偿债收入比等指标，防范棕色资产风险产生的系统脆弱性风险。

（六）提高多部门协调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能力

分行业确定气候风险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路径、约束工具和风险评估措施等，综合考虑能源供求平衡、劳动就业转型、国际能源价格等宏观环境和政策调整因素，合理设置风险评估、压力测试等模型参数，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气候环境风险分析平台，加强行业、地区、企业数据的共享，在协调一致的规范政策激励配合下，不断向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转型。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工具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可能重叠，也可能相互打架。为确保政策组合的有效性和效率，有必要加强政策协调。可以参考法国成立高级气候委员会的做法，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成立相关协调机构，评估公共政策、财政政策 and 货币金融政策的效率及一致性，加强各政策领域协调，深入研判并及时处置气候相关金融风险。

（七）加强气候风险审慎管理的国际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需要各国协调的重大政治议题，只有在国际社会达成谅解一致的前提下，气候变化应对才能有实际效果。积极参与 IPCC、世界银行环境规划署等国际平台的气候谈判，促进全球相关部门之间建立综合性、适应性、共生性合作原则以及数据驱动和动态规范的方法，就绿色标准、可持续性目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气候风险评估方面开展一致性行动，并应用不同的 ESG 风险分析。要根据我国的国情，细化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具体路径和责任，争取更多国际气候投融资支持。

参考文献：

1. 邢丽、许文、郝晓婧：《国际碳定价倡议的最新进展及相关思考》，《国际税收》，2022 年第 8 期。
2. 马骏、施焜、姚斌：《绿色金融政策及在中国的运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2014 年第 7 号。

3. 张红力、周月秋、马骏等：《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基于中国工商银行的压力测试研究与应用》，《金融论坛》，2016年第2期。

4.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基于央行职能的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2020年第3号。

5. IPCC WGIII,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6. IPCC WGII,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7. IEA, Net Zero by 2050,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October 2021.

8. World Bank, Country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CCDR) for China, 2022.

9. Bolton, P., Despres, M., Pereira da Silva, L. A., Samama, F. and Svartzman R., The Green Swan, BIS Books, 2020.

10. IMF, Fiscal Policies for Paris Climate Strategies: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IMF Policy Paper, 2019.

11. Simcoe, T. and Toffel, M. W., Government Green Procurement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Municipal Building Policies in Californ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4, 68 (3).

12. Krogstrup, S. and Oman, W.,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licie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MF Working Paper, 2019.

13. IPCC, Global Warming of 1.5°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witzerland, 2018.

14. TCFD, 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 –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ask Force on Climate –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2017.

15. Bank of England, Enhancing Banks’ and Insurers’ Approaches to Managing the Financial Risks from Climate Change, Supervisory Statement, 2019.

16. Schoenmaker D., Van Tilburg, R. and Wijffels H., What Role for Financial Supervisors in Addressing Systemic Environmental Risks? DSF Policy Paper, April 2015.

17. Batten, S., Sowerbutts, R. and Tanaka, M., Climate change: Macroeconomic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Book Chapter in: Ecological, Societal, and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the Financial Sector, Bank of England, 2020.

18. NGFS, Guide to Climate Scenario Analysis for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2020a.

19. Harvey, H., The Case for Climate Pragmatism, Foreign Affairs, 2020, 99 (4).

20. Piemonte, C., Cattaneo, O., Morris, R., Pincet A. and Poensgen K., Transition Finance: Introducing a New Concept, OECD Development Co – operation Working Papers, 2019.

21. Campiglio, E., Dafermos Y., Monnin P., Ryan – Collins, J., Schotten, G., and Tanaka, M.,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for Central Banks and Financial Regulators,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8, 8 (6).

22. NGFS., NGFS Climate Scenarios for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2020b.

责任编辑：郭霞

我国服务业开放对接 CPTPP 规则研究

——以教育、文化和医疗服务业为例*

谢兰兰 张玉静 杨 娜

摘要：2021 年 9 月我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CPTPP 对各缔约方设置了高标准的服务业开放规则，对我国服务业开放提出新挑战。本文以教育、文化和医疗三个服务业部门为切入点，逐一对标我国开放水平与 CPTPP 规则差距，探讨对接 CPTPP 规则，推动教育、文化和医疗服务业开放的举措。教育服务业的差距是市场准入限制高、学历学位互认障碍和对境外消费外汇管制，对接举措包括进一步取消准入限制、扩大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畅通跨境远程教育合作渠道等。文化服务业差距主要是禁止部门数量多、进入门槛高、进口审查审批严格。对接举措是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采取分类有限扩大准入的方式，逐步推进开放进程。医疗服务业差距主要是准入门槛高、非国民待遇和自然人移动限制。对接举措包括放开独资准入限制，推动跨境远程诊疗便利化，提高外资医疗机构国民待遇水平，推动学历学位、医师执业资格及医疗检验检测检测结果国际互认等。

关键词：CPTPP 服务贸易 教育服务业 医疗服务业 文化服务业

作者简介：谢兰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张玉静，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 娜，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1 年 9 月，我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我国全面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深化国内改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客观来看，目前我国在很多领域与 CPTPP 规则要求仍有分歧和差距，服务业是 CPTPP 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我国与 CPTPP 规则分歧较大的领域。2021 年 12 月 2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在 27 条特别管理措施中，22 条涉及服务业。此外，在跨境支付、自然人移动等服务业领域亦存诸多限制。分析和弥合差距，继续推动服务业自主开放可以为未来我国加入 CPTPP 谈判顺利进行创造更大空间和更灵活的余地。

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 CPTPP 问题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我国加入 CPTPP 的影响、利弊研判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智慧医疗可及性的框架构建、指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21CGL047）阶段性研究成果。

以及策略推演等宏观层面。具体到服务业领域,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不多。全毅(2021)从 CPTPP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两个区域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规则差异的视角展开研究,着重分析两个协定金融服务与电信服务法规差别。王思语、张开翼(2021)从最惠国待遇及过渡清单范围、贸易政策透明度及争端解决、数据流动自由度以及政府参与四个方面辨析了 CPTPP 与 RCEP 服务贸易相关规则的差异,并从政策制定及监管透明度、争端解决机制、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度、服务业行业市场化等方面提出加大中国服务业开放的路径。张娟等(2021)基于我国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与 RCEP、CPTPP 的差距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从推进法律体系改革、加大自贸区服务贸易开放压力测试、做好开放的风险防控三个方面提出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升级的建议。张磊、徐琳(2020)从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治理角度对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美墨加协定”(USMCA)和 CPTPP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进行比较研究,重点分析了上述三个协定在一般性纪律框架调整、国际监管合作规范和具体领域国内规制纪律拓展的演进情况。杨荣珍、陈雨(2021)分类总结了 CPTPP 成员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特征,结合我国负面清单实践,认为我国应加快转变跨境服务贸易管理思路、熟练运用两类负面清单的服务贸易管理模式以及科学设计负面清单领域。

现有文献对 CPTPP 中一些热点服务贸易部门议题也有零散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电信和数字贸易等领域。例如,李旻(2019)关于 CPTPP 金融规则先进性的研究,张方波(2020)就我国金融业开放与 CPTPP 差距的对标研究,方瑞安(2019)关于 CPTPP 电信规则对中国挑战的研究,李墨丝(2020)、陈颖(2021)、董静然(2020)等关于 CPTPP 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等。关于教育、文化、医疗等具体领域对接 CPTPP 规则的研究仍处于空白。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比照历年我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各部门的开放进度,选择教育、文化、医疗三个开放进展较小的部门展开研究和分析。从 CPTPP 服务贸易规则的核心内容入手,详细剖析我国教育、文化、医疗三个服务业部门开放现状以及与 CPTPP 规则的差距,并立足客观现实探讨未来进一步开放的举措。

二、CPTPP 关于服务贸易规则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征

CPTPP 文本中并未设置服务贸易专章,相关条款分布于不同章节。第 10 章的跨境服务贸易条款一揽子适用于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三种服务贸易形式,^①同时,第 10.5 条(市场准入)、第 10.8 条(国内规制)和第 10.11 条(透明度)也适用于一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影响其领土内通过涵盖投资提供服务的措施。按照第 9.2 条(范围)的界定,第 9 章的投资条款适用于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贸易。概括起来,CPTPP 中关于服务贸易的核心规则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规则和边境内规则。

(一) 市场准入规则主要特征

CPTPP 对缔约方服务提供者的准入规则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要求普遍取消对一缔约方服务提供者进入另一缔约方市场的服务提供数量和提供形式限制。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业务总数、产出总量、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人数。就当地存在形式的服务贸易,还规定不得要求服务提供者以设立代表处、企业形式或成为居民作为跨境提供服务的条件,赋予跨境服务提供者完全市场准入自由。

二是要求取消对商业存在所有权、高管和董事会成员的限制。具体规定包括:不得限制或要求服

^①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称跨境服务贸易即指这三类服务贸易形式。

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法律实体提供服务，且不得要求外资企业高管国籍。同时在刚性规则中加入一定弹性，允许在不实质损害投资者对投资控制能力的前提下，企业董事会或其他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可具有特定国籍，给予缔约方适度自由量裁权，以调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成员的利益诉求。这意味着缔约方应最大限度取消对外资在所有权、股本和分支机构扩张、人员安排等方面的限制，赋予外资自由进入市场和安排企业经营方式的权利。

三是完全以负面清单方式列示不符措施和保留权利。一般我国加入的多边贸易条约都是以正面清单形式对服务贸易领域开放进行具体减让承诺，2020 年加入 RCEP 也以实行 6 年正面清单后转为负面清单作为过渡。CPTPP 要求缔约方以完全负面清单方式对相关部门开放作出具体承诺。各缔约方必须在负面清单和保留权利等承诺的基础上全盘接受规则，对来自 CPTPP 缔约方服务供应商完全开放市场。CPTPP 承诺开放水平极大增加，是目前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程度最高的多边协定。

（二）边境内规则主要特征

与准入规则相比，CPTPP 更加强调边境内规则，通过缔约方国内政策的配合和协调延伸，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为基准，为其他缔约方服务提供者和投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稳定发展的预期。CPTPP 关于跨境服务贸易的边境内规则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覆盖面广。从数量上看，CPTPP 关于跨境服务贸易的边境内措施显著多于准入措施，涉及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国内规制、承认、透明度及支付和转移等内容。要求缔约方对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的资格要求和程序、技术标准、许可要求和程序实施，保证合理、客观和公正；对服务提供者的学历、经历和职业资格等予以承认；保证国内措施的透明度；与服务贸易相关的资金款项自由转移和支付，例如时间上不可延迟，以现行市场汇率结算等。还进一步规定在跨境贸易中允许国民自由选择金融服务提供者。关于商业存在的规则主要涉及投资便利化和投资保护条款。包括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安全、公平和自由环境的最低标准待遇条款、武装冲突和内乱下的待遇条款、征用和补偿条款、转移条款、代位条款、为缔约方政府制定政策留出空间的特殊程序和程序要求条款、投资和环境、健康和其他管制目的条款以及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等。不难看出，CPTPP 为缔约方设置的边境内纪律不仅涵盖经济因素，还包括众多非经济因素。缔约方不仅受到贸易规则的约束，还受到法律法规、生态环境、商业模式等多方面的约束。

二是规则措施的可操作性强。与其他贸易协定对规则措施仅做原则性约束不同，CPTPP 的措施体现了更强的可操作性。以国内规则为例，对缔约方主管部门提出包括审理期限、受理时间表、及时传达拒绝理由、公开申请状态、提供修正申请的机会、以文件副本代替正本等 6 条具体要求。同时在许可资格考试安排间隔、评估缔约方专业人员能力的程序、教育或经历互认、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均有详细规定。有关投资争端解决的规则多达 13 条，涵盖了从磋商到文件送达所有操作性细节。

三是保证开放程度“只进不退”。CPTPP 在相关条款中约束了缔约方滥用负面清单的行为。要求缔约方的不符措施在未来不得收紧，只能对其修订，使其更加宽松，即遵循棘轮机制，以保证各缔约方的开放程度不会出现倒退。这一规则设置有利于激励缔约方更高水平的自主性开放。

三、教育服务业开放对接 CPTPP 规则

教育服务有其特殊性。目前，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服务仍是我国对外资保留开放权利的领域，除此之外，我国已经允许外商投资教育机构进入并可持有多数股权，但不承诺国民待遇。

（一）教育服务业开放与 CPTPP 规则对标

与 CPTPP 规则相比，我国教育服务业差距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学历学位互认和对境外消费外汇管制三个方面。

一是对外资举办教育机构市场准入限制程度高。通过梳理我国外资举办教育机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并与 CPTPP 相关规则相比发现，我国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外资进入教育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施加了更高的约束条件。例如，必须采取中外合作形式，并对企业分支机构扩张、办学主导权、高管国籍等方面施加限制。具体规定如下：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不得举办其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同时，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 1/2；其二，《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2015 修订）》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其三，《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规定，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限于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方主导。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对外资举办教育机构的某些政策调整与 CPTPP 的棘轮机制有所冲突。以高等教育领域为例，2003 年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① 明确表示国家鼓励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2015 以后出台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高等教育已经不属于鼓励类投资项目，被列入限制类，这一政策导向延续至今，政策预期不稳是影响外资进入教育服务领域的一大障碍。

二是学历学位互认范围有待扩大。目前，与我国进行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的国家共有 54 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与美国没有实现互认，与 CPTPP 缔约方中的日本、新加坡、智利和文莱也未实现互认。对学历型远程跨境教育不予承认。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办法》，办法中将“跨境远程国（境）外文凭证书”列入 7 种不予认证学历学位的情况之一。这意味着通过跨境远程教育方式获得的国（境）外证书，目前在我国无法进行教育资格互认，无法在国内作为接受下一阶段教育的有效证明，国内就业市场上也不被认可。在此领域我国尚未签署任何国际公约和政府间双边协定，迄今也未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处于法律空白阶段。

三是对境外消费资金转移实施严格限制。CPTPP 规则要求缔约方允许与跨境服务提供相关的转移和支付无迟延、自由进出，这与我国目前对跨境资金流动实行的外汇管制措施存在不相适应之处。2017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实施《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称为《管理办法》），从换汇目的、换汇人员关系、换汇和转款环节金额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和控制。《管理办法》规定，将大额现金交易的人民币报告标准由 20 万元下调至 5 万元。金融机构对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5 万元及以上、外币等值 1 万美元及以上的各种现金收支，应报送大额交易报告，且逐笔调查购汇用途。中国居民每人每年外汇额度为 5 万美元。如果留学学费或生活费超过 5 万美元，需提供境外学校录取书、相应年度或学期的学费或生活费证明等文件。

（二）教育服务业开放对接 CPTPP 规则的举措

国内优质教育资源供需失衡严重，远远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服务的需求。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是调剂国内教育市场，提升国内整体教育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对标 CPTPP 规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提升教育开放水平。

一是进一步取消外资举办教育机构的准入限制。外资对提高我国教育水平助益很大。以“双一

^①该条例于 2013 年进行修订。

流”建设高校为例，开设中外合作办学最多的前 5 个学科分别是：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和医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一批高素质国际化创造性人才。^①同时，国内对国际教育需求旺盛。2019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 70 万人，同期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招生约 15 万人，放开市场准入将会引导部分需求回流，并进一步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这也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

从各国实践看，在 CPTPP 各缔约方的不符措施与权利保留条款中，对教育领域外资准入有完全禁止和完全准入两类，已经获得准入的领域基本不再对企业类型、具体经营管理活动进行限制，我国可参照放开。对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义务教育和宗教教育作为保留领域禁止外资进入，其他领域逐步完全放开。路径上可以先从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等开放平台开始，按照承压能力分三步走，为我国加入 CPTPP 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第一步，放开港资和澳资在大湾区内地办学自主权。第二步，允许外商独资举办非学历型教育机构并允许经营状况良好的外资教育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第三步，参照民办学校相关规定放开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领域。在分阶段放开准入的同时必须保证政策实施细则细致周全，尽量避免政策反复增加改革试验成本。需要关注的是学前和普通高中教育。学前和普通高中教育并未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范围，这两个领域对外资的开放规则与高等教育相同。基础教育对国家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这两个领域的对外开放应秉持谨慎和适度原则，严格执行对机构设立和项目审批制，并将课程体系和外籍教师作为监管重点。

二是扩大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畅通与国外先进教育国家的跨境远程教育合作渠道。继续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特别是加强与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欧盟部分未互认国家间的合作。跨境远程教育是国际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在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尚存较大差距，在多边协定中未作承诺。应积极参与跨境远程教育的国际和地区合作，在资格标准与认证条件上与国际接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填补我国跨境远程教育在质量保障、监管、学历认证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空白。

四、文化服务业开放对接 CPTPP 规则

文化服务范围较广，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和文化艺术等领域。由于涉及到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等核心敏感问题，我国对此领域开放十分谨慎，无论从已做的减让承诺还是国内开放进展看，都是我国开放程度最低的服务业领域之一。

（一）文化服务业开放与 CPTPP 规则对标

从国内实践看，我国对文化服务领域采取了逐步有限度开放的方式，对外资市场准入和国内规制把控十分严格。与 CPTPP 规则的主要差距有禁止准入、股比限制、国内规制等方面。

一是禁止领域多。由于涉及国家文化安全，我国一直高度限制文化服务业外资准入。其中，内容及提供载体是准入限制的重点领域。以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为例，禁止投资的领域包括 7 条，是所有 11 类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行业和部门中限制项目数最多的。包括外资投资新闻机构，出版物内容编辑、出版和制作业务，各类广播电视媒体、对境外卫星频道落地实行审批制度，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含引进业务）公司，电影

^①任蕾、田静：《“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数据调查报告》，中国教育在线，2020 年 7 月 14 日，https://www.eol.cn/e_coop/gol/html/report2020/content.shtml。

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以及电影引进业务，文物拍卖公司、文物商店和国有文物博物馆。

二是对已放开领域保留严格准入门槛。在电影院服务等已对外资放开领域仍然设置了不同的准入门槛。《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2015 年修订）规定外商投资电影院服务准入条件为：仅限合资合作，中方投资比例不低于 51%；全国试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南京）外方投资比例不超过 75%；合资、合作期限不超过 30 年。

三是对涉外文化服务业务进口审查审批严格。国内规制方面，在我国目前保留的 500 项行政审批事项中，涉及文化服务贸易类共 16 项。^① 包括内容审查、业务审查和机构审批等内容，且绝大部分审查审批权限不下放，实施单位为国家主管部门。内容审查，如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内容审查、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含互联网游戏作品）等。业务审查，如美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进口电子出版物制成品、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信息的服务业务等。机构审批，如境外电影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境外广播电视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境外新闻出版机构在境内设立办事机构等（见表 1）。

表 1 我国保留的涉外文化服务业务审批事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1	互联网文化单位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内容审查	文化和旅游部
2	美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审批	文化和旅游部
3	境外电影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审批	国家电影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4	境外广播电视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审批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5	影视节目制作机构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审批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6	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7	新闻出版中外合作项目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8	著作权涉外机构、国（境）外著作权认证机关、外国和国际著作权组织在华设立代表机构审批	国家版权局
9	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接受境外委托制作电子出版物审批	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10	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含互联网游戏作品）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11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与境外机构合作出版电子出版物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12	电子出版物进口单位进口电子出版物制成品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13	境外新闻出版机构在境内设立办事机构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	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审批	国务院港澳办
15	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信息的服务业务审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6	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提供新闻的服务业务审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资料来源：《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 第 412 号，2016 年修订版）。

注：由于国务院机构调整，实施单位名称有所变动。

（二）文化服务业开放对接 CPTPP 规则的举措

我国文化服务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做法自由开放。同时文化关系到国家安全，在某些关键和敏感领域仍需要适度保护。由于开放度低，准入限制多，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低，我国文化服务领域对接 CPTPP 规则难点较突出。在 CPTPP 规则框架下，参照其他缔约方做法，可采取例外加有限准入的做法，即守住开放底线，采取分类有限扩大准入的方式，逐步推进文化

^①2021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 年）》，将原“境外广播电影电视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审批”调整为“境外电影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审批”和“境外广播电视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审批”2 项。

服务领域开放。对已经开放领域则应通过改革和完善国内规制，进一步对接 CPTPP 的边境内规则，提高开放质量。

一是率先放开敏感度较低且已有开放基础和条件的领域。我国在加入 GATS 和 RCEP 时对视听服务和电影院服务已经做出开放承诺，经过多年探索和压力测试，这些领域已经具备扩大开放的条件。应放开视听服务的业务范围、电影院外资股比等准入门槛。同时利用好自贸区、自贸港、服务贸易创新试点等各类开放平台，继续以压力测试和风险测验等形式放开电影、电视节目、出版物等内容提供的限制领域，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尽快将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平台经验向全国普推。

二是以审慎监管代替准入要求。互联网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融合，模糊了许多行业界限，通过市场准入限制互联网相关行业进入国内市场已经滞后于实践发展。以互联网视听为例，目前国内的规定是，不允许外资公司直接向国内市场提供视听内容，但可以交由其他国内合作企业投放。这实质上相当于放开了外资互联网视听内容提供，已经不再是准入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完善国内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达到合规经营的问题。建议对这类行业可从中方主导开始逐步放开准入限制，并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三是守住文化开放底线。设置红线和底线，做好风险评估，保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核心利益。参照 CPTPP 缔约方做法，对暂时不宜放开的敏感领域，做出权利保留安排。可对不同领域采取动态分类分级限制方式，实行禁止进入、限制市场主体资质、股比、经营范围、经营业态、商业模式、空间布局等管理措施。

五、医疗服务业开放对接 CPTPP 规则

相对其他服务业部门，我国医疗服务开放时间早，自 1989 年就开始试办中外合资和合作医疗机构，但国内政策调整频繁，国内规制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针对外资企业的经营约束。

（一）医疗服务业开放与 CPTPP 规则对标

与 CPTPP 规则相比，我国对医疗服务的限制主要集中于商业存在（外资医疗服务机构）和自然人移动（外籍医疗技术人员）两种方式。

一是外资医疗机构准入门槛高。首先是数量限制。按照多边协定承诺，我国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与中国合作伙伴设立合资医院或诊所，但设有数量限制，允许外资持有多数股权（不高于 70%）。《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外资医疗机构不能设置分支机构。目前，我国仍然要求合资医院和诊所的大多数医生和医务人员具有中国国籍。以 RCEP 为例，我国在服务业开放承诺中规定：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医院和诊所的大多数医师和医务人员应当具有中国国籍。其次是试点独资医疗机构政策反复调整。我国对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政策几经变动，反复调整，经历了禁止、部分放开到重新设限的过程。2010 年以前，明文禁止设立外资独资医疗机构，只允许合资、合作，且外方股比不高于 70%。2010—2014 年政策有所松动，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允许在我国境内试点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范围从上海自贸区扩大至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 7 省市，但从实践看，只允许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2015 年后国家对外资独资医疗机构的政策方向逐渐发生变化。在先后两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列入“限制类”，仅允许合资合作两

种方式，上海自贸区试点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相关政策也被中止，这一政策导向一直延续至今。

二是国内规制阻滞外资医疗机构业务拓展。受国内规制所限，外资医疗机构在医疗系统中身份较为特殊，导致了事实上的“非国民待遇”。首先，外资医院被排除在医院评级体系外，医师缺少为社会认可的晋级通道。其次，限制外资医院外籍医生和医务人员比例，要求合资医院和诊所的大多数医生及医务人员应具有中国国籍。而现行制度将医师职称、课题招标、各类资格认定等与公立医院捆绑，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细则不明确，客观上限制了国内医疗人员流动，人才特别是技术人员缺乏，对外资医疗机构业务拓展制约性极大。最后，外资医疗机构未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外资医疗机构进入我国市场以来主要目标消费群体是本土高端人群和外籍来华人员，自然被排除在以保基本、保民生为根本目标的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之外。随着国家对外资医疗机构诊疗价格的规范以及国民医疗消费需求的变化，外资医疗机构具有强烈对接本土市场的业务拓展需求。

三是医学学历学位和执业资格互认制约自然人移动。CPTPP 第 10.9 条规定缔约方之间可以通过签署协定或安排的方式互相承认服务提供者的教育和工作经验、许可证或职业认证。从国内实践看，目前我国临床医学教育标准已经通过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认定，实现了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学位互认，中医、护理、口腔等大部分领域则仍然空白。在外籍医师执业方面，我国在 GATS 和 RCEP 中仅对外国医师短期行医做了承诺。允许持有本国颁发的专业证书的外国医师获得主管部门许可后，在我国提供短期医疗服务，服务期限为 6 个月，并可延长至 1 年。我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自主开放。2016 年 1 月，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 8 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将外国医疗团体来华短期行医的审批权由省级下放至设区的市级。2020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的定义和范围、申请和审核、执业规则、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内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对外国医师来华临床学术交流、短期行医和长期行医分别设定了不同的准入要求。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实行执业注册制，长期行医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进行准入和注册执业，并需参加医师定期考核。同时，国内医疗执业资格和标准体系与 CPTPP 缔约方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实行直接资格认证方面。这意味着在医疗服务领域仍有较大互认难度和较高的转换成本。

（二）医疗服务业开放对接 CPTPP 规则的举措

根据我国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开放进展，该领域对接 CPTPP 规则应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两方面着手。

一是放开独资准入限制。准许外资设立独资医疗机构是开放医疗服务市场的关键环节。从 CPTPP 缔约方的普遍做法看，对外资准营领域一般不再施加股比、数量等限制。2020 年底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我国承诺解除对欧盟投资者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等主要城市设立独资医疗机构的限制，这为加入 CPTPP 放开独资医疗机构准入提供了重要标尺。由于外资医疗机构经营完全依照市场化运作，可以参照内资民营医疗机构的规范和监管方式，放松事前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从加强对医疗服务部门开放的立法着手完善相关国内规制。

二是推动跨境远程诊疗便利化。跨境远程诊疗是利用全球优质医疗资源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国内规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应尽快构建跨境远程医疗支撑与运营体系，完善远程诊疗系统。在风险可控可防前提下，扩展跨境远程医疗的范围和类别。简化外国医师远程诊疗制度，探索外国医师参与远程诊疗的审批模式从注册制向临床交流备案制转变。

三是提高外资医疗机构的国民待遇水平。首先，简化外资医疗机构在投资审批和设备购置方面的

程序,减少大型医疗设备采购限制,试点大型医疗设备采购由前置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其次,放开对外资医院开设分支机构的限制,为外资医疗机构在人员和资源共享、集约化管理方面创造条件。再次,赋予外资医院在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科研立项等方面与内资医院相同的待遇。最后,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探索外资医疗机构部分业务对接本地医保,有效缓解公立医院的诊疗压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并为医疗体制改革积累经验。

四是推动医学学历学位、医师执业资格及医疗检验检测结果国际互认。从国际惯例看,学历学位和检验检测结果互认难度相对较低,可以先从这两方面着手,推动与各缔约国医学学历学位及医学检验检测结果互认,特别是与发达国家间互认,以推动行业标准国际化。医师执业资格互认一直是国际性难题,体现了各国对医疗服务提供的谨慎态度。对此,可采取更灵活的方式予以解决,如简化双方医师在对方国家执业认证的流程、缩短认证时间等。

参考文献:

1. 全毅:《CPTPP 与 RCEP 服务贸易规则比较及中国服务业开放策略》,《世界经济研究》,2021 年第 12 期。
2. 王思语、张开翼:《RCEP 与 CPTPP 协定下中国服务业开放路径研究》,《亚太经济》,2021 年第 6 期。
3. 张娟、李俊、李计广:《从 RCEP、自贸试验区到 CPTPP: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升级路径与建议》,《国际贸易》,2021 年第 8 期。
4. 张磊、徐琳:《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 USMCA 对 CPTPP 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2020 年第 7 期。
5. 杨荣珍、陈雨:《CPTPP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比较与借鉴》,《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 年第 12 期。
6. 李旻:《后 WTO 时代 CPTPP 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先进性研究》,《新金融》,2019 年第 6 期。
7. 张方波:《CPTPP 金融服务条款文本与中国金融开放策略》,《亚太经济》,2020 年第 5 期。
8. 方瑞安:《CPTPP 电信服务贸易规则对中国的挑战》,《对外经贸实务》,2019 年第 10 期。
9. 李墨丝:《CPTPP+数字贸易规则、影响及对策》,《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12 期。
10. 陈颖:《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研究——基于 CPTPP、EU-JAPAN EPA、USMCA 和 RCEP 的比较分析》,《全球化》,2021 年第 6 期。
11. 董静然:《数字贸易的国际法规制探究——以 CPTPP 为中心的分析》,《对外经贸实务》,2020 年第 5 期。
12.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 CPTPP 课题组:《加入 CPTPP,中国需要做什么》,《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 年第 5 期。
13. 苏庆义:《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CPTPP?》,《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4 期。
14. 张慧智、汪君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加入 CPTPP 的政治经济思考》,《东北亚论坛》,2021 年第 3 期。
15. 陈晓倩:《中国加入 CPTPP 的挑战与策略》,《中国外资》,2021 年 11 月(上)第 21 期。
16. 霍建国:《中国加入 CPTPP,困难与机遇并存》,《环球时报》,2021 年 11 月 18 日。
17. 张司晨:《新形势下 CPTPP 的影响、前景以及中国的选择》,《东北亚经济研究》,2021 年第 2 期。
18. 周汉民、黄骅:《中国加入 CPTPP 之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
19. 王跃生、边恩民、张羽飞:《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三次浪潮及其演进逻辑——兼论 RCEP、CECAI、CPTPP 的特征和影响》,《改革》,2021 年第 5 期。
20. 李春顶、平一帆、张杰皓:《中国应对 CPTPP 协定经济影响的政策选择及效果》,《财经研究》,2021 年第 4 期。
21. 东艳、张琳:《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的收益辨析》,《中国外汇》,2021 年第 3—4 期。
22. 苏庆义、王睿雅:《中国加入 CPTPP:一个统一框架的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郭霞

· 宏观经济 ·

多措并举 系统施策 不断强化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魏琪嘉

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减，国际经贸关系博弈日趋复杂，这些都深刻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大调整、大重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保产业链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破题的关键。本文在总结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保产业链供应链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举措。总的来看，我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条件、有优势、有潜力，但同时也存在不稳定、不强大、不安全问题。未来要坚持系统施策，统筹发展和安全，将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夯实产业链、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产业链配套，巩固制造业传统优势，进而塑造中国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产业链 供应链 产业安全 制造业

作者简介：魏琪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室主任、研究员。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反复，国际地缘冲突不断，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极大冲击，全球产业链体系加速演变，进入变革重构期。从国内看，我国要素条件已经发生显著改变，与之相适应的产业发展环境也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国际国内环境的叠加演变，使得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金碚，2021）。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产业链稳定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着力破解影响产业链稳定的突出难题。

一、我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条件、有优势、有潜力

（一）我国拥有极具韧性的产业链体系

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拥有最完整最大规模工业体系的国家。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并形成行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条最长的工业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1.4万亿元，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27.4%，占全球的比重超过30%，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大国。^①其中，在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220 余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②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体系正在不断升级。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地位持续快速攀升（宋华、杨雨东，2022），部分领域已经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是亚太地区供应链枢纽，成为与美国、德国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中间品贸易中心之一。根据 2019 年麦肯锡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我国已经成为全球 65 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国和 33 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加之近年来的产业迭代升级创新，我国不仅在传统产业领域优势尽显，而且在集成电路、高铁、5G、新能源、医疗设备、新能源汽车、量子计算机、智能电网等高技术领域崭露头角。创新水平持续提升，自主品牌不断涌现，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在 5G、高铁等一些关键战略性技术领域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完备的产业体系叠加不断升级的产业链集群网络，使得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具有极强的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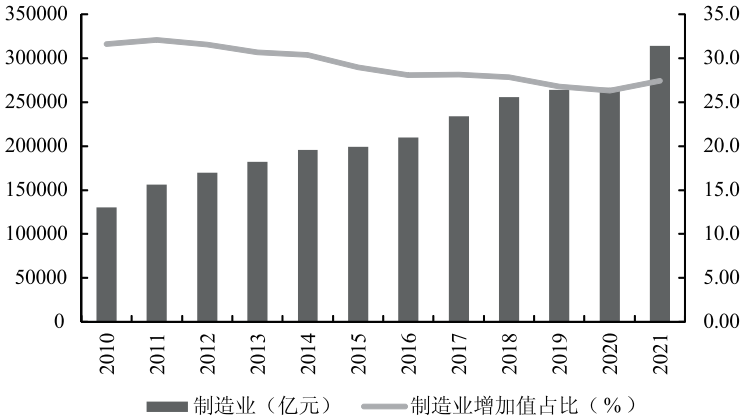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21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其占 GDP 的比重

数据来源：万得（Wind）。

表 1 2012 年和 2021 年我国科技研发人才变化情况

年度与增长率	指标	研发人员总量	每万名就业人员中 研发人员数量
2012 年		331 万人年	42.6 人年
2021 年		562 万人年	75.3 人年
增长率 (%)		70	76.8

数据来源：科技部。

（二）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及人才池

庞大的劳动力及人才池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前提。一方面，我国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劳动力大军。截至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 8.8 亿人，高居世界第一位，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8.8 岁，平均劳动力成本总体低于国际水平。^③总的来看，我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短期内不会完全消失，一支有纪律、有组织、肯吃苦、肯耐劳的现代优秀产业工人队伍依然是我国稳定供应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庞大的人才库且“人才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庞大的高素质技术工人队伍和工程师人才队伍。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提高至 9.91 年，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到 2.2 亿，每 10 万人中就有 15467 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④其中，一支有技术、有知识且规模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2021 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②佚名：《工信部：中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央视网，2017 年 2 月 17 日，<https://news.cctv.com/2017/02/17/ARTIrkyoHMyzN6V5aUTSFDZB170217.shtml>。
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④数据来源：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位，达到 562 万人年，较 2012 年增长 70%，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达到 75.3 人年，较 2012 年增长 76.8%。^① 另外，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总计拥有 1.12 万所各类职业学校，每年培养 1000 万左右的高技能人才，截至 2020 年，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达到 3588 万人。^② 总的来看，我国不仅拥有数量可观的劳动力大军，而且初步建立了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三）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

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是我国保障供应链稳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底气所在。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超大消费市场。国内市场的大小对提升国家产业链竞争优势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强大的国内需求不仅能够促进生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而且对构筑产业链集群，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很强的驱动作用。目前，我国拥有 1.3 亿户市

场主体、14 亿人口以及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③ 其背后蕴含着广阔的市场需求。2021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4.1 万亿元，经汇率折算约为 6.83 万亿美元，^④ 仅次于美国的 7.41 万亿美元，^⑤ 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国内市场仍在蓬勃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为消费需求升级扩容奠定了良好基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0 年的 19109.44 元增至 2021 年的 47412 元，增长了 1.48 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则由 2010 年的 13471.45 元增至 2021 年的 30307 元，增长了 1.25 倍。^⑥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新的消费需求将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比如，2021 年我国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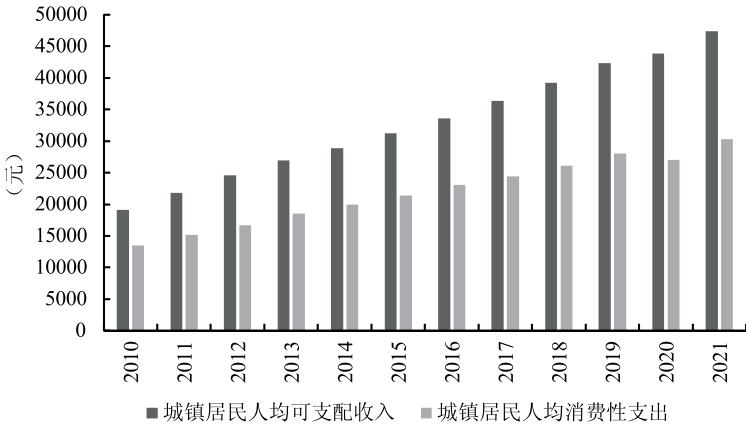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2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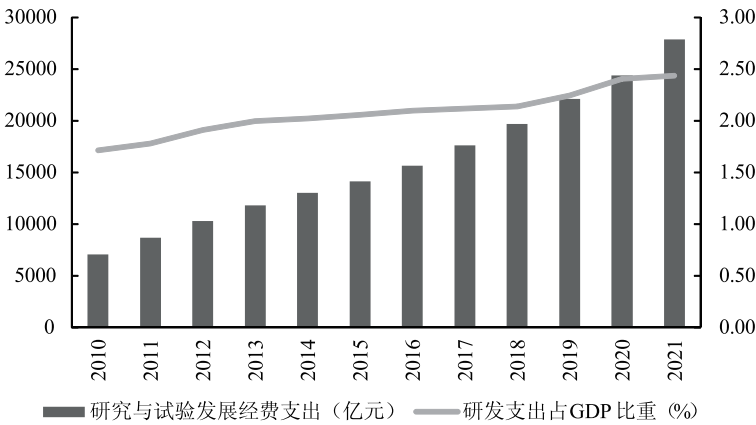


图 3 2010—2021 年我国研发支出及其占 GDP 比重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①数据来源：科技部。

②数据来源：教育部。

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④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⑤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⑥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人汽车保有量为 208 辆,^① 发达国家千人汽车保有量为 500 辆左右,^② 我国汽车消费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总之,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保障供应链稳定、提升产业链水平的制胜法宝。

（四）我国拥有日益增强的创新发展动力

创新发展是保障供应链稳定、提升产业链水平的根本动力。一方面, 我国产业链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张其仔, 2022)。近年来, 我国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强化科技投入。2021 年, 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 27864 亿元, 占 GDP 的比重为 2.44%, 分别较 2010 年增长 2.95 倍、提升 0.72 个百分点。^③ 研发经费的持续快速增长对我国产业创新升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一些重大技术创新领域, 我国正在实现由跟跑为主向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转变, 这为我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保障产业链安全奠定扎实基础。另一方面, 我国创新政策机制日臻完善。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 推动产业链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也在持续完善。近年来, 我国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战略目标, 推动实施“揭榜挂帅”“挂图作战”机制, 充分发挥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 加大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制造业创新中心布局, 提高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力度, 加快产业集群创新发展速度, 促进产业及创新能力从点的突破向面的提升、从量的累积向质的飞跃转变, 有力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政策机制的发展使得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这些优势条件都是我们保持产业链稳定的底气和定力所在。

二、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不稳定、不强大、不安全问题

目前, 我国保持产业链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仍然任重而道远, 难题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不稳定、不强大、不安全。

（一）产业链不稳定

产业链不稳定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部分传统行业特别是生产加工环节出现向海外转移的苗头。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 制造业成本刚性上涨。以劳动力成本为例,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呈现快速上涨趋势, 截至 2021 年, 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06837 元,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2884 元,^④ 明显高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受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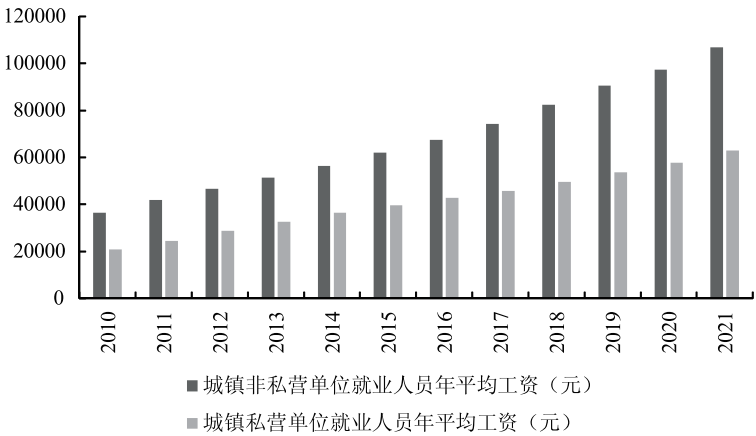


图 4 2010—2021 年我国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

数据来源: Wind。

①数据来源: 工信部。
②数据来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③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④数据来源: 同③。

影响，近年来部分制造业传统优势行业正在加快向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以寻找“价值洼地”。加之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一些跨国公司为了实现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因供应链过于集中而产生的风险，也在主动谋求建立供应链备份系统，进一步影响了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刘佳骏，2022）。此外，许多传统产业的产业链环节环保技术改造投入不足，对生态环境污染较大，随着环保约束不断强化，一些原本稳定的产业链也面临着较大压力和挑战（宋玉洁、乔翠霞，2022）。

（二）产业链不强大

产业链不强大突出表现在产业链整体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经济体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即单位出口产品中主要的“增值环节”（如“微笑曲线”两端的设计、研发、物流和销售环节）主要集中在国内，在国外的增值部分（如加工、组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产业环节）所占比重较小。我国制造业产品增值分布规律恰好与这个特征相反。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控制能力相对较弱，我国产业链整体水平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工程院《2015年度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4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 21.48%，与美国的 36.67%、日本的 36.07%、德国的 38.76% 比较，差距非常大，而且自 2002 年开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① 模型测算结果也显示，就连近些年发展速度较快的电器、机械装备等行业，其全球价值链（GVC）下游度指数也一般处在大于 1 的状态，^② 说明这些行业整体上仍然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

（三）产业链不安全

产业链不安全突出表现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风险明显上升（张杰、陈容，2022）。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虽有长足进步，但总体上依旧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的研究，2021 年我国 291 个城市的科技创新竞争力指数均值为 0.23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美国的 0.571、欧盟的 0.552。^③ 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凭借生产

表 2 我国在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对外依赖度

具体领域	对外依赖度
芯片	80%
光刻胶	约 70%
高精度透射电子显微镜	接近 100%
核心工业软件	80%
触觉传感器	95%
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	80%
高档数控系统	95%
高档液压件	接近 100%

数据来源：作者综合多家权威媒体报道整理而得。

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大分工，形成优势互补、国际化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我国实施产品“断供”、科技“脱钩”等威胁、讹诈，加之我国研发基础薄弱、共性技术研究缺位等问题，一些重点行业研发创新受制于人，我国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大幅度上升（程都，2021）。根据中国工程院的研究，我国产业发展必需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很多都依赖进

①数据来源：《2015 年中国制造业强国发展指数报告》。
②作者根据全球价值链模型计算而得。
③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口，其对外依存度高达 50% 以上（杨威等，2021）。^① 其中，95% 的高档数控系统、80% 的芯片以及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芯片设计软件 EDA 都依靠进口。一旦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出口管制，必将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三、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总体思路

保产业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应把大力振兴和发展制造业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导向，准确把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保持产业内部合理的比例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没有制造业基本盘的稳定就没有产业链的稳定（黄泰岩、片飞，2022）。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半程，服务业比重上升，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制造业基本盘发生了松动，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长时间呈现下降趋势，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位徘徊，制造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对优质要素吸引力下降。因此，要保产业链稳定，首先就要把制造业的基本盘稳住。在尚未完成工业化之时，如果制造业比重持续、过快下降，且这种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无疑将会加大产业安全风险，一旦外部环境发生风吹草动，整个国内经济系统抗风险能力将十分脆弱。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在更高层面、更大行动上进一步重视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从具体思路上看，主要体现为“树导向”和“定比例”。

（一）“树导向”，将大力振兴和发展制造业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导向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制造业如果缺位，就无法带动经济顺畅循环。产业过度服务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前车之鉴，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胜枚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关键发展阶段，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只有长期重视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把产业体系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才能确保经济安全。从价值链角度来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企业组织优势、产业技术优势、国际话语权优势，可以在传统“微笑曲线”两端实现价值链的大循环，而我们则必须在很长时间内依靠多元渠道、多种层次来实现价值链大循环。因此，无论是我国的产业升级，还是价值链增值，制造业无疑都是其中的基础部分，传统产业也必将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绝不意味着抛弃传统行业另起炉灶。

同时，制造业事关民生，与人民的衣食住行密不可分，更是吸纳就业的关键力量。我国是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具有特殊国情的大国，统筹发展和安全，任何与民生相关的供给必须首先做到国内生产体系能够保证基本供应，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供给风险和价格风险（魏际刚，2022）。2020 年抗击新冠疫情，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克服不利条件影响，及时生产出足够的防疫用品，为率先遏制疫情在国内蔓延，顺利推进复工复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成功彰显了制度优势，而这一优势的背后则是党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奋斗积累形成的强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完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①数据来源：中国工程院。

（二）“定比例”，处理好制造业内部的若干比例关系

一方面，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将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保持在合理区间是紧迫的、必要的、必然的（黄群慧、杨虎涛，2022）。之所以说是紧迫的，是因为当前已经出现了“去工业化”危险信号。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18%，比 2019 年下降了 0.62 个百分点，比 2015 年下降了 3.33 个百分点，^① 这种势头必须下大力气加以遏制。之所以说是必要的，是因为发展制造业已经成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共识。从当前各国竞争策略看，发达国家加快谋划促进“制造业回巢”，纷纷采取税收、产业、贸易政策强化本国产业的“制造”色彩。例如，德国虽然已经完成工业化，但也提出了要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目前的 23% 提高到 2030 年 25% 的战略目标。之所以说是必然的，是由我国当前已经积累的发展基础决定的。从国际来看，202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为 30% 左右，^② 位居世界第一，仍然是世界制造中心。在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中，今后这一比重虽然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只要我们保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不动摇，把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地留在国内，让生产能力有“用场”，让各类产品有“市场”，我国就仍将成为国际各类优质要素的黄金用武之地。此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也是有能力、有把握实现的。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仍保持在 25% 以上，^③ 尽管产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没有完成，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数量仍然充足，质量还在提高，通过不断优化政策、优化环境，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任务。

另一方面，在制造业内部也必须保持高中低端产业合理的比例关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不是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端化，中端产业、一般产业也不等于假冒伪劣，更不等于粗制滥造。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物质产品层面，就是要能够与多样化、多元化的需求相匹配。保持中端产业、一般产业的合理规模，从供给侧看是满足不同素质劳动力的就业需要，从需求侧看则是满足不同消费群体消费需求的需要。

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举措

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围绕巩固产业链、补齐产业链、优化产业链、强化产业链，抓紧补齐短板，分类施策、精准施策，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确保产业链稳定安全。

（一）坚持机制稳链，保持传统产业链韧性

一是持续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负担。进一步降低用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原材料成本和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将阶段性优惠与构建长效机制相结合，同时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把产业链供应链的主干环节留在国内。二是强化对生产制造业企业环保技改的支持力度。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既定目标，加大对制造业企业节能低碳发展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技改资金使用上，要统筹用好国债、地方专项债和政府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把鼓励企业开展环保技改与开展研发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增值税抵扣方面研究相关优惠政策，助力制造业绿色化发

^①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而得。

^②同^①。

^③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而得。

展。三是加快完善机制，着力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支持企业采用工业互联网、数字供应链、元宇宙等先进生产方式，有效提高工厂的智能化水平和供应链管理水平，提升供应链抵御突发事件冲击的能力。借助数字技术提升传统制造业要素生产率，丰富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围绕有效需求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二）坚持生态拓链，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

一是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备份系统建设。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原则，分门别类做好供应链战略顶层设计，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快推动进口替代在部分条件相对成熟的行业试点示范。二是发挥优质企业的重要作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支持优质企业整合创新要素和资源，培育“链主”企业。支持培育“隐形冠军”企业，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一批拥有“杀手锏”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构建强大的国际化经营和资本运作能力，持续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三是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机制。坚持“链主守正、链企出奇”原则，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在资金、信息、技术、品牌等方面的正外部效应，推动整个产业链网络的持续进化和不断升级，增强吸纳外部冲击能力，依靠产业链内生力量来维护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三）坚持主场保链，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布局

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调整区域生产力布局，进一步激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力，因地制宜解决制造业发展水平不平衡问题，拓宽我国制造业产业链稳定、安全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二是打造各具优势的区域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潜力，利用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打造各有优势的产业链集群，同时发挥产业链集群内部的集聚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更好提高产业链国际竞争力，从而赢得全球竞争。三是分类构建多圈层产业链格局。针对亟需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先期打造以国内循环为主的产业链，重点掌握关键要素、关键技术和关键环节，逐步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市场，最终达到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无缝衔接并占领全球产业链制高点的目的。对于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坚持“走出去”原则，发挥地理邻近的优势，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合理布局生产基地和生产能力，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同时积极嵌入欧盟、美国等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体系，在更多环节更多领域占据主动地位，不断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四）坚持科技兴链，着力解决“卡脖子”难题

一是夯实工业基础。聚焦产业共性技术和工业“四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制造业创新体系配套，探索建立工业研究院，集中力量联合攻关，鼓励建立合作型研究开发联合体。在重点领域稳步突破“卡脖子”环节，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探索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二是攻克一批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多措并举，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短板补齐进程。加强关键基础材料与下游产业的相互衔接，充分调动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终端用户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基础科研创新体制机制。优化科研人才管理体制，完善科研人才流动机制，加快建立结果评价和过程评价相结合、面向长期的人才评价机制，集聚大量高层次人才，充分激活创新活力。强化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提升原始创新水平，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建立健全科技领域新型举

国体制，打造科技创新战略支撑力量，完善国家科技力量的总体布局。

（五）坚持人才强链，充分激活人才红利

一是打造良性人才生态体系。搭建高技能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平台，形成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培养、实习、就业全链条的良性循环，为优化制造业工艺提供高技能职业技术人才支撑。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构建适合人才发展的宜居宜业环境，形成产业人才和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构建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人才生态体系，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支持政策，引导大量人才回流实体经济。二是加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强化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比重，逐渐缓解人才供需结构矛盾。推广柔性引才政策和“人才飞地”模式，以“周末工程师”、兼职挂职等方式加强人才的空间优化配置，建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引用机制。三是促进产业发展和人才红利的无缝衔接。围绕产业链发展强化人才链建设，有效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三链衔接”。围绕企业难点痛点问题，建立以产业园区、研发平台吸引人才的机制，提升各类人才的薪酬待遇，提供宽松环境，吸引高技能人才从事制造业。

参考文献：

1. 金碚：《以自主可控能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中国经济评论》，2021 年第 2 期。

2. 宋华、杨雨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

3. 张其仔：《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进展、新挑战、新路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4. 刘佳骏：《制造业外迁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协同关系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 期。

5. 宋玉洁、乔翠霞：《中国制造业 OFDI 的国内价值链质量效应：兼论效率与稳定性》，《世界经济研究》，2022 年第 5 期。

6. 张杰、陈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的研判与维护策略》，《改革》，2022 年第 4 期。

7. 程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经贸导刊》，2021 年 11 月（上）。

8. 杨威、郑腾飞、李红宇：《我国产业链发展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及对策建议》，《中国经贸导刊》，2021 年 12 月（下）。

9. 黄泰岩、片飞：《习近平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体系》，《经济学家》，2022 年第 5 期。

10. 魏际刚：《从战略高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学习时报》，2022 年 5 月 27 日。

11. 黄群慧、杨虎涛：《中国制造业比重“内外差”现象及其“去工业化”涵义》，《中国工业经济》，2022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郭 霞

· 区域 经济 ·

浙江特大镇发展和治理问题的 分析与思考^{*}

黄 勇 蓝蔚青

摘要：本文研究对象为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从调研情况看，当前浙江特大镇发展和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政策效应转弱、发展“被边缘化”和治理“小马拉大车”。主要表现在“地、钱、人、权”四个方面：一是要素配置与经济规模不匹配；二是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三是管理力量与人口规模不匹配；四是执法权限与管理需求不匹配。从推进共同富裕和现代化“两个先行”目标的要求高度，认为特大镇是浙江发展制造业的重要空间、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支撑。因此本文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特大镇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并建议要用改革思维去破解：一是在县域规划中进一步突出特大镇的地位；二是以盘活存量为主破解特大镇用地困局；三是进一步深化特大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四是多管齐下缓解管理人员编制紧缺；五是向特大镇进一步放权赋能。还建议争取探索建立能够适应发展和治理需要的新的特大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关键词：特大镇 城镇化 县域经济 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黄 勇，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城镇化部部长、研究员；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城镇化部特邀委员、研究员。

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对推进“以县城为主，兼顾县级市城区和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的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全面要求和系统性指导，其中特别关注了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浙江这类特大镇数量较多，而且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不是县级行政中心所在地，其发展和治理问题具有某些特殊性，需要专门研究。课题组在商请浙江省有关部门提供相关情况和基本数据的基础上，选取了 10 个镇区常住人口 20 万人左右的特大镇（见表 1）做实地调研，共召开座谈会 17 次，与县级有关部门和乡镇干部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交流探讨，并经过调研组多次集体讨论，形成此报告。

一、浙江特大镇的基本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将镇区常住人口 10 万人以上的建制镇定义为特大镇。本文研究对象

^{*} 本报告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 2022 年度研究课题。课题组成员有：张鸿铭、黄勇、蓝蔚青、鲁善增、陈寿灿、陈寿镛、徐明华、何文炯、王东祥等。由黄勇、蓝蔚青执笔。

表 1 10 个重点调研特大镇基本情况一览表

镇名	常住人口 (万人)	建成区常住人口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财政总收入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亿元)	工业增加值占比 (%)
瓜沥镇	24.8	21.29	261.93	23.06	23.06	50.21
周巷镇	22.50	14.80	145.34	12.37	7.04	61.23
柳市镇	31.69	19.42	372.50	52.11	3.19	52.00
鳌江镇	23.81	16.50	145.12	22.80	8.50	12.94 (规上工业)
许村镇	32.60	3.13	170.49	6.96	3.90	64.7
织里镇	40.56	28.2	327.27 (2020 年数据)	19.22	13.72	55.94 (2020 年数据)
店口镇	18.30	15.91	250.00	27.00	15.60	70.10
横店镇	18.39	13.58	244.10	44.50	21.57	46.99 (2019 年数据)
杜桥镇	21.89	15.99	205.66	18.88	10.60	48.30
泽国镇	21.32	14.02	235.10	13.83	5.48	49.7

数据来源：此表所列系 2021 年数据（有专门说明的除外），由各镇填报汇总；许村镇没有划定建成区，建成区常住人口为 3 个社区的汇总数。

表 2 浙江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一览表

镇区常住人口 20 万人及以上 (14 个)	织里镇（湖州）、柳市镇（温州）、塘下镇（温州）、瓜沥镇（杭州）、鳌江镇（温州）、泽国镇（台州）、古林镇（宁波）、许村镇（嘉兴）、周巷镇（宁波）、庵东镇（宁波）、长安镇（嘉兴）、杜桥镇（台州）、姜山镇（宁波）、濮院镇（嘉兴）
镇区常住人口 10 万 ~ 20 万人 (21 个)	龙山镇（宁波）、横店镇（金华）、店口镇（绍兴）、观海卫镇（宁波）、北白象镇（温州）、箬横镇（台州）、大溪镇（台州）、佛堂镇（金华）、金清镇（温州）、崇福镇（嘉兴）、苏溪镇（金华）、水头镇（温州）、塘栖镇（杭州）、王江泾镇（嘉兴）、孝顺镇（金华）、高桥镇（宁波）、白龙桥镇（金华）、钱库镇（温州）、虹桥镇（温州）、新河镇（台州）、横河镇（宁波）

为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全文所指特大镇均为这一范畴。据浙江省建设厅提供的资料，2021 年浙江共有特大镇 35 个（见表 2），其中包含非中心城区的市辖区内特大镇 10 个。其区域分布为：宁波市 8 个，温州市 7 个，台州市 6 个，嘉兴市 5 个，金华市 5 个，杭州市 2 个，湖州市 1 个，绍兴市 1 个。在一个县（市、区）范围内有两个及以上特大镇的有慈溪（5 个）、温岭（4 个）、乐清（3 个）以及海宁、桐乡、海曙、平阳、义乌（各 2 个）。

从人口规模看，镇区常住人口 20 万人以上的特大镇有 14 个，占全省特大镇总数的 40%；建成区常住人口 10 万人以上的有 13 个，其中湖州市织里镇建成区常住人口超过 20 万人，达到 I 型小城市规模。而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2020 年浙江还有 5 个县常住人口在 20 万人以下，5 个县城常住人口在 10 万人以下。

从地区生产总值规模看，300 亿元以上的特大镇有 4 个，200 亿 ~ 300 亿元的有 5 个，100 亿 ~ 200 亿元的有 16 个，100 亿元以下的有 10 个。而据“七普”数据，2020 年浙江还有 12 个县地区生产总值低于 200 亿元，其中 3 个低于 100 亿元。

再从人口和经济变化情况看，据本次调研统计汇总分析，35 个特大镇常住人口在 2016—2021 年保持增长的有 21 个，占 60%，持平和减少的分别为 9 个（占 25.7%）和 5 个（占 14.3%）；地区生产总值保持增长的有 26 个，占 74%，数据波动或未作统计估算的 7 个，有 2 个呈明显负增长趋势。

从“七普”数据看，2010—2020 年，嘉兴和金华两市的特大镇人口增长较快，许村镇、苏溪镇、濮院镇、长安镇、横店镇、佛堂镇人口增幅都超过 20%；温州市的部分特大镇人口下降比较明显，钱库镇、虹桥镇、水头镇常住人口减少均超过 10%，但经济总量仍然保持增长；宁波市的特大镇普遍经济增幅较大。

浙江的特大镇大多是在民营经济、块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重点调研的 10 个镇看，每个镇都有特色优势产业（见表 3），是所在县的经济重镇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见表 4）。不少特大镇制造业实力超过一般县城，其公共服务水平远超一般建制镇，对周边乡镇形成了较强的辐射作用。

表 3 10 个重点调研特大镇的特色优势产业一览表

镇名	主要特色优势产业
瓜沥镇	化纤印染、家装卫浴
周巷镇	小家电、汽车零部件
柳市镇	低压电器
鳌江镇	机械机电、箱包
许村镇	家纺、服装
织里镇	童装、电子元器件
店口镇	铜加工、制冷配件、水暖管材管件
横店镇	影视文旅、磁性材料、医药
杜桥镇	眼镜、医药、机械制造
泽国镇	泵与电机、鞋与皮革、汽摩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而得。

表 4 10 个重点调研特大镇及对应县城主要指标占全县（市、区）比重一览表

镇名 （所在县/市/区）	全县 （市、区） 常住人口 （万人）	县城常住 人口 （占%）	特大镇 常住人口 （占%）	全县（市、 区）地区 生产总值 （亿元）	县城地区 生产总值 （占%）	特大镇 地区 生产总值 （占%）	全县（市、 区）财政 总收入 （亿元）	县城 财政收入 （占%）	特大镇 财政收入 （占%）
瓜沥镇（萧山区）	201.17	58.93（29.3）	25.4（12.6）	1828.47	433（23.7）	234.49（12.8）	461.03	121（26.2）	19.76（4.3）
周巷镇（慈溪市）	182.95	47.79（26.1）	21.9（12.0）	2088.3	348（16.7）	128.5（6.2）	355.51	35.5（10.0）	17.0（4.8）
柳市镇（乐清市）	145.31	46.49（32.0）	28.3（19.5）	1263.01	无相关数据	338.5（26.8）	156.82	无相关数据	41.2（26.3）
鳌江镇（平阳县）	86.32	15.78（18.3）	23.33（27.0）	534.51	108.2（20.2）	172.4（32.30）	57.54	13.38（23.3）	22.27（38.7）
许村镇（海宁市）	107.62	38.83（36.1）	31.1（28.9）	1030.78	422.3（41.0）	146.5（14.20）	168.91	25.4（15.0）	5.37（3.2）
织里镇（吴兴区）	71.26	无相关数据	41.2（57.8）	752.75	210.0（27.9）	327.3（43.50）	82.81	8.28（10.0）	15.6（18.8）
店口镇（诸暨市）	121.81	68.58（56.3）	18.95（15.6）	1362.36	478.2（35.1）	236.4（17.40）	145.47	53.6（36.8）	22.78（15.7）
横店镇（东阳市）	108.80	56.51（51.9）	18.1（16.6）	638.16	无相关数据	205.1（32.1）	123.73	27.4（22.1）	41.01（33.1）
杜桥镇（临海市）	111.41	42.27（37.9）	21.66（19.4）	738.48	无相关数据	184.55（25.0）	101.86	17.68（17.4）	17.61（17.3）
泽国镇（温岭市）	141.62	42.45（30.0）	21.28（15.0）	1136.87	无相关数据	209.4（18.4）	118.98	27.63（23.2）	13.05（11.0）

数据来源：此表所列系 2020 年数据，由各地填报汇总，个别数据作了校正；萧山区城区数据系城厢、北干、蜀山、新塘 4 个街道相加的合计数据；慈溪市市区系 5 个街道数据。

注：表中括号内为县城和特大镇占全县（市、区）的比重。

二、当前浙江特大镇发展和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土地等稀缺资源和人才等优质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趋势加快，各县又将有限资源配置向县城倾斜，加上浙江小城市培育四轮试点优惠政策到期，新增财力返回和建设用地指标单列的优惠政策以及市本级配套被取消，特大镇发展的政策效应转弱，发展逐渐“被边缘化”。同时，面对小城市体量的常住人口和大比重的流动人口，特大镇镇级建制的管理服务机构又面临“小马拉大车”的治理困境。最突出的问题可用“地、钱、人、权”四个字概括。

（一）地：要素配置与经济规模不匹配

特大镇的经济总量虽然超过一般小县，但没有计划单列的建设用地指标，只能由县级政府在本级指标中安排。近年来城镇建设用地核减，转型升级找到大项目好项目却苦于无建设用地指标落地，优质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外迁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店口镇经筛选确定项目地块 32 个，涉及耕地 588.82 亩，在最新一轮“三区三线”划定中有 10 个项目未能划入，共计 261.66 亩。杜桥镇建成区规划面积从 24 平方公里缩减为 16 平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核减了 30%，2021 年获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仅 100 亩，是 2020 年的 1/3、往年的 1/5。低效工业用地土地收储难，主要原因是收储和转让价差大，退二进三政策细节不明。基础设施补短板也遭遇建设用地瓶颈。城镇住房不能满足需求，大量城镇就业人口在农村租房居住。

（二）钱：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

土地出让收入锐减而基层财政保障责任不断扩大，刚性支出只增不减。有的地方县级政府虽然有优惠政策，但同时也会把更多的支出责任转移给镇政府，往往财政支出的增幅大于转移支付增幅。如店口镇的可用财力只有 1.6 亿元，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不确定性，而在不搞大的建设情景下年度支出就需要 2.8 亿元左右。上级按户籍人口拨款使公共服务远不能满足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欠账，使特大镇的生活品质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差距较大。如不能解决，会导致特大镇功能萎缩退化，难以吸引和留住大中型企业 and 专业人才，政府负债过多带来风险。

（三）人：管理力量与人口规模不匹配

特大镇工贸产业发达，市场主体多，外来人口占比大，人口流动快，协调事项多，管理难度大。如织里镇高峰时人口达 45 万人，新居民占 75%，拥有私家车 14 万辆，电瓶车 13 万辆，每天社会报警量达 200 多起。尽管县级编制部门在机构编制上对特大镇有所倾斜，但特大镇机关事业编制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仍然明显低于其他乡镇。如周巷镇、许村镇每万人常住人口在编机关事业人员分别为 8.4 人和 3.13 人，而所在的慈溪市一般镇有 20 人左右，海宁市全市平均有 10.4 人。为管理方便，不少特大镇基于合并前的乡镇格局划分成若干片区，但片区没有人员编制和级别。编外用工指标一般约为机关事业编制的 4 倍左右，由于编外人员收入待遇低，又没有晋升通道，因此流动性较大，人员素质和工作积极性大打折扣。

（四）权：执法权限与管理需求不匹配

特大镇大都管理需求很大，如横店镇的出警量是毗邻磐安县的 3 倍多，店口镇的执法量占诸暨全市执法量的 1/3。可特大镇不仅管理人员少，而且执法权限小，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少之又少。不少事情看得见但管不着，有监管责任无处置权限。执法权限和力量配置上条强块弱，条线以文件、考核等形式干预较多，力量下沉不够。

分析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发展中特大镇的地位和作用阶段性下降的客观因素，也有主观上对特大镇在未来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中的定位认识不到位的原因。

三、对浙江特大镇定位要有新认识

特大镇是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不少特大镇还是县域副中心。党的二十大已吹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冲锋号，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现代化“两个先行”的目标要求。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对特大镇的定位需要有新认识，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大镇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加深思考和认识。

（一）特大镇是发展制造业的重要空间

中心城市重在集聚高端人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而特大镇凭借其地价和生活成本比较优势，以及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产业，在发展制造业上仍然具备竞争优势，尤其是根植于本土的产业集群，在特大镇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笔者调研发现，不少特大镇拥有“专精特新”企业，甚至不乏上市公司和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若能着力推进传统特色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强链补链延链，与大中城市之间完全可以形成互补发展、相得益彰产业链发展新格局，有利于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竞争力，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巩固“世界工厂”地位。意大利就非常重视扶持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集群，效果十分明显，其经验值得借鉴。当然，特大镇的特色优势产业也不限于制造业，横店镇就是通过发展影视产业链带动文旅大产业的成功范例。此外，特大镇就业岗位增加和人口集聚规模扩大，必然伴随服务业的相应发展。

（二）特大镇是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

要富裕农民，首先要转移农业人口，减少农民，这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为了争取更多发展机会和更高生活质量，人口向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和都市圈集中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城市间为争夺优质资源，集中力量提高中心城区的品位和体量也是大势所趋。我国是人口大国，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能力参差不齐。大城市就业能力要求高，生活成本也高，不一定适合每个农业转移人口。人口过度涌入大城市，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城市病”。所以需要合理分流农业转移人口，特大镇不失为就近城镇化和吸引跨区域转移农业人口的可选之地。特大镇只要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得到合理发展，并构建与人口规模相匹配的优质公共服务体系，可以兼顾较高的生活质量和较低的生活成本，成为稳定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

（三）特大镇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支撑

缩小城乡差距特别是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特大镇是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是向周边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区域中心。加大其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增强其覆盖周边乡镇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对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意义重大。

四、用改革思维破解发展和治理难题

面对用地、资金和编制等资源瓶颈，依靠增量思维解决特大镇发展和治理问题并不现实。路径唯此一条——改革。

（一）在县域规划中进一步突出特大镇的地位

县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特大镇。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布局、城镇功能配置、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要兼顾县城和特大镇，实现规划统筹，功能互补。考虑到特大镇的体量和潜能、发展趋势差别较大，区位和交通条件也各不相同，需要按常住人口制定规划配置资源，对都市圈中的卫星城、县域副中心和产业重镇等各类特大

镇要因地制宜，一镇一策。

从发展前景看，对那些产业发展前景好、动力强，规上企业多并有上市公司、500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或“隐形冠军”、小巨人企业等的特大镇，要继续支持它们做大做强，在积极推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向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延伸产业链；推进产业数字化，加快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工厂建设，鼓励制造业的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特大镇。对那些支柱产业仍能保持竞争优势、市场规模稳定，但没有新的大项目和更好产业，或对新增劳动力需求不大的特大镇，不求做大但求做好，致力于提高发展质量，完善城镇功能，配套发展服务业，补上公共服务短板，提升生活品质。

从区位条件看，对于毗邻县城的特大镇要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统筹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建设，实现与县城同城化发展；把距离县城较远的特大镇建设成能够为周边乡镇提供与县城基本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特别是优质基础教育和放心基础医疗的县域副中心；鼓励相邻的特大镇抱团融合发展，通过建立组团议事机构商议协调相关事宜；对临近大城市的特大镇，应当将其纳入都市圈统一规划，发展成大都市跨行政区域的卫星城。

（二）以盘活存量为主破解特大镇建设用地困局

鉴于当前建设用地十分紧缺的现实，给特大镇发展新增大量建设用地指标是不切实际的。应鼓励和支持特大镇着眼着力镇区有机更新，通过工业园区、专业市场、城中村、老旧小区和分散村庄的整治改造，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建设用地容积率和亩均产出率，解决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和公共设施建设提升的建设用地需求。整合过散的工业园区，通过土地置换在镇域内集约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在严控建设用地总量的前提下，允许在拆旧布新的审批操作程序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的部分土地收益返回企业。对盘活存量土地成效显著的特大镇给予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建议对于特大镇的市政设施、新基建和公共服务用地按常住人口安排土地指标，通过县域调剂补上欠账。

（三）进一步深化特大镇财政管理体制变革

支持各县（市）积极探索建立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特大镇财政体制。海宁市把许村镇当年度财政收入地方留成超过上年实绩的部分80%分给许村镇，超过当年全市平均增幅部分分成比例再增加10%；临海市把税收超基数和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市得部分全额返还给杜桥镇；这些举措值得各地借鉴。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地方虽然增加了特大镇的财政分成，但同时又将本应由县级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划给了特大镇，而且往往是入不敷出，这是值得研究的不合理现象。建议探索建立特大镇一级财政体制，使发展实绩与可用财力形成正反馈，在平衡好县级财政与特大镇财政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强特大镇自我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为特大镇招商引才、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提供更多财力支撑。另外，建议财政转移支付系数由分档次改为按人均数确定。建议允许特大镇通过县级国资平台公司在一定负债限度内开展融资，县镇一事一议分享股权。引导县（市）直部门把在特大镇的闲置资产划拨给国资平台，作为特大镇持有股权。

（四）多管齐下缓解管理人员编制紧缺

推进县级部门人员编制向特大镇下沉。根据本县（市）特大镇的规模和数量，安排5%~15%的县级部门人员编制通过下派挂职等途径下沉到特大镇，并增加专业人才比重。部门派驻特大镇机构人员编制实行“县属镇用镇管”。上级部门要以实际行动支持特大镇整合职责实行大部门制。县（市）

行政服务中心在距主城区较远的特大镇建立分中心，服务特大镇及周边乡镇。建立乡镇街道编制周转池，用于加强重点乡镇、重点工作的编制保障。

通过数字化赋能，增加网上办、掌上办、自动办事项，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整合镇智能管理平台，推进“整体智治”和“条抓块统”，精简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积极发展非现场执法和实时智能监督。严格控制条条考核和过程性指标，强化问题导向、目标管理和综合考评。改变部门各自为政、多头建设专业管理队伍的做法，统筹使用执法力量，整合基层网格，实现多元综合治理，减少对编制和合同制管理人员的需求量。

探索镇政府雇员制度。由特大镇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提出限额，提交镇人大批准，受县（市）编制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监督。让雇员同编内人员同台竞技，给他们提供上升通道。同时加强政府雇员素质和能力培训，确保其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扩大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积极培育和引进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更多发挥市场力量、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作用。

（五）向特大镇进一步放权赋能

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改革人权、依法用权，做到县级行政管理权限能放则放，并赋予特大镇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决策权、行政综合执法权、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权、多部门协同解决综合性事项的统筹协调权、对县级部门的考核评价权，强化特大镇对涉辖区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建立特大镇先试先行、一镇一策的运行机制和体现特大镇特点的考核指标体系。特大镇也要向城乡社区放权赋能，增强住宅小区和村民小组的自治权能，鼓励新老居民共建共治共享。

从制度建设规范化考虑，建议向国家争取探索建立新的特大镇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鉴于龙港“镇改县级市”模式在特大镇面上难以复制，需要在龙港改革经验基础上继续探索能够适应发展和治理需要，又能推广的新的特大镇管理体制。建议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高度，向有关部门争取改革试点权。结合新一轮小城市培育试点，在镇区常住人口超过 20 万人或建成区人口超过 10 万人，且人口和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区位优势明显，与县城距离超出 15 公里的特大镇中选择试点对象。在以下方面给予先行先试权利：一是为提高统筹能力，特大镇党政主要领导以副县级高配，允许工作独立性较强、工作量较大的部门在特大镇设立分局，分局主要领导由县（市）局副局长兼任；二是按小城市要求提档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赋予其县级管理权限，允许其自主制定政策、申报项目和向上级政府申请资金补助；三是建设用地等重要资源配置指标单列，自行实施行政管理、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实行大部门制和扁平化管理；四是率先实行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和城乡土地同权的改革。以上先行先试设想是初步的，可在改革实践探索中逐步完善。这是一项有关浙江“两个先行”的重大改革。从长远看，若条件成熟可将此项改革成果转化为“由县级政府管理的副县级小城市”这一新的设市模式，成为浙江省可以向全国推广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责任编辑：谷 岳

· 产业 发展 ·

新型专业服务的 表现形式、供需特征与发展对策

——基于北京中关村的考察

邱 灵

摘要：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新型专业服务的可及性、经济性和功能性已成为初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中关村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北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北京中关村为例探索新型专业服务与创新创业企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基于重点孵化器座谈、初创科技型企业问卷调查、新型专业服务企业访谈等，分析“互联网+”产业跨界融合趋势下新型专业的表现形式，针对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服务需求和新型专业服务发展的供给瓶颈，提出区域特色新型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即聚焦需求，构建服务创新创业的特色化新型专业服务体系；创新供给，搭建有效对接初创科技型企业需求的服务平台；精准施策，助推新型专业服务与初创科技型企业协同发展。

关键词：新型专业服务 创新创业 中关村

作者简介：邱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创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纵向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专业服务机构是联系沟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关键要素的“桥梁”，对促进区域创新创业具有重要作用（王昌林，2018）。北京中关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历经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发展时期，一直发挥着改革试验田和创新排头兵的重要作用，已成为我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张署红等，2021；杨学聪、韩秉志，2021）。面对新一轮创新创业浪潮，初创科技型企业成为推动中关村发展的重要生力军，新型专业服务的可及性、经济性和功能性是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必要条件，对中关村打造国际一流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和创新创业高地、北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作用（陈向东、刘志春，2014；吕一博等，2015；林园春，2015；林园春，2017）。顺应新型专业服务蓬勃兴起的发展趋势，以北京中关村为例，研究新型专业的表现形式、供需特征与发展对策，探索新型专业服务与创新创业企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有助于加快推动中关村创新创业服务升级、更好发挥中关村创新创业引领示范作用，也可

以为国家推进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提供经验借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

一、新型专业服务的表现形式

专业服务是指应用某些专业知识和专门知识或者大量实践经验为客户或消费者提供某一领域特殊服务，具有专家专业评估诊断、客户高度参与交流、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高度定制化、职业行为规范化等行业特征（Machlup, 1962; Noyelle, 1990; Lorsch and Tierney, 2002; 陈和等, 2014）。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来看，国内外并没有单独划分专业服务业，其往往与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交叉融合（周海炜、郑爱翔, 2014）。例如，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将专业服务业归属于其他商务服务业，主要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和公共服务，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建筑、工程和其他技术服务，农业、矿业和现场处理服务，其他商务服务，以及关联企业间服务等。欧盟统计局将专业服务业归属于商业服务大类的其他商业活动门类，主要包括法律、会计与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与管理咨询以及企业注册服务、建筑和工程活动、技术检测分析、广告以及人力资源等。美国统计局界定的专业服务业主要包括法律诉讼、会计、建筑设计、计算机服务、咨询、研究、广告、摄影、翻译与口译、兽医及其他专业服务。加拿大统计局界定的专业服务业主要包括法律服务、会计及相关服务、建筑工程及相关服务、测绘服务、设计服务、管理科学和技术咨询服、科学研究与开发服务、广告服务以及其他专业科技服务等。按照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我国界定的专业服务业主要包括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广告业，人力资源服务，安全保护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以及其他商务服务业等。为此，基于中关村重点孵化器座谈和初创科技型企业问卷调查梳理发现，与中关村创新创业密切相关的专业服务业主要涵盖十个领域，包括开办代办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咨询服务、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财务税务服务、检验认证服务、会展推广服务。

与传统专业服务相比，新型专业服务主要是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模式在特定领域实现专业服务内容、模式乃至业态的创新。一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类专业服务。主要通过办公空间或仪器设备等基础设施共享方式，帮助初创科技型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及运营费用。这类新型专业服务聚焦初创科技型企业难以大额投入固定资产的“痛点”，普遍采用分时租赁、合同外包等服务模式，比传统孵化器更专注于通过基础设施服务实现“自我造血”的良性发展，也有效降低了创新创业门槛和风险。例如，我国互联网领域龙头企业通过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软件即服务（SaaS）等服务模式，为众多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办公空间、共享服务、智能应用和办公社交等一站式解决方案。二是细分领域垂直一体化综合性服务。主要通过传统孵化器转型升级，从简单依靠工位出租的“二房东”转变为提供全面服务的垂直一体化专业型孵化器，即利用自身资源整合形成“创业概念—预孵化—孵化器—加速器—产业链—生态圈”的接力式、一体化孵化体系。例如，生物医药领域孵化器通过构建“专业平台+产业聚集+市场服务”的孵化模式，为入孵企业提供企业孵化、品种研发、成果转化、产品生产、市场营销为一体的发展路径。新材料领域孵化器采用“产业垂直+深度孵化”发展模式，为早期科技项目提供技术产品化和企业商业化运营管理的全方位解决方案。三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通用型专业化服务。初创科技型企业普遍对知识产权、法律维权、财务税务、人力资源、检验检测、技术研发等专业服务需求较大，但考虑到专业服务领域准入门槛较高，特别是人力资本投入偏大等现实困境，往往将这些通用类专业服务外包给市场化第三方公司，以此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随着以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加快应用，知识产权服务、法律服务、财务税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新型专业服务机构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利用平台网络效应扩大服务范围，基于海量数据分析提升服务质量，呈现线上线下加速融合、专业化平台化智能化等趋势。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传统专业服务依托新模式新业态加速转型升级，并涌现出一大批新型专业服务机构，这也有力推动了创新创业服务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变革。例如，某法律领域专业服务公司基于人工智能精准匹配法律服务供需，围绕事前制度完善、事中风险防控、事后纠纷处理三个维度，提供公司治理、业务合规、合同管理、劳动人事、知识产权、财务账款等六大模块化服务，力争做到确保专属、体现专业和发挥专长，致力于为企业打造“可依赖的云端法务部”（蒋勇、邹一娇，2019）。某综合性专业服务公司针对搜索耗时、成本较高和质量较差“三大痛点”，以财税记账为入口，延伸提供工商法务、知识产权、社保公积金等在线企业综合服务，形成涵盖知识产权细分品牌“快誉知产”、财税细分品牌“快合财税”、工商细分品牌“快奕工商”等专业子品牌的“平台+自营+SaaS”智能化一站式在线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某人力资源领域专业服务公司创建一站式线上线下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为企业用户提供社保/公积金代理、商业保险、薪酬服务、服务外包、劳务派遣、人力成本优化等一站式智慧人力资源共享中心解决方案，旗下产品包括招聘通、入职通、薪资通、社保通、普保通、真福利、哆啦助手、人社云等。某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服务公司独创智能化专利情报与预警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创新与专利情报、发明创新工具、高价值专利培育、专利价值评估、专利分析运营等知识产权服务，实现专利技术智能分类、威胁专利智能预警、专利智能分级并一键生成报告。某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服务公司运用“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模式，提供从商标代理到知识产权检索查询、研发导航、预警分析以及知识产权布局、挖掘、保护和商业化全链条服务，降低初创企业获取基础性知识产权服务成本的同时减少了研发风险。某财税领域专业服务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智能化、自动化财税管理，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财税咨询、工商注册、人资社保等服务，并构建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征信服务的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体系。

二、新型专业服务的供需特征

为全面把握中关村新型专业服务的供需特征，更好促进新型专业服务与创新创业企业协同发展，在对中关村创业大街、优客工场、创业公社、创业邦、北创营等重点孵化器进行座谈基础上，对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进行在线问卷调查，收回问卷 582 份，有效问卷 570 份，有效率超过 95%。

（一）从需求视角看新型专业服务需求特征

一是从总体上看初创科技型企业需求特征，普遍具有专业服务需求（见表 1）。针对开办代办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咨询服务、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财务税务服务、检验认证服务、会展推广服务这 10 项专业服务，544 家初创科技型企业存在一项或者多项需求，占比达到 95.4%。10 项专业服务中，需求最多的是信息服务，231 家企业存在服务需求；其次是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分别有 225 家和 145 家企业存在服务需求。

二是从发展阶段看初创科技型企业需求特征，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的需求均较高（见表 2）。根据成立时间将初创科技型企业划分为 3 年以下、3~5 年、5 年及以上三个发展阶段，分

别有 193 家、298 家、79 家，所占比重分别为 33.86%、52.28%、13.86%，超过半数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成立时间为 3 ~ 5 年。其中，成立 3 ~ 5 年初创科技型企业需求最大的是信息服务，其次是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成立 3 年以下或者 5 年及以上的初创科技型企业需求最大的是知识产权服务，其次是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企业成立超过 3 年后，对会展推广服务、开办代办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服务需求明显增长；企业成立超过 5 年后，对财务税务服务、检验认证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服务需求有所增加。

三是从人员规模看初创科技型企业需求特征，人员规模 100 人及以下企业需求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人员规模 100 人以上企业对会展推广服务需求明显增加（见表 3）。根据人员规模将初创科技型企业划分为 10 人以下、10 ~ 100 人、100 人以上三个类型，分别有 130 家、429 家、11 家，所占比重分别为 22.8%、75.3%、1.9%。其中，10 人以下企业需求最多的是知识产权服务，占比达到 39.2%；其次是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所占比重分别为 38.5%、26.9%。10 ~ 100 人企业需求量前三位依然是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所占比重分别为 41.7%、40.6%、24.9%。100 人以上企业需求最多的是会展推广服务，所占比重达到 36.4%，排名位次由 10 人以下企业的第五位、10 ~ 100 人企业的第七位上升为第一位。

四是从细分行业看初创科技型企业需求特征，不同行业领域对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的企業需求较为集中（见表 4）。参照《北京市十大高精尖产业登记指导目录》，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主

表 1 初创科技型企业对新型专业服务的需求情况

单位：家，%

服务类别	初创科技型企业数量	占比
信息服务	231	40.5
知识产权服务	225	39.5
金融服务	145	25.4
财务税务服务	123	21.6
检验认证服务	113	19.8
会展推广服务	93	16.3
法律服务	90	15.8
人力资源服务	81	14.2
管理咨询服务	74	13.0
开办代办服务	18	3.2
其他服务需求	26	4.6

表 2 不同发展阶段初创科技型企业对新型专业服务的需求情况

单位：家，%

服务类别	3 年以下		满 3 年不足 5 年		5 年及以上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信息服务	73	37.8	132	44.3	26	32.9
知识产权服务	81	42.0	110	36.9	34	43.0
金融服务	48	24.9	74	24.8	23	29.1
财务税务服务	47	24.4	56	18.8	20	25.3
检验认证服务	41	21.2	53	17.8	19	24.1
会展推广服务	26	13.5	53	17.8	14	17.7
法律服务	31	16.1	47	15.8	12	15.2
开办代办服务	6	3.1	12	4.0	3	3.8
人力资源服务	34	17.6	32	10.7	15	19.0
管理咨询服务	23	11.9	43	14.4	8	10.1
其他服务需求	9	4.7	15	5.0	2	2.5

表 3 不同人员规模初创科技型企业对新型专业服务的需求情况

单位：家，%

服务类别	10 人以下		10 人到 100 人		100 人以上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信息服务	50	38.5	179	41.7	2	18.2
知识产权服务	51	39.2	174	40.6	0	0
金融服务	35	26.9	107	24.9	3	27.3
财务税务服务	27	20.8	95	22.1	1	9.1
检验认证服务	22	16.9	90	21.0	1	9.1
法律服务	18	13.9	71	16.6	1	9.1
会展推广服务	24	18.5	65	15.2	4	36.4
管理咨询服务	12	9.2	60	14.0	2	18.2
人力资源服务	22	16.9	57	13.3	2	18.2
开办代办服务	4	3.1	16	3.7	1	9.1
其他服务需求	4	3.1	21	4.9	1	9.1

要集中在软件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数量分别为 248 家、64 家、63 家，累计比重达到 65.8%。其中，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比重在集成电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科技服务等行业领域排名第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领域排名第二；金融服务需求比重在医药健康行业领域排名第一，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行业领域排名第二。作为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关键领域，软件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信息服务需求很大，在各自专业服务需求比重分别达到 25.9%、17.1%、18.8%，分别居第一位、第二位、第一位。

表 4 十大高精尖产业对新型专业服务的需求情况 单位：%

服务类别	软件和 信息服务	科技 服务	新一代 信息技术	集成 电路	医药 健康	智能 装备	节能 环保	新能源 汽车	新材料	人工 智能
知识产权服务	17.7	20.0	15.9	24.1	14.7	22.4	7.9	50.0	20.7	22.3
金融服务	10.8	10.7	15.2	20.7	18.9	6.1	10.5	16.7	10.3	16.0
信息服务	25.9	17.1	18.8	10.3	7.4	10.2	10.5	0	6.9	13.8
财务税务服务	11.6	9.3	10.9	13.8	3.2	14.3	10.5	0	10.3	7.4
检验认证服务	7.0	12.9	9.4	3.4	14.7	12.2	13.2	0	17.2	7.4
人力资源服务	7.0	3.6	5.1	6.9	12.6	10.2	2.6	0	6.9	6.4
法律服务	6.0	8.6	4.3	3.4	4.2	10.2	13.2	16.7	13.8	8.5
会展推广服务	6.0	6.4	10.9	6.9	10.5	4.1	13.2	0	3.4	10.6
管理咨询服务	5.4	6.4	7.2	3.4	5.3	4.1	10.5	16.7	3.4	5.3
开办代办服务	1.0	2.9	2.2	3.4	3.2	4.1	2.6	0	6.9	0
其他服务需求	1.4	2.1	0	3.4	5.3	2.0	5.3	0.0	0.0	2.1

（二）从供给视角看新型专业服务机构发展

一是从总体上看初创科技型企业供给特征，初创科技型企业多为新型专业服务机构。问卷调查的初创科技型企业中，提供一项或多项专业服务的企业数量为 502 家，占提供服务企业总数的 88.1%。其中，提供信息服务的企业数量达到 418 家，所占比重为 73.3%；其次是管理咨询服务，企业数量仅有 26 家，所占比重为 4.6%；提供开办代办服务、法律服务、财务税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专业服务的企业数量都不超过 10 家。

二是从发展阶段看初创科技型企业供给特征，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提供的专业服务特征与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总体特征基本相似（见表 5）。首先，初创科技型企业提供专业服务比例高。成立 3 年以下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企业数量有 166 家，占该发展阶段提供专业服务企业的比重达到 86%；成立 3~5 年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企业数量有 263 家，所占比重达到 88.3%；成

表 5 不同发展阶段初创科技型企业 的专业服务供给情况

单位：家，%

服务类别	数量			占比		
	3 年 以下	满 3 年 不足 5 年	5 年 及以上	3 年 以下	满 3 年 不足 5 年	5 年 及以上
信息服务	135	220	63	81.3	83.7	86.3
管理咨询服务	9	12	5	5.4	4.6	6.8
检验认证服务	7	9	3	4.2	3.4	4.1
金融服务	7	10	1	4.2	3.8	1.4
知识产权服务	6	7	3	3.6	2.7	4.1
财务税务服务	5	0	0	3.0	0	0
会展推广服务	4	13	0	2.4	4.9	0
人力资源服务	3	1	0	1.8	0	0
开办代办服务	2	0	0	1.2	0	0
法律服务	1	2	0	0.6	0.8	0

立 5 年及以上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企业数量有 73 家，所占比重大达到 92.4%。其次，不同发展阶段初创科技型企业均主要提供信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成立 5 年及以上的初创科技型企业集中于提供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检验认证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

三是从人员规模看初创科技型企业供给特征，人员规模越大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比重也越大（见表 6）。10 人以下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有 114 家，占该发展规模企业总数的 87.7%；10~100 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

有 378 家，所占比重为 88.1%；100 人以上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有 10 家，所占比重为 90.9%。从各类专业服务来看，随着人员规模扩大，提供信息服务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所占比重也越大，即 10 人以下、10~100 人、100 人以上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分别有 90 家、319 家、9 家，所占比重分别为 78.9%、84.4%、90%。

四是从所有制类型看初创科技型企业供给特征，供给主体多为民营企业。根据不同所有制类型将 570 家初创科技型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4 种类型。其中，民营企业 551 家，占比 96.7%，提供专业服务的有 488 家，占提供专业服务民营企业总数的 88.6%，占所有企业总数的 85.6%；外资企业 9 家，占比 1.6%，提供新型专业服务的有 6 家，占提供专业服务外资企业总数的 66.7%，占所有企业总数的 1.1%；国有企业 5 家，占比 0.9%，提供专业服务的有 3 家，占提供专业服务国有企业总数的 60%，占所有企业总数的 0.5%；港澳台资企业 5 家，占比 0.9%，提供专业服务的有 5 家，占提供专业服务港澳台资企业总数的 100%，占所有企业总数的 0.9%。

五是从客户类型看初创科技型企业供给特征，客户主体多为民营企业且分布在中关村之外。根据不同所有制类型将 570 家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客户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4 种类型。其中，民营企业 389 家，占比 68.2%；国有企业 171 家，占比 30%；外资企业 10 家，占比 1.8%。根据不同区域分布情况，将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客户划分为北京市、津冀地区、京津冀以外地区等 3 种类型。其中，北京市客户 214 家，占比 37.5%；津冀地区客户 152 家，占比 26.7%；京津冀以外地区客户 204 家，占比 35.8%。

（三）从供需匹配看新型专业服务发展问题

一是从需求端看，具有专业服务需求多但集中度低的低频使用特性，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的专业服务使用频次多低于 10 次，外购服务支付能力弱、需求变动大。具备规模和品牌优势的新型专业服务机构，目前更多服务于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通用性专业服务门槛较低、服务机构良莠不齐，初创科技型企业外购服务搜寻成本高。二是从供给端看，供给方目前更多来自中关村之外，中关村本土新型专业服务机构亟待发展壮大和提升品牌知名度。特别是中关村众多孵化器也普遍外购服务，其延伸

表 6 不同发展规模初创科技型企业的专业服务供给情况

单位：家,%

服务类别	数量			占比		
	10 人以下	10 – 100 人	100 人以上	10 人以下	10 – 100 人	100 人以上
信息服务	90	319	9	78.9	84.4	90.0
检验认证服务	7	12	0	6.1	3.2	0
管理咨询服务	6	20	0	5.3	5.3	0
金融服务	4	13	1	3.5	3.4	10.0
会展推广服务	4	13	0	3.5	3.4	0
财务税务服务	3	1	1	2.6	0.3	10.0
知识产权服务	2	14	0	1.8	3.7	0
人力资源服务	2	2	0	1.8	0.5	0
法律服务	2	1	0	1.8	0.3	0
开办代办服务	1	1	0	0.9	0.3	0

专业服务需求与在孵企业拓展专业服务市场之间的供需互动仍较弱。三是从政策端看，支持政策仍存在“空白点”。例如，中关村对垂直一体化综合服务机构的支持政策与一般孵化器并无区别，均以运营或房租类资金补贴为主，但这类机构的成本投入并不以运营或房租为主，实际能获得资金支持很少。

三、新型专业服务的发展对策

结合重点孵化器座谈、初创科技型企业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针对当前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服务需求和新型专业服务发展的供给瓶颈，深刻把握新型专业服务向更细分、更专业方向发展的趋势，着力解决新型专业服务发展面临的“痛点”“难点”问题，精准施策提升新型专业服务发展水平，更好促进新型专业服务与创新创业企业协同发展。

（一）聚焦需求，构建服务创新创业的特色化新型专业服务体系

一是初创科技型企业普遍具有专业服务需求，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主要集中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领域，对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的专业服务需求尤为突出，要以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为重点，加快构建具有中关村特色的新型专业服务体系。二是不同发展阶段和人员规模 of 初创科技型企业专业服务需求存在明显差异，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创立时间 3~5 年、人员规模 10~100 人这个发展阶段，注重对接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等新型专业服务的同时，逐步加强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推广服务等新型专业服务。三是专业服务往往与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交叉融合，深入把握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趋势，综合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模式，促进新型专业服务内容、模式乃至业态的创新发展。

（二）创新供给，搭建有效对接初创科技型企业需求的服务平台

专业服务的重要特性是客户高度参与性、服务高度定制化，但中关村新型专业服务发展存在“两头在外”问题，^①要注重搭建新型专业服务机构有效对接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平台。一方面，围绕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瓶颈制约，着力破解市场需求少、企业融资贵、人才招聘难、场地租金贵等突出问题，培育壮大本土新型专业服务机构。另一方面，针对中关村初创科技型企业专业服务需求多但集中度低的低频使用特性，加强知名新型专业服务机构与孵化器及重点园区的交流合作，降低新型专业服务机构获客及匹配成本，更好服务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

（三）精准施策，助推新型专业服务与初创科技型企业协同发展

一是出台新型专业服务发展行动计划。针对中关村新型专业服务支持政策“空白点”和堵点难点诉求，建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研究制定专项行动计划，明确中关村特色新型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政策支持和推进机制。行动计划重点聚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等重点行业初创科技型企业，优先满足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等专业服务需求，逐步拓展法律服务、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推广服务等。

^①即初创科技型企业大多是新型专业服务机构，但需求方多在中关村乃至北京市之外，孵化器也很少采购在孵企业的新型专业服务；初创科技型企业大多有新型专业服务需求，但供给方多在中关村之外。

二是搭建新型专业服务供需对接平台。针对中关村新型专业服务供需“两头在外”发展困境，支持行业协会牵头建立中关村新型专业服务联盟，面向“一区多园”特色园区、孵化器及创新创业企业，定期发布新型专业服务机构目录，降低供需双方的市场匹配成本。针对通用性专业服务门槛较低、服务机构良莠不齐，而特色化新型专业服务机构品牌认知度不高、市场拓展困难的发展困境，以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加大对新型专业服务机构的市场对接。针对中关村新型专业服务企业实力和品牌知名度有待提升、孵化器与在孵新型专业服务企业相互支撑不足等问题，支持本土新型专业服务机构优先纳入目录，通过加大政府采购力度、设立专业服务费等方式，推动中关村新型专业服务的流程化、标准化、品牌化，提升新型专业服务初创科技型企业与知名科技企业、孵化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培育新型专业服务领域的本土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

参考文献：

1. 王昌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论初探》，人民出版社，2018 年。
2. 张署红、杨学聪、余惠敏等：《中关村新传——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发展纪实》，《经济日报》，2021 年 7 月 12 日。
3. 杨学聪、韩秉志：《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核心地位——专访北京市副市长新伟》，《经济日报》，2021 年 7 月 14 日。
4. 陈向东、刘志春：《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观点的我国科技园区发展观测》，《中国软科学》，2014 年第 11 期。
5. 吕一博、蓝清、韩少杰：《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基因——基于 iOS、Android 和 Symbian 的多案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 年第 5 期。
6. 林园春：《创新创业生态服务链：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区域经济评论》，2015 年第 3 期。
7. 林园春：《创新创业服务生态链形成机制与优化策略》，《中州学刊》，2017 年第 7 期。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5 年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报告》，人民出版社，2016 年。
9. 陈和、蔡晓珊、隋广军：《专业服务企业研究：知识经济背景下的重要议题》，《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1 期。
10. 周海炜、郑爱翔：《专业服务企业涵义与组织特征：国外相关研究评述》，《华东经济管理》，2014 年第 11 期。
11. 蒋勇、邹一娇：《变革的逻辑——新技术驱动下的中国法律服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
12. Machlup, F.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13. Noyelle, T. Skills, Wage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 Sector. Westview Press, 1990.
14. Lorsch, J. W. and Tierney, T. J. Aligning the Star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2.

责任编辑：郭 霞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估计值	2023 年 预测值	2024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 年 1 月)				
世 界	6.2	3.4	2.9	3.1
发达国家	5.4	2.7	1.2	1.4
美 国	5.9	2.0	1.4	1.0
欧元区	5.3	3.5	0.7	1.6
日 本	2.1	1.4	1.8	0.9
发展中国家	6.7	3.9	4.0	4.2
中 国	8.4	3.0	5.2	4.5
印 度	8.7	6.8	6.1	6.8
俄罗斯	4.7	-2.2	0.3	2.1
巴 西	5.0	3.1	1.2	1.5
南 非	4.9	2.6	1.2	1.3
世界银行(WB,2023 年 1 月)				
世 界	5.9	2.9	1.7	2.7
发达国家	5.3	2.5	0.5	1.6
美 国	5.9	1.9	0.5	1.6
欧元区	5.3	3.3	0.0	1.6
日 本	2.2	1.2	1.0	0.7
发展中国家	6.7	3.4	3.4	4.1
中 国	8.1	2.7	4.3	5.0
印 度	8.7	6.9	6.6	6.1
俄罗斯	4.8	-3.5	-3.3	1.6
巴 西	5.0	3.0	0.8	2.0
南 非	4.9	1.9	1.4	1.8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3 年 2 月)				
世 界	5.9	3.0	1.9	2.4
中 国	8.1	3.0	5.2	5.1
美 国	5.9	2.1	0.7	1.1
欧元区	5.3	3.5	0.4	1.2
日 本	2.2	1.0	1.1	1.1
印 度	8.7	7.0	5.8	6.2
俄罗斯	4.7	-2.1	-2.1	1.3
巴 西	5.0	3.0	1.0	1.8
南 非	4.9	2.3	1.5	2.0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季度。(2)世界银行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半年度。(3)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月度。(4)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估计值	2023 年 预测值	2024 年 预测值
世 界	10.4	5.4	2.4	3.4
发达国家	9.4	6.6	2.3	2.7
发展中国家	12.1	3.4	2.6	4.6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 1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估计值	2023 年 预测值	2024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 年 1 月)				
世 界	4.7	8.8	6.6	4.3
发达国家	3.1	7.3	4.6	2.6
发展中国家	5.9	9.9	8.1	5.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23 年 2 月)				
世 界	3.6	7.4	5.2	3.3
美 国	4.7	8.0	3.9	2.5
欧元区	2.6	8.4	5.5	2.4
日 本	-0.2	2.5	2.1	1.2
印 度	5.5	6.6	5.0	4.8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22 年		8.3	7.9	9.0
	1 月	5.9	5.0	7.0
	2 月	6.6	5.7	7.3
	3 月	7.1	6.5	7.6
	4 月	7.7	7.0	8.6
	5 月	8.1	7.8	9.2
	6 月	8.8	8.5	9.7
	7 月	9.3	8.7	9.8
	8 月	9.1	8.7	9.6
	9 月	9.2	8.9	9.2
	10 月	9.3	9.1	9.6
	11 月	9.0	8.9	9.1
	12 月	9.0	8.5	9.3
2023 年				
	1 月	8.8	8.3	9.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22 年		2.8	1.8	3.4			
	1 月	3.9	1.4	6.5	53.2	51.3	52.2
	2 月	5.1	3.5	6.6	53.7	52.2	53.7
	3 月	3.9	1.8	5.4	52.9	50.9	51.4
	4 月	0.0	1.5	-0.3	52.3	48.6	50.5
	5 月	2.8	1.9	3.0	52.3	49.6	50.9
	6 月	3.4	2.0	3.8	52.2	52.4	50.1
	7 月	2.8	1.0	3.3	51.1	50.0	48.9
	8 月	3.4	2.7	4.0	50.3	49.4	48.2
	9 月	4.5	4.5	4.6	49.8	48.7	47.7
	10 月	3.4	2.1	3.7	49.4	48.7	46.9
	11 月	1.7	0.7	2.3	48.8	47.8	46.7
	12 月	0.0	-0.7	1.0	48.7	48.5	46.4
2023 年							
	1 月				49.1	49.0	47.8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20 年		-2.8	-3.0	2.6
	4 季度	3.9	3.9	-0.1
2021 年		5.9	8.3	0.6
	1 季度	6.3	10.8	6.5
	2 季度	7.0	12.1	-3.0
	3 季度	2.7	3.0	-0.2
2022 年	4 季度	7.0	3.1	-1.0
		2.1	2.8	-0.6
	1 季度	-1.6	1.3	-2.3
	2 季度	-0.6	2.0	-1.6
	3 季度	3.2	2.3	3.7
	4 季度	2.7	1.4	3.6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2.3	-13.2	-9.0
	4 季度	16.8	24.2	32.9
2021 年		7.4	6.1	14.1
	1 季度	9.7	0.4	7.6
	2 季度	5.8	4.9	7.9
	3 季度	-1.1	-1.1	6.6
2022 年	4 季度	0.6	23.5	18.6
		-0.2	7.2	8.2
	1 季度	4.8	-4.6	18.4
	2 季度	-5.0	13.8	2.2
	3 季度	-3.5	14.6	-7.3
	4 季度	-4.6	-1.6	-4.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20 年		-2.8	-3.0	2.6
	4 季度	-1.5	-1.4	1.0
2021 年		5.9	8.3	0.6
	1 季度	1.2	2.8	1.8
	2 季度	12.5	16.6	-0.7
	3 季度	5.0	7.4	0.7
2022 年	4 季度	5.7	7.2	0.5
		2.1	2.8	-0.6
	1 季度	3.7	4.8	-1.6
	2 季度	1.8	2.4	-1.3
	3 季度	1.9	2.2	-0.3
	4 季度	0.9	1.8	0.8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2.3	-13.2	-9.0
	4 季度	1.0	-10.0	0.4
2021 年		7.4	6.1	14.1
	1 季度	4.1	-6.1	5.7
	2 季度	15.0	20.2	30.5
	3 季度	7.6	6.6	13.3
	4 季度	3.7	6.5	10.1
2022 年		-0.2	7.2	8.2
	1 季度	2.5	5.2	12.7
	2 季度	-0.2	7.3	11.2
	3 季度	-0.9	11.3	7.4
	4 季度	-2.1	5.2	1.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22 年		-1.3		3.6	481.4
	1 月			4.0	36.4
	2 月			3.8	90.4
	3 月	-5.9	-0.4	3.6	41.4
	4 月			3.6	25.4
	5 月			3.6	36.4
	6 月	-4.1	-2.1	3.6	37.0
	7 月			3.5	56.8
	8 月			3.7	35.2
	9 月	1.4	-1.1	3.5	35.0
	10 月			3.7	32.4
	11 月			3.6	29.0
2023 年	12 月	3.0	-1.5	3.5	26.0
	1 月			3.4	51.7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21 年	23668		6.1	36002		14.1	-12334
12 月	2324	1.9	19.8	3113	1.7	21.3	-789
2022 年	25384		7.2	38935		8.1	-13551
1 月	2273	-2.2	15.1	3148	1.1	20.5	-875
2 月	2323	2.2	20.1	3196	1.5	23.5	-873
3 月	2438	5.0	17.6	3502	9.6	27.1	-1064
4 月	2519	3.4	21.3	3386	-3.3	23.9	-867
5 月	2556	1.5	21.6	3408	0.7	23.1	-852
6 月	2600	1.7	22.5	3402	-0.2	19.9	-802
7 月	2604	0.1	21.6	3306	-2.8	16.6	-702
8 月	2612	0.3	21.0	3265	-1.2	13.7	-653
9 月	2581	-1.2	22.0	3317	1.6	14.4	-736
10 月	2565	-0.6	13.6	3339	0.7	13.5	-773
11 月	2523	-1.6	10.6	3134	-6.1	2.4	-610
12 月	2502	-0.9	7.6	3176	1.3	2.0	-674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月度数据为季节调整后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0 年		950	2045	-1094
	3 季度	317	595	-278
	4 季度	337	-209	546
2021 年		3892	3500	392
	1 季度	737	890	-153
	2 季度	737	1408	-671
	3 季度	1219	599	620
2022 年	4 季度	1198	603	596
	1 季度	701	993	-292
	2 季度	721	1162	-441
	3 季度	818	585	233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20 年		-6.1	-7.7	1.0
	4 季度	-0.3	-2.9	0.6
2021 年		5.3	3.8	4.3
	1 季度	-0.1	-1.9	-0.3
	2 季度	2.0	3.4	2.1
	3 季度	2.2	4.5	0.5
	4 季度	0.5	-0.1	0.4
2022 年		3.5		
	1 季度	0.6	0.0	0.1
	2 季度	0.9	1.1	-0.1
	3 季度	0.3	0.8	0.2
	4 季度	0.1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6.2	-8.9	-8.5
	3 季度	15.6	16.3	13.0
	4 季度	3.5	4.7	5.8
2021 年		3.6	10.5	8.3
	1 季度	-2.3	1.1	-0.8
	2 季度	1.8	2.5	3.0
	3 季度	-0.8	1.9	2.1
	4 季度	3.4	2.6	4.7
2022 年				
	1 季度	-0.7	1.4	-0.7
	2 季度	0.9	1.7	2.2
	3 季度	3.6	1.7	4.3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 率	失业人数 (万人)
		环比	同比		
2022 年				6.7	1128.4
	1 月			6.9	1150.9
	2 月			6.8	1142.0
	3 月	0.1	2.5	6.8	1137.7
	4 月			6.7	1129.9
	5 月			6.7	1123.4
	6 月	0.5	1.6	6.7	1122.6
	7 月			6.7	1118.3
	8 月			6.7	1123.0
	9 月	0.0	0.6	6.7	1121.9
	10 月			6.6	1117.3
	11 月			6.7	1124.0
	12 月	-0.3		6.7	1129.2
2023 年					
	1 月			6.6	1124.4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20 年		-6.1	-7.7	1.0
	4 季度	-4.1	-7.4	3.3
2021 年		5.3	3.8	4.3
	1 季度	-0.8	-5.0	3.2
	2 季度	14.2	12.3	8.7
	3 季度	3.9	2.9	2.9
	4 季度	4.8	5.9	2.6
2022 年		3.5		
	1 季度	5.5	7.9	3.1
	2 季度	4.3	5.5	0.8
	3 季度	2.3	1.8	0.6
	4 季度	1.9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6.2	-8.9	-8.5
	3 季度	-2.7	-8.6	-8.8
	4 季度	-8.0	-4.2	-7.6
2021 年		3.6	10.5	8.3
	1 季度	-5.5	-0.3	-5.6
	2 季度	18.9	26.2	22.1
	3 季度	2.0	10.5	10.3
	4 季度	2.0	8.3	9.2
2022 年				
	1 季度	3.6	8.7	9.3
	2 季度	2.8	7.9	8.5
	3 季度	7.3	7.8	10.7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出口额	(%)	(%)	进口额	(%)	(%)	口额
2021 年	24384		14. 3	23220		22. 2	1164
12 月	2151	0. 2	14. 2	2300	4. 6	39. 2	- 149
2022 年	28778		18. 0	31925		37. 5	- 3147
1 月	2233	3. 8	20. 0	2344	1. 9	46. 3	- 111
2 月	2256	1. 0	17. 5	2382	1. 6	39. 8	- 126
3 月	2283	1. 2	14. 8	2484	4. 3	37. 3	- 201
4 月	2316	1. 5	13. 0	2647	6. 6	40. 2	- 331
5 月	2422	4. 6	28. 2	2709	2. 3	52. 7	- 287
6 月	2417	- 0. 2	19. 8	2746	1. 3	44. 2	- 329
7 月	2371	- 1. 9	13. 0	2768	0. 8	43. 5	- 397
8 月	2460	3. 8	24. 0	2920	5. 5	53. 5	- 460
9 月	2500	1. 6	23. 6	2867	- 1. 8	45. 0	- 367
10 月	2486	- 0. 6	18. 1	2766	- 3. 5	31. 1	- 280
11 月	2512	1. 1	17. 2	2656	- 4. 0	20. 4	- 144
12 月	2397	- 4. 6	9. 1	2579	- 2. 9	8. 7	- 181

注:仅指货物贸易,不包括欧元区 19 国之间的贸易额。月度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1 年		-1327	1620	-2947
	12 月	-1284	-1029	-256
2022 年		-1736	-320	-1416
	1 月	592	424	168
	2 月	-90	175	-265
	3 月	-78	-33	-45
	4 月	92	128	-36
	5 月	-174	966	-1140
	6 月	-396	-449	53
	7 月	352	223	129
	8 月	749	449	300
	9 月	-234	15	-249
	10 月	-26	48	-74
	11 月	160	203	-43
	12 月	-2682	-2469	-213

注:(1)指欧元区 19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2)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 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20 年		-4.3	-4.7	2.4
	4 季度	1.9	1.9	0.9
2021 年		2.1	0.4	3.5
	1 季度	-0.1	-1.6	-0.2
	2 季度	0.3	0.2	1.9
	3 季度	-0.3	-1.1	1.3
2022 年	4 季度	1.1	3.0	-1.1
		1.1	2.1	1.5
	1 季度	-0.4	-0.9	0.5
	2 季度	1.1	1.6	0.8
	3 季度	-0.3	0.0	0.1
	4 季度	0.2	0.5	0.3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3.6	-11.6	-6.8
	4 季度	1.3	9.6	6.0
2021 年		-0.1	11.7	5.0
	1 季度	1.2	2.5	2.1
	2 季度	0.6	3.1	4.4
	3 季度	-2.1	-0.4	-1.5
2022 年	4 季度	-0.5	0.4	0.3
		-1.1	4.9	7.9
	1 季度	-1.1	1.2	3.8
	2 季度	1.2	1.5	0.9
	3 季度	1.1	2.5	5.5
	4 季度	-0.5	1.4	-0.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20 年		-4.3	-4.7	2.4
	4 季度	-0.5	-0.9	3.3
2021 年		2.1	0.4	3.5
	1 季度	-1.1	-3.2	3.0
	2 季度	7.7	5.6	5.1
	3 季度	1.8	-0.7	4.0
2022 年	4 季度	0.8	0.3	2.0
		1.1	2.1	1.5
	1 季度	0.5	1.0	2.7
	2 季度	1.7	2.6	1.6
	3 季度	1.5	3.6	0.3
	4 季度	0.6	1.3	1.7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3.6	-11.6	-6.8
	4 季度	-1.0	-5.1	-6.6
2021 年		-0.1	11.7	5.0
	1 季度	-2.2	2.0	-0.5
	2 季度	2.5	27.2	5.0
	3 季度	1.1	15.5	11.3
2022 年	4 季度	-1.1	5.7	5.0
		-1.1	4.9	7.9
	1 季度	-3.1	4.3	7.1
	2 季度	-2.2	2.8	3.4
	3 季度	0.7	5.8	11.0
	4 季度	0.4	6.5	10.1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22 年		0.4	1.28	2.6
	1 月	-0.5	1.20	2.7
	2 月	1.0	1.21	2.7
	3 月	0.1	1.22	2.6
	4 月	-2.2	1.23	2.6
	5 月	-1.2	1.24	2.6
	6 月	-2.9	1.27	2.6
	7 月	-0.7	1.29	2.6
	8 月	3.6	1.32	2.5
	9 月	7.7	1.34	2.6
	10 月	3.3	1.35	2.6
	11 月	-0.6	1.35	2.5
2023 年	12 月	-1.6	1.36	2.5
	1 月		1.35	2.4

注:(1)劳动生产率为 5 人及以上规模制造业企业。(2)求人倍率为实际就业岗位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22 年	981860		18.2	1181642		39.2	-199782
1 月	74754	0.9	9.6	84162	5.2	38.7	-9408
2 月	75873	1.5	19.1	86451	2.7	34.0	-10578
3 月	77136	1.7	14.7	86279	-0.2	31.3	-9143
4 月	78219	1.4	12.5	92666	7.4	28.3	-14447
5 月	80166	2.5	15.8	98334	6.1	48.8	-18168
6 月	83008	3.5	19.3	101931	3.7	46.0	-18923
7 月	84605	1.9	19.0	105727	3.7	47.3	-21122
8 月	83707	-1.1	22.0	106854	1.1	49.8	-23148
9 月	86148	2.9	28.9	106347	-0.5	45.8	-20199
10 月	87321	1.4	25.3	110596	4.0	53.7	-23275
11 月	85924	-1.6	20.0	104376	-5.6	30.3	-18452
12 月	83073	-3.3	11.5	101275	-3.0	20.7	-18202
2023 年							
1 月	77881	-6.3	3.5	96094	-5.1	17.8	-18213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1 年		36048	231125	-195077
	12 月	3429	25297	-21868
2022 年		58389	236210	-177821
	1 月	5659	14082	-8423
	2 月	3002	15270	-12268
	3 月	7163	15802	-8639
	4 月	3538	18232	-14694
	5 月	4983	18128	-13145
	6 月	-1210	21730	-22940
	7 月	4916	17129	-12213
	8 月	3588	19300	-15712
	9 月	7147	24350	-17203
	10 月	3312	18672	-15360
	11 月	3302	22605	-19303
	12 月	12989	30912	-17923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20 年		-5.1	-11.0	-6.3	-3.9	-6.6	-2.7
	4 季度	-2.9	-9.2	-3.5	-0.4	0.7	-1.3
2021 年		5.0	7.6	4.9	4.6	8.7	4.7
	1 季度	0.5	-7.7	-2.4	1.7	2.5	-0.3
	2 季度	12.1	24.4	19.5	12.4	20.1	10.5
	3 季度	4.3	8.5	3.0	4.4	8.4	4.0
	4 季度	3.9	8.9	1.7	2.1	5.4	5.0
2022 年			4.0				
	1 季度	3.2	10.5	2.7	2.4	4.1	3.5
	2 季度	4.7	3.9	0.2	3.7	13.5	-4.1
	3 季度	3.9	1.9	4.1	3.6	6.3	-3.7
	4 季度		0.4				

注:加拿大季度数据为年化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20 年		-0.9	-8.2	-6.5	3.4	2.9	-2.1
	4 季度	-1.1	-4.4	-3.4	5.3	4.5	-2.2
2021 年		4.0	5.0	6.4	6.5	2.6	3.7
	1 季度	1.9	-3.8	8.0	9.2	4.7	-0.7
	2 季度	6.0	19.9	7.6	7.8	6.7	7.1
	3 季度	4.0	4.5	5.4	4.4	-6.0	3.5
	4 季度	4.2	1.1	4.7	5.3	5.2	5.0
2022 年		2.6	3.0	-3.5	2.5	8.0	5.3
	1 季度	3.0	1.8	-3.9	3.9	5.1	5.0
	2 季度	2.9	2.4	-1.2	3.0	7.8	5.5
	3 季度	3.1	4.3	-4.6	3.6	13.7	5.7
	4 季度	1.4	3.5	-4.2	-0.4	5.9	5.0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22 年		5.3	3.7			7.6	3.9
	1 月	6.5	4.0		11.2	6.6	4.4
	2 月	5.5	3.8		11.2	8.1	4.1
	3 月	5.3	3.7	34.5	11.1	7.6	4.1
	4 月	5.2	3.8		10.5	7.8	4.0
	5 月	5.1	3.8		9.8	7.1	3.9
	6 月	4.9	3.8	33.9	9.3	7.8	3.9
	7 月	4.9	3.6		9.1	6.8	3.9
	8 月	5.4	3.5		8.9	8.3	3.8
	9 月	5.2	3.6	32.9	8.7	6.4	3.9
	10 月	5.2	3.7		8.3	7.8	3.9
	11 月	5.1	3.7		8.1	8.0	3.7
	12 月	5.0	3.7			8.3	3.7
2023 年							
	1 月	5.0				7.1	

注:(1)英国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2)加拿大、英国数据经季节调整。(3)南非为季度数据。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22 年		2.9	3.3	4.3	3.7	2.3	5.8
	1 月	3.6	3.7	3.9	3.7		
	2 月	2.7	3.7	4.5	3.7		
	3 月	2.7	3.0	5.0	3.7	2.5	5.8
	4 月	2.7	3.0	5.4	3.7		
	5 月	2.8	3.3	5.1	3.7		
	6 月	2.9	3.3	4.7	3.7	2.3	
	7 月	2.9	3.4	4.3	3.7		
	8 月	2.5	3.5	4.1	3.7		
	9 月	2.8	3.3	3.9	3.6	2.3	5.9
	10 月	2.8	3.3	3.8	3.6		
	11 月	2.9	2.8	3.7	3.6		
	12 月	3.1	2.8	3.5	3.6	2.3	
2023 年							
	1 月	2.9		3.4	3.6		

注:(1)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2)韩国、中国香港数据经季节调整。(3)越南为季度数据,印尼为半年度数据。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5034	4992	42	4680	6944	-2263
11 月	466.5	450.1	16.5	406.3	651.4	-245.1
12 月	451.0	451.6	-0.6	458.8	626.1	-167.3
2022 年						
1 月	439.6	393.5	46.1	355.7	695.7	-340.0
2 月	434.0	411.1	22.9	400.2	677.4	-277.3
3 月	552.1	529.9	22.2	451.0	819.5	-368.5
4 月	512.4	506.4	6.0	394.4	686.9	-292.6
5 月	558.6	507.8	50.9	454.0	674.5	-220.5
6 月	562.6	533.7	28.9	407.0	679.3	-272.4
7 月	506.6	490.3	16.3	445.1	674.4	-229.3
8 月	503.8	529.5	-25.7	458.0	669.5	-211.5
9 月	487.4	497.4	-10.0	479.1	632.4	-153.3
10 月	484.5	491.8	-7.3	469.5	637.4	-167.9
11 月	479.3	479.4	-0.1	490.4	689.2	-198.8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2 年				3350	2727	623
1 月	84.0	81.8	2.3	197.8	198.2	-0.3
2 月	93.3	89.3	4.0	235.1	188.8	46.3
3 月	123.3	93.3	30.0	294.0	218.1	75.9
4 月	100.8	90.5	10.3	289.5	207.6	81.9
5 月	112.7	94.9	17.8	296.5	246.9	49.6
6 月	116.4	101.4	15.0	327.7	238.6	89.1
7 月	104.9	90.3	14.6	298.5	244.9	53.6
8 月	104.7	100.7	4.0	307.7	266.7	41.0
9 月	108.4	97.6	10.8	286.2	249.3	36.9
10 月	88.1	90.5	-2.4	269.4	234.4	35.0
11 月	98.2	94.1	4.1	281.6	214.9	66.7
12 月				266.5	218.7	47.8
2023 年						
1 月				231.4	204.2	27.2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2 年	4324	7181	-2857			
1 月	345.0	519.3	-174.3	459.3	247.5	211.7
2 月	345.7	554.5	-208.8			
3 月	422.2	607.4	-185.2			
4 月	401.9	603.0	-201.1			
5 月	389.4	632.2	-242.8			
6 月	401.3	663.1	-261.8			
7 月	362.7	662.7	-300.0			
8 月	339.2	619.0	-279.8			
9 月	354.5	611.6	-257.1			
10 月	297.8	566.9	-269.1			
11 月	319.9	558.8	-238.9			
12 月	344.8	582.4	-237.6			
2023 年						
1 月	329.1	506.6	-177.5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2 年	6839	7312	-472	5782	6046	-264
1 月	554.6	604.4	-49.8	339.1	401.9	-62.8
2 月	541.6	534.0	7.5	462.4	449.5	12.9
3 月	638.0	637.9	0.1	519.1	518.0	1.1
4 月	578.5	602.0	-23.5	474.8	493.6	-18.8
5 月	615.9	631.2	-15.3	500.1	522.2	-22.2
6 月	576.8	601.3	-24.5	512.3	551.9	-39.6
7 月	602.6	653.1	-50.5	465.0	524.6	-59.6
8 月	566.5	660.4	-93.9	506.7	561.7	-55.0
9 月	571.9	610.2	-38.3	523.4	532.3	-8.9
10 月	524.4	591.6	-67.3	492.8	512.9	-20.1
11 月	518.9	588.8	-69.9	493.1	494.1	-1.0
12 月	549.9	596.8	-46.9	493.2	483.4	9.8
2023 年						
1 月	462.7	589.6	-126.9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2 年	6071	6643	-572	4795	4276	517
1 月	610.9	606.9	4.0	399.8	349.7	50.1
2 月	419.7	466.7	-46.9	374.5	316.3	58.2
3 月	502.4	549.2	-46.9	435.0	385.9	46.5
4 月	507.7	565.3	-57.6	414.6	365.5	49.1
5 月	514.5	579.5	-65.1	420.5	396.8	24.1
6 月	518.0	617.9	-99.8	422.1	375.9	46.2
7 月	523.6	556.2	-32.6	432.4	382.2	50.2
8 月	521.8	548.1	-26.3	403.0	373.3	29.7
9 月	537.5	597.3	-59.8	375.2	324.4	50.8
10 月	492.5	526.6	-34.1	399.2	369.5	29.8
11 月	474.4	515.7	-41.3	361.2	327.0	34.3
12 月	448.1	514.1	-66.0	357.5	309.6	47.9
2023 年						
1 月				315.1	291.7	23.4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2 年	3705	3585	119	2920	2375	545
1 月	308.4	294.5	13.9	191.7	182.1	9.6
2 月	234.2	253.8	-19.6	204.7	166.4	38.3
3 月	347.1	326.6	20.5	265.0	219.6	45.4
4 月	333.2	324.7	8.5	273.2	197.6	75.6
5 月	309.2	326.2	-17.0	215.1	186.1	29.0
6 月	328.4	323.7	4.7	261.5	210.0	51.5
7 月	306.1	305.3	0.8	255.6	213.5	42.1
8 月	349.2	310.6	38.6	278.6	221.5	57.1
9 月	298.2	283.9	14.3	247.8	198.1	49.9
10 月	303.7	279.0	24.7	247.3	191.4	56.7
11 月	290.3	284.0	6.3	240.9	189.6	51.3
12 月	296.6	272.9	23.7	238.3	199.4	38.9
2023 年						
1 月	236.1	214.8	21.3	223.1	184.4	38.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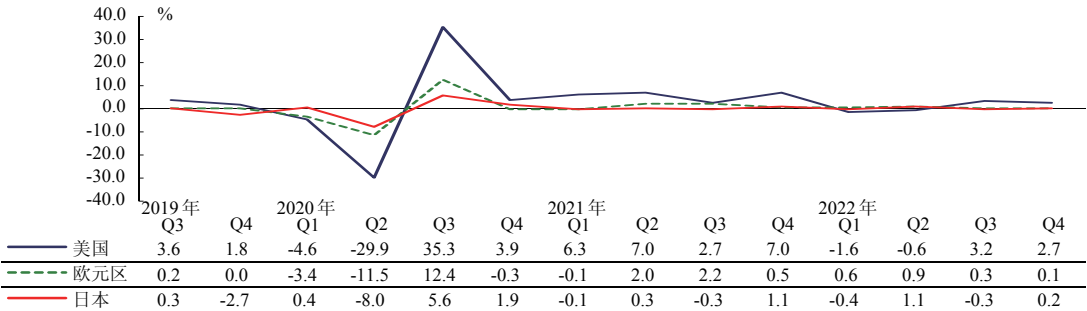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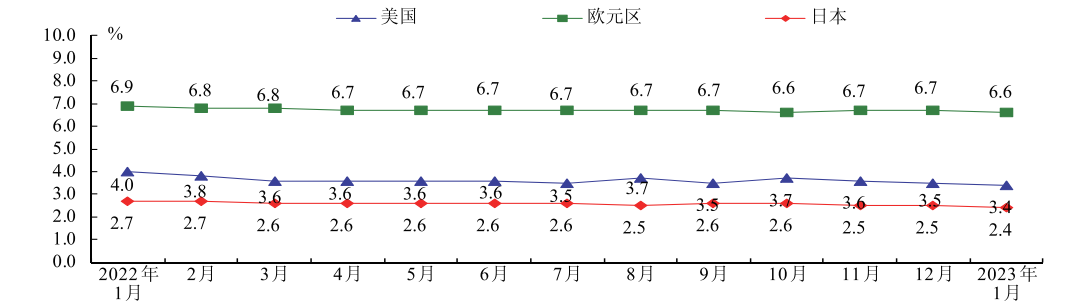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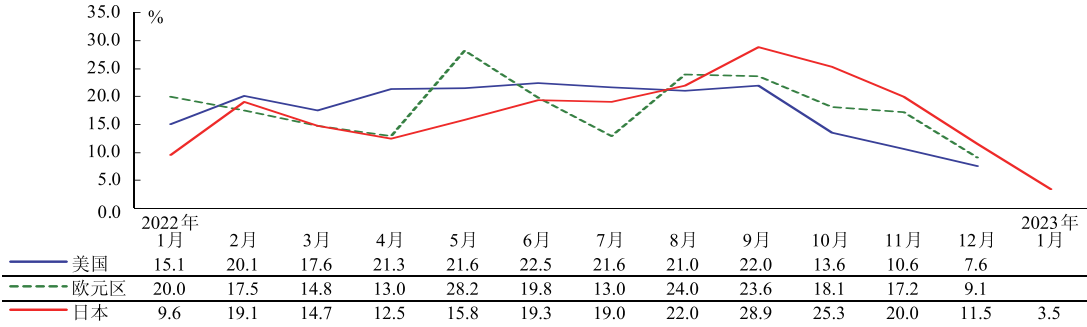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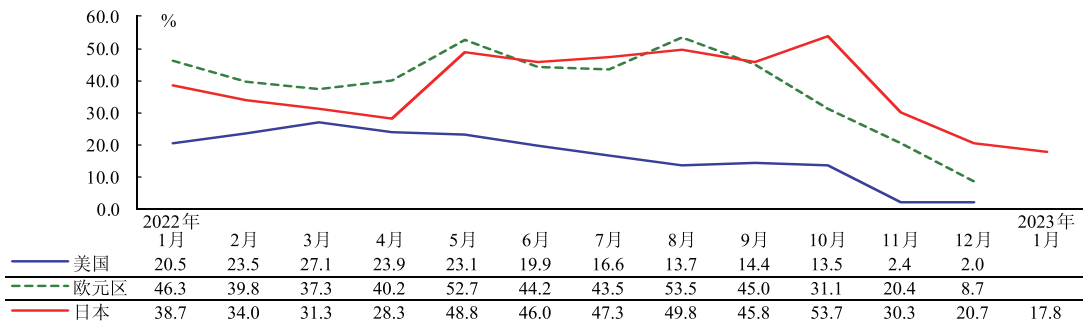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 ~ 图 4）。

ABSTRACTS

(1)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goals and tasks towards the future

Wang Yim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 goal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second part explain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main goals of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2035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believes that the task of achieving these goals is still very arduous;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hat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moving towards the future, emphasizing that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ocus on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ocus o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and safety level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focus on promoting urban – rural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ocus on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focus on promoting green and low – carbon transformation.

(2)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en Wenling

The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odernization is not the exclusive preserve of the West, and each country can find a path of modernization that suits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great crea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t has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eyond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re a higher level and more sustainable modernization, which not only h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ll countries, but also h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lso faces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it cannot be happen at Once, it requires the hard work and struggle of one generation or even several generations. Put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tid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world’s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s a great undertaking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

(3) Reform, opening up and innovation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uang Qifan

Through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has achieved a historic leap,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obstacles and bottlenecks in promoting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now to 2035 is a critical stage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t must unswervingly promote reform, opening up,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erms of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xcessive inter – regional competition, dual urban –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poor logistics system, policy obstruction, and lagging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accelerate the market – oriented reform of factors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of state – owned capital. In terms of opening up,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CEP rules at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level, support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goods, service trade, digital trade, etc.,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wo – way investment. In terms of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cultivate “specialized and new”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and cultivate ecologically – led “chain owner” enterprises.

(4) Relevant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surplus value” and “management labor” that is extended according to basic principles

Jia Kang , Zhang Xinqiang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hypotheses related to Marx’s surplus value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enrichment of Marx’s surplus value cognitive framework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As a resul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labor of labourers who do not posses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labor of entrepreneurs (masters) who possess and manag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an both belong to the source of abstract labor, and the conclusion that part of the source of the formation of surplus value as the essence of profit comes from direct labor, and the other part comes from indirect labor (management labor), so as to logically expand the coverage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Marxist surplus value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abor value and surplus value,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tribution of “complex labor” and “management labor”. Affirm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 carry forward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exploitation”, and rationally grasp the coexistenc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essential factors” Form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5) The replacement mechanism and enlightenment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means

Chen Bingcai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gold, British pound and US dollar as international payment means,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easons and mechanisms of British pound replacement of gold and US dollar instead of British pou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US dollar hegemony and the difficulty of challenging US dollar, and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law of currency substitu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gold standard monetary system suppor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ound, and Britain's maritime supremacy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e the strong backing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ou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British pound by the dollar lies in the decline of the status of the pou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dollar, the two world wars and the initi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led to the ris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dollar, and the dollar after getting rid of the gold constraint gradually ascended to the hegemony of global currency economic issuance. The author proposes; international trade needs a freely convertible currency or credit goods, as an international means of payment of the currency must be freely convertible,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means of payment is credit and value scale,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nd exchange crisis stems from the lack of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the key or premise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ubstitution is that the goods are irreplaceable, is a credit. A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 currency payment system has always existed, and it is also a favorable cond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overeign currenci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se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tatus has been replaced for a long time, but there is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sudden change.

(6) The road to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is bumpy and downward pressure persists——Analysis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22 and outlook for 2023

Li Jingjing, Hao Yue, Zhu Yi, Wang Tingxi

In 2022, high inflation and high interest rates will impact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impact of strong monetary tighten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gradually emerge,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the growth rate of the world economy will fall from 6.2% in 2021 to 3.4%. In terms of major economic fields, insufficient demand has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volume and value of global trade in goods, rapid contrac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nd strong risk aver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terms of major economies,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zone is gradually becoming apparent, the Japanese economy is slowly recovering, and the growth of emerging economies is divergent. Looking forward to 2023, the IMF pointed out that the effect of the tightening monetary policy has initially appeared, the global inflation level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decline slightly, and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ill improve slightly. Although the economies of the major economies have shown some resilience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have declined, they are still far from the central bank's target level, in the future,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curbing inflation and the "soft landing" of the economy, and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is still fragile. Combined with negative factors such as extreme natural disasters, geopolitical turmoil, and continued labor market tensions, the overall risk is still trending downward,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rate will further fall to 2.9% in 2023, which is relatively low in history.

(7) China's open bank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trends, risks and supervision

Bian Peng, Gu Yan, Qian Jun, Huang Yi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brought by the digital economic revolution, Open Bank shares data, algorithms, transactions, processes and other business functions with the business ecosystem to create a platform-based business concept and create new value for banks. Using report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since 2018, my country's banking industr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nstruction of open banking, and banks with poor profitability and high risk levels regard open banking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owever, open banking has also brought new risks such as data leakage and network security,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confirm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open banking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violations by banks.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the overall goal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to develop open bank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position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banks,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build a data sharing platfor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banking; on the other hand, in view of the potential risks of open banking, regulators should als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imited competition model for qualification access and use regulatory technology to strengthen open banking supervision.

(8) Comprehensive use of macro policy tools to deal with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Wang Hongju, Yang Yating, Yao Bo

Responding to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n order to control futur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and related climate risks, the macro policy tools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support green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are showing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The main problems China faces in dealing with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includ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energy demand and the arduous task of energ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the ability to coordinate and respond to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across regions and departments is not high; the overall national carbon market transactions are not active enough; the definition of brown assets is not clear, and transition finance lags behind green finance; prudent management of monetary policy does not match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use macro policy tools to deal with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China should improve fiscal policy support for climate transition, monetary policy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build a transitional financial framework system, strengthe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and continuously enrich monetary prudential tools to deal with climate transition risks,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omestic multi-departments coordination to respond to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prudent management of climate risks.

(9) Research on the CPTPP rules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and docking——Taking education, culture and medical service industries as examples

Xie Lanlan, Zhang Yujing, Yang Na

In September 2021, China formally applied to join the CPTPP and the CPTPP set high standards for the open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for all parties, pos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 opening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ree service sectors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medical care as the entry point, benchmarks the gap between China's opening level and CPTPP

rules one by one, and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o connect with CPTPP rules and promote the opening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medical service industries. The gap in the education service industry is high market access restrictions, barriers to mutual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and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s on overseas consumption, and the docking measures include further abolition of access restrictions, expansion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degrees, and unimpeded channels for cross – border distance education cooperation. The gap in the 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 is mainly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prohibited departments, high entry barriers, and strict import review and approval. The docking measures are based on keeping the bottom line and adopting a method of classifying limited and expanding access, and gradually promoting the opening process. The gaps in the medical service industry are mainly due to high entry barriers, non – national treatment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The docking measures include relaxing restrictions on sole proprietorship access, promoting the facilitation of cross – border remot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mproving the national treatment level of foreign – funded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mutual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physician qualifications, and medical inspection and testing results.

(10) Take multiple measures and take systematic measures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Wei Qijia

Today’s world is experienc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global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re increasing unabated, and the gam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ll of which have profoundly promoted the large – scale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and value cha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my countr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i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ideas and key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In general, China has the conditions,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unstable, not strong and insecure issues. In the future, it must adhere to systematic policies,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nd safety, put the st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in a more prominent position, consolidate the industrial chai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ptimize the supporting industrial chain, consolidate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n shape the new advantage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petition.

(11) Analysis and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Zhejiang mega – towns

Huang Yong , Lan Yuqing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report is the mega – towns where the non – county – level government is located. From the survey situation,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Zhejiang’s mega – towns are the weakening of policy effect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mall horse – drawn cart” of governance.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land, money, people, and rights”; first, the mismatch between factor allocation and economic scale; second,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availabl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third, the management power does not match 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fourth,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y and management needs. From the height of the requirement of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two first” goals of moderniz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mega – towns are an important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Zhejiang,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absorbing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this, it is believe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status of mega – towns can only be strengthened, not weakened.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reform think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first, further highlight the status of mega – towns in county planning; the second is to revitalize the stock to solve the predicament of land use in mega – towns; the third is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of mega – towns; the fourth is to take a multi – pronged approach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management staff; the fifth is to further decentralize power to mega – towns.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o strive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ilot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mega – towns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12) The form of expression, supply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Zhongguancun in Beijing

Qiu Ling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accessibility, economy and functionality of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rt – up technology – based enterpris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Zhongguancun into a world –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and innovation highland, and Beijing as 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Taking Zhongguancun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ive path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and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s under the trend of cross – border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 industry based on key incubator seminars,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start – up technology – based enterprises, and interviews with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in view of the service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art – up technology – based enterprises and the supply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focusing on demand and building a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s that serv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e supply, build a service platform that effectively meets the needs of start – up technology – based enterprises; implement precise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start – up technology – based enterprises.

Editor: Yang Yuge